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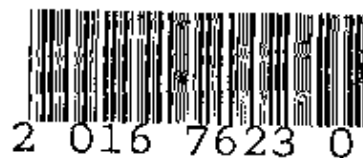
战后 日本经济史

[日] 小林义雄 著



商务印书馆





战后日本经济史

〔日〕小林义雄 著
孙汉超 马君雷 译



商务印书馆

1985年·北京

小林義雄
戰後日本經濟史
据日本评论社 1978 年版译出

ZHÀNHÒU RÌBĒN JĪNGJÌSHĪ

战后日本经济史

(日) 小林义雄 著

孙汉超 马君雷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三 河 县 二 百 户 印 刷 厂 印 刷

统 一 书 号: 4017·308

1985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63 千
印数 9,500 册	印张 7

定价: 1.30 元

690036/16

译者的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支配下,日本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但是,自从进入七十年代,特别是1973—1975年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日本经济已经进入曲折、缓慢增长的时期。现在,日本经济是在内外磨擦中行进,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因此,如何认识战后三十多年日本经济的盛衰过程,仍是大家深感兴趣的问题。近年来,我们国内对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有较多了解,但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化。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作了若干探讨,但对日本经济的一些基本问题却讳莫如深。小林义雄教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战后日本经济史》虽然只写到六十年代,但作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之作,很有参考价值。著者深入地揭示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以大量的史实和资料告诉人们,在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这对关心日本经济问题的中国读者可能有所裨益。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小林教授对本书中文版给予了热情支持。当他得知商务印书馆要翻译出版此书以饷中国读者的消息后,便立即为中文版写了序言寄来,接着又寄来了一万多字的中文版补记,将六十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变化情况做了补充(即本书的第十一章),从而使本书的内容更趋完整。对于小林教授对中国读者的这种盛意,我们在此谨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我们还要感谢日本朋友平井博二先生对本书中文版的积极支持。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容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孙汉超谨识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前言	4
一、战后经济的出发点	7
1. 战争经济的结束	7
2. 投降时的经济状况	8
3. 废除军需和生产严重下降	10
4. 庞大的失业大军	12
5. 通货膨胀的急剧发展和紧急金融对策	12
6. 工人的贫困和高涨的工人运动	14
二、占领政策的“改变”和重新恢复生产	17
1. 美国占领日本的根本方针	17
2. 所谓“占领政策的改变”	18
3. 初期政策的缓和	22
4. 重点生产和特殊的资本积累过程	24
5. 特殊积累过程所造成的后果	27
三、经济安定九原则与道奇路线	31
1. 匆忙的“稳定政策”	31
2. 道奇路线的目的与计划	33
3. 道奇路线执行经过与结果	41
4. 国家统制的急剧缩小	43
5. 在道奇路线袭击下的工人阶级	45
6. 战后初期的农业	47
四、朝鲜战争与景气的出现	50

1. 从道奇危机走向“朝鲜景气”	50
2. “朝鲜景气”的出现	51
3. 景气的消失	55
4. 垄断资本的庞大利润及其积累问题	56
5. 资本的攻势激化与工人阶级	58
6. 战争为日本垄断资本带来了什么?	60
二五、朝鲜停战和解除占领	62
——从景气消失到经济危机	
1. 背景	62
2. 景气消失后的变化	63
3. 垄断的对策	66
4. 随着解除占领而发生的变化	69
5. 正式引进外资的开始	73
6. 依赖特需与MSA体制(安全保障体制)	76
7. 从危机到回升	77
二六、从解除紧缩到神武景气	79
1. “数量景气”的到来	79
2. “已经不是战后的了”	83
3. 向“价格景气”突进	85
4. 农业出现的变化	88
5. 垄断的加强和对外关系	95
二七、外汇危机和“锅底景气”	97
1. 外汇危机	97
2. 景气恶化和摆脱危机	98
3. 从对外经济关系的动向来看	102
4. 提高生产率运动	105
二八、得意洋洋的扩大和自由化的起伏	109
1. 景气迅速恢复及其原因	109
2. 收入倍增计划	111

3. 贸易、外汇的自由化·····	115
4. 外资蜂拥而至·····	119
5. 中小企业问题和中小企业的工人运动·····	122
6. 合理化和工会·····	125
7. 农业基本法及其背景·····	129
8. 过剩的设备投资和外汇危机的重新出现·····	131
九、战后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和劳动 ·····	135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问题〔1〕	
1. 战后重建和发展的基本原因·····	135
2. 资本方面的发展·····	137
3. 工人方面的变化·····	139
4. 产业结构的变化·····	142
十、战后经济的周期和变化 ·····	146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问题〔2〕	
1. 景气变动及其特征·····	146
2. 垄断资本的发展及其时期的划分·····	150
3. 和战前对比·····	152
十一、中文版补记 ·····	160
1. “岩户景气”的挫折及其对策·····	160
2. 经济危机的到来·····	161
3. 景气再次回升与经济高速增长的重现·····	162
4. 高速增长的结束及向低速增长的过渡·····	166
5. 石油危机与低速增长的正式到来·····	167
6. 日本经济地位的上升与贸易磨擦·····	169
附录 ·····	173
统计表·····	173
战后日本经济年表·····	188

中文版序言

本书主要是按日本大学低年级学生的理解程度编写的。书中主要记述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在战后几个时期的变化，即日本战败投降时及其以后的大混乱时期、恢复时期、恢复后的发展时期亦即所谓高速增长时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赖以实现的国内外条件，特别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力量变化及其在经济上的反映。

本书虽已出版较长时间，但我认为，除表述方式外，在内容梗概上，没有特别要加以修改的必要。问题是第一次高速增长结束后的第二次高速增长以及最近的低速增长时期，在本书里没有述及。因此，在中文版行将刊行之际，尽管时间不足，我也愿以少数文字，极其简单地将1961年以后到1980年这段时间的日本经济，略作补充说明。

1960年前后急剧发展的日本经济，到六十年代中期已经开始有所变化，终于在1965年爆发了严重的危机。然而随着越南战争的激化，从1965年的危机之后，日本经济又迎来了第二次高速增长时期，再一次取得了大幅度的发展，其规模远远超过了第一次高速增长时期。但是从1970年开始，第二次高速增长又出现了阴影，经过1971年的美元冲击（亦称尼克松冲击）和1973年末开始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日本经济出现了危机性的混乱，后来虽然度过了这种混乱，但是高速增长时期已在1970年宣告结束。高速增长时期结束后，接着便是三年的过渡时期，然后正式进入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的低速增长时期。

但是，日本为什么能够从第一次石油危机中较快地恢复过

来，而在 1978 年开始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中，日本为什么没有遭受多大的打击便能顺利地走出来，以及从第二次高速增长时期结束以来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磨擦”、最近日本与欧洲共同市场之间发生的同样趋势，都是特别引人注目的问题。

日本经济从 1959 年进入第一次高速增长时期起到 1979 年的二十年间，标志着经济增长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按 1970 年价格计算）增加了四倍，因此日本国民收入在西方世界各国国民收入的总计中所占比率，在二十年内由 3% 上升到 10%，美国约占 30%。故从 1968 年以来，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便仅次于美国而居西方的第二位。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日本的国内问题，从整体来看，与急剧发展的资本相比，工人阶级的斗争却表现了不断削弱的倾向。这是因为，随着资本垄断的加强，势必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怀柔工作，从而导致工人阶级斗争的衰减。此外，与现代化工业的巨大发展相反，日本的农业地位江河日下，沿着崩溃的方向变化。最后，我必须指出，对于日本来说，不论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作为偶然的外来条件，对其经济增长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日本从战败到最近资本主义经济取得急剧发展的原因，我在这里还要特别举出以下一点，即日本为了发展经济，在战后首先是迅速地准备基础条件和加强基础力量，时机一到便进行大发展。这种现象，在战后日本曾经反复出现。例如，初期的重点生产方式，道奇路线对朝鲜战争时生产大发展的影响，五十年代前半期为发展经济而进行的各种制度改革，五十年代后半期加强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和钢铁工业等，对始于六十年代的高速增长都有重要的影响，这就是实际的例证。中国有句话叫作“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与上面所讲的意思是一致的。

总之，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阐述日本经济从战败时沦为赤贫

的状态,经过恢复时期走向发展的过程,以及与这种变化有关的各种因素和结果等等。我想中国读者对这些问题也是比较关心的,本书在这一方面如果能有一点参考作用,著者将无比高兴。

小林义雄

1981年2月

前 言

日本战败后将近二十年了。在战后的前十年里，我没有什么感觉，但到了接近于第二十个年头时，我却有了一些感慨很深的想法。

话虽如此，我自己对于《战后日本经济史》这个书名坦率地说还是反感的。第一，我既不是历史家，也不是经济史专家；其次，日本经济的战后阶段，从历史上说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现在，我只想说明日本战后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为了解今天的日本经济和经济政策提供一些基础知识。的确，最近我所接触到的青年中，有许多人对于战败后的混乱时期几乎完全失去了记忆。而今后更多的青年将是在战后出生的，因此为战后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经过提供可靠的、正确的知识，就十分必要了。这对青年人来说，即使叫做《战后日本经济史》，也许不致有什么反感吧。

再有，最近在谈论日本经济问题的人们中间，广泛地出现一种仅仅追求现时动态的倾向。研究当前经济固然重要，但是对其发展过程不予重视的议论，不管怎么说也是不足取的。对战后经济的发展过程，无论如何也应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从复杂的过程中正确把握变化的规律，抓住问题和矛盾所在，才能正确地论述和认识今天的问题。有句话叫做“作为历史的现代”，意思就是要明确了解现时的历史关系。对我们来说，这句话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但是，由我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决非易事。我步经济史专家安藤良雄教授的《现代日本经济史》的后尘，从1962年4月起在《经

济讲座》上连载了我的《战后经济史》^①。以此为基础，我修改了个别不正确的地方，同时又大幅度地增加了不足的部分，整理成这本书。

这本书根本不是理论研究著作，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概论撰写的。即使如此，无论从各个问题还是从全书来看，我都感到有不够深入之处；同时，我也担心或许还有重要的遗漏。

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尽管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但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书中没有将其作为独立的课题加以展开。在我写《经济讲座》时，因有小池基之教授的协助，才有幸得以完成两讲。现在我认为这是不够的。但是对这一领域完全置之不理，也实在说不过去，因此不得不以少数专门研究人员的著述和小池教授在《经济讲座》上的著述为指导，写了一点战后农业的情况。但这也仅仅是表面的东西，只是打个补丁而已。有关劳动问题的叙述也是如此，对于没有实际劳动经验的我来说，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内容丰富的东西。固然由于篇幅所限，也有割爱的地方，但重要的是，会有若干遗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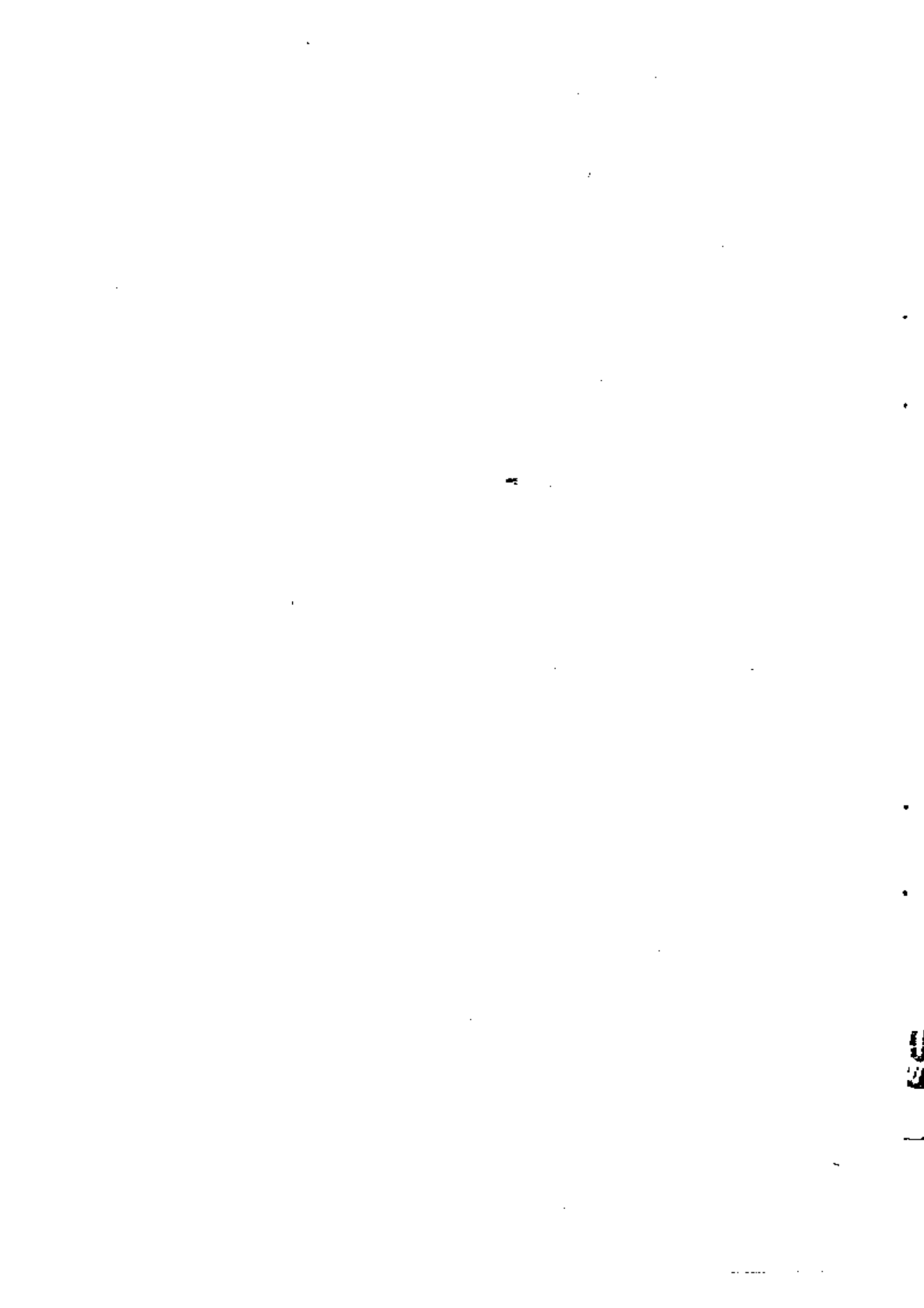
我反复阅读原稿之后，愈益深刻地感觉到，在战后日本经济的进程中，明确而严格地贯穿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则，这种现象不妨说在将来也是如此。青年诸君如果通过本书能够具体地了解这一点，这对我来说实属喜出望外，而且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喜悦，也是大家的喜悦。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向为本书的执笔和出版提供非凡援助的各位表示深切的谢意。

小林义雄

1963年10月30日于专修大学

^① 这份讲义经过整理，最先以《现代日本经济史入门》的书名出版，主要叙述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结束的历史，可与本书一并阅读。



一、战后经济的出发点

1. 战争经济的结束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在其报告书之一《战略轰炸对日本战争经济的效果》(日译本书名为《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中这样写道：“到1945年8月，日本的战争经济已经破产”。根据美国总统指示任命的这个调查团的报告书，作为了解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经济状况的详细资料，即使在今天也是唯一的一份文件。因为日本政府和军部非常害怕战争中的重要记录落到美军手中，所以在投降后和被占领前，已将此类材料全部烧毁。因此在记述战后经济的出发点之前，很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战争末期、特别是投降前夕的日本经济状况。现在，我们以调查团的报告书作为线索，再稍加补充，记述如下。

美国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并拥有巨大生产力的国家。经过长期的对华侵略战争之后，日本的经济和产业，根本不具备再与美国为敌并在长期战争中能够取胜的力量。日本经济的衰弱征兆，1944年初已在钢铁、炼铝、煤炭、石油、橡胶等基础工业方面开始暴露出来，这也是必然的结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原料不足，随着战局恶化和被击沉船舶的数量激增，这种不足日益严重。美军于1944年7月开始夺取南洋的塞班岛，从此，日本同南方的海上运输便被完全隔断。就在这年的年末，美军以塞班岛为基地，对日本本土及朝鲜、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海上运输进行了猛烈的空袭。

进入1945年时，由于空袭、原料不足和疏散工厂等所造成的混乱，日本的飞机和其他武器以及钢铁、炼铝、石油等生产急剧下

降。于是原来可以勉强顶住美军对本土进攻的一点长期战力，也消耗殆尽。

粮食严重不足，加上海上供应线路断绝，粮荒问题更加紧迫。1945年国内的大米生产严重歉收已成定局。鱼类供应也因战局恶化而激减。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特别是工业人口，皆因房屋毁于空袭而无家可归。由于空袭、缺粮和物价上涨的情况日趋严重，被动员或被征调到军需工厂劳动的庞大工人队伍，都不能进行正常的生产。物资匮乏以及大量的战费开支，又使通货膨胀急剧发展。战争末期与侵华初期相比，日本中央银行券的流通额增加了二十四倍以上，零售物价平均上涨一倍半，黑市物价平均约上涨二十九倍。由于空袭、战灾、疏散、物资奇缺和物价高涨等原因，人民生活遭到了全面的破坏。

当时日本经济完全陷入了悲惨的境地，到1945年8月，日本的战争经济已经彻底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于1945年8月14日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向联合国表示投降。于是战争经济宣告结束，战后经济从此开始。

2. 投降时的经济状况

随着日本政府于8月14日接受波茨坦宣言并宣布无条件投降，其在海外的领土和殖民地（占全部领土面积的45%）以及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全部丧失，于是日本对外经济关系完全陷入瘫痪状态，日本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一起垮台了。由于这场战争和日本惨败，除极少数人外，国民都陷入了极度的贫困，整个工业严重荒废（据政府公布，日本本土财富的41.5%，包括在国内外损失和处理的武器等军用资产在内，直接或间接地毁灭于战争之中）。同时，在投降和被占领的情况下，日本资产阶级将被置于何地，也难

以预卜，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真是濒临最大的危机。

尽管形势如此岌岌可危，在联合国军进驻日本前夕，日本政府、军部和垄断资本所急于要做的事情又是什么呢？是隐匿和瓜分军用物资，以饱私囊。他们想干的与贫困穷苦人民的愿望恰恰相反。在决定投降并向国内公布的前夕即8月14日，日本的军部和政府已经秘密发出指示，要求处理和隐匿储存的军需物品以及军用资材。此项军用物资，按当时的牌价计算约值一千亿日元，按今天的时价计算至少值二万至三万亿日元。如此庞大的物资，就这样落到了军需工业垄断资本和败军的手里，他们又立即将其变为黑市物资，秘密地大量抛售。

另一方面，政府、军部、军工垄断资本又和财阀银行合谋，采取不正当的方法，从军人复员津贴和临时用于军需订货的特别预算中提取了巨额的资金。这笔提款，仅8、9两月按当时金额约达三百四十亿日元（为现在的七千亿日元），它使军工垄断资本得以避免破产，也使为军需工业提供巨额贷款的财阀银行避免了因不能收回贷款而破产的厄运。然而这样地非法投放政府资金，却成为当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日本中央银行券的流通额到12月末为止的仅仅三个半月期间，竟膨胀了六成以上。

正是依靠侵吞庞大的政府物资和资金，垄断资本在投降时的危机中才得以避免破产，甚至利用混乱时期获得了大量的黑市利益。以后还要讲到，这一切形成了通货膨胀猛烈发展和经济危机激化的主要原因。

不久，美军完成进驻工作，日本已被置于占领之下。然而在这重大紧急时期，大约有半年之久，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完全是放任政策（从战时一直延续下来的国家对经济的广泛统制并没有任何改变）。如上所述，政府没有采取恰当的方法来分配大量的军需物品和国家资材以维持人民生活 and 重建经济，而是不负责任地处理这

些物资，并且持续不断地滥用临时特别军事预算的资金。不仅如此，由于银行贷款总额的一半是贷给军需工业的，特别是六大银行^①向军需工业提供的贷款平均占贷款总额的90%，所以在战争结束当天，日本政府便发表声明，要求银行允许客户自由提取存款，同时也允许金融机关为企业提供新的巨额贷款。与此同时，政府还不顾粮食极端不足和生活必需品奇缺的情况，一味按照放任的方针，提早在9月份撤销对生鲜食品的统制，接着又撤销对生活必需品的各种统制。所有这些，并不是由于日本战败，屈服于美军压力而处理不当，这里虽然也有政府无能和失策之处，但从根本上说，都是垄断资本牺牲广大人民以使自己苟延残喘并确保和扩大其各种形式的利润的非常对策。

3. 废除军需和生产严重下降

战争末期，在战争经济开始崩溃的过程中，日本的工矿业生产已经广泛地急剧下降。在投降和美军占领的非常情况下，生产下降又进一步加剧。美军占领后的最大变化，就是废除了军需市场，军需生产虽说从投降时起便告停止，但实际上是从美军进驻以后才开始全面停止的。

取消军需，对工业的直接和间接打击是极其严重的。航空和武器部门自不待言，就是机械、金属、化学等部门的生产，也几乎全部停顿了。从不包括直接军工生产的生产指数来看（国民经济研究协会发表，1935—1937年平均为100），7月是12.8，8月降为8.5，大体为战前的10%左右、战时高点的5%、战后（1961年）的2%。钢铁部门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普通钢材的月产量10月份为五千吨，是战前的1.4%、战时高点的1.2%、战后的0.3%的极低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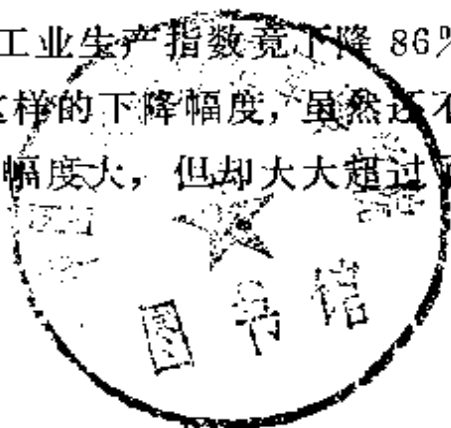
^① 战前六大银行，即第一、三井、安田、三菱、三和、住友等六家银行。——译者

煤炭的月产量 11 月份为五十三万吨,相当于战前的 14%、战时高点和战后的 1.1%左右。煤炭生产下降,受战时被残酷奴役的朝鲜工人和中国被俘人员的大举下山和罢工的影响也很大。在其他部门,类似这种与废除军需无关的种种原因,也在不少场合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不论怎样,废除军需市场对工业生产的影响是严重的,尤其是垄断资本,早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军需市场。随着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的战争升级,日本垄断资本日益深入地卷入了军事生产,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后半期,垄断资本更是倾注全力于军火生产。因此对他们来说,取消军需市场是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天翻地覆的大问题,因而他们不择手段地谋求摆脱这种危机。

取消军需生产,对广大人民来说,意味着负担的大幅度减轻,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增加失业的问题。战争末期,政府的军事开支和私人的军工投资合计占国民总生产的二分之一,因此一旦停止军事生产和取消军需市场,势必产生广大工人被解雇的失业问题,也就是说,取消军需生产,使工人生活也受到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总之,从投降前后到占领军进驻日本初期的这段时间,是日本工矿业生产急剧下降的非常时期,而且这种大幅度下跌,在世界危机史上也是罕见的。美国从 1929 年到 1932 年的经济危机是历史上最激烈的一次周期危机,震撼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基础,工业生产指数(美国商业部公布的)在三年内下降了 46%,而日本的这一次危机,二年内工业生产指数竟下降 86%,最严重时是四个月间下降了 60%。这样的下降幅度,虽然还不及俄国十月革命及国内战争时期的下降幅度大,但却大大超过了第二次大战中战败的德国。



4. 庞大的失业大军

投降后，由于工业生产急剧缩小，工人大量失业，军需工厂的工人至少半数以上被解雇。据厚生省^①估计，从战争结束到10月上旬的两个半月间，包括征用人员在内，被工厂解雇而失业的人数达四百一十三万之多，加上复员军人和从海外撤退的人员，到10月为止，由于战败而离开岗位的人数共达一千三百万以上，其中大部分失去了职业，所以失业者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即使作为就业而留下来的人们，其实际工资也由于通货膨胀而日益下降，根据政府资料来看，1945年底前后的实际工资指数比战前（1934—1936年平均）低10%以上。

尽管劳动人民处于如此悲惨的境地，但是在战争刚结束的短时间里，他们还没有掀起有组织的反抗活动。这是因为在战时工人运动遭到了彻底的镇压，既没有工会，又没有组织工会的核心人物；同时，被解雇的多数工人都是刚从服役和强制劳动的状况中解脱出来，心中还有一种高兴和解放的感觉。但是自从被占领以后，日本政府已不能象过去那样镇压工人运动了，所以从10月开始，工会组织便逐渐成立起来。前面已经讲过，煤矿的朝鲜工人和中国的被俘人员，由于无法忍受战时的残酷奴役，不断地掀起暴动，大举下山。在这种影响下，首先是煤矿、接着是其他各个部门，开始举行要求提高工资、增加粮食定额、恢复生产等罢工运动，以及其他斗争。

5. 通货膨胀的急剧发展和紧急金融对策

生产下降已于10月份到底，然而接着又发生了运输危机。煤

^① 厚生省是日本中央行政机关之一，主管国民保健、妇女、儿童福利等国家事务。——译者

炭不足以及运输占领军,使铁路交通陷入极大的混乱,而交通不畅又进一步加重了物资供应的不足。

迄今为止,由于种种原因的积累,物价开始急剧地上涨。从1945年年末到第二年年初的三个月间,燃料和粮食的价格上涨了一至二倍,生活必需品的黑市价格大幅度地上升。在占领军司令部的控制下,无限制地滥用政府资金的现象虽然有所减少,但是代之而起的是日本中央银行的贷款又开始猛烈增加,在没有任何对策的情况下,银行券的发行额一直急剧地增加。由于传说要立法征收财产税,此时隐匿货币财产的活动又开始出现,结果是银行的贷款激增而存款减少,使通货膨胀迅速趋于恶化。

于是如何制止恶性通货膨胀,已成为最为紧迫的问题。尤其对在军需工业上拥有巨额贷款的财阀银行来说,存款减少和贷款激增的倾向持续下去,便意味着自己的毁灭。因此,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当时最为紧急的重大任务。占领军当局也担心通货膨胀的激化会加剧社会动荡以至爆发革命,因此迅速地同意了日本政府的方针,即在银行发生挤兑之前,允许政府立即提出紧急对策。这个对策就是2月的金融紧急措施。根据这项措施,要封存旧日元,发行新日元。即按政府命令,将人民手中持有的货币全部收归银行,与存款一起封存起来,同时强迫人们把生活费用维持在“五百日元”这个极端贫困的水平线上。这个紧急措施使通货膨胀的发展暂时受到抑制,财阀银行不仅因此而免于破产,而且根据这一措施,一举而恢复并加强了对工业部门的控制。

在紧急金融措施之外,还提出了其它一些政策,这些统称为“经济危机的紧急对策”,也叫做“关于通货膨胀的综合对策”。至于这些对策的效果如何,连政府机关也不得不公开提出如下的说法:“紧急对策……,整个地说已经失去时机。断然推行这个政策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应付银行的挤兑和金融危机,然而实际检查一

下,除兑换新旧货币和限制支付存款外,对于危机几乎没有任何有力而迅速的具体对策。”(经济企划厅编《战后经济史》政治经济篇第36页)

6. 工人的贫困和高涨的工人运动

紧急金融措施将急剧发展的通货膨胀煞了一下,但在拯救、支撑财阀银行的同时,却将人民大众和工人阶级推入了贫困的深渊。1945年年末以来,工人和市民还没有从赤贫的泥潭中挣扎出来,又遭到了粮食严重不足的袭击。在这以前,由于1945年农业大歉收的影响,缺粮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早已开始的主食配额制度,到1946年上半年便发生很大变化,全国普遍发生配额不足和推迟发给配额的现象。5月上旬,在北海道甚至发生了一百零四天没有分配主食的极为严重的问题。东京也有类似情况,推迟分配主食达二十多天。由于饥饿,人们不得不为寻找粮食而四处奔波。

在这种情况下,东京于5月12日(1946年)发生了“给我大米”的群众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一直冲入皇宫,向天皇要求大米。5月19日,又在东京举行了“粮食救难”活动,真是群情激愤。

直至此时,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仍根据1945年11月美国政府的“占领初期基本指令”,明确表示对维持日本人民生活水平完全没有义务的态度。但是他们目睹粮食危机的紧迫情况以及社会不安的形势日益严重,也不得不在对群众的示威活动发出强硬警告的同时,利用“占领地区救济基金”,紧急进口粮食作为援助物资。

利用“占领地区救济基金”进口粮食这一措施,使粮食危机逐渐走向缓和。这些粮食都是由于战争意外地提早结束而不再需要的军粮,以及由美国政府作为剩余物资在美国国内采购的农产品。这些粮食是作为赠与还是作为债务提供的,尽管当时并未明确,但

多数群众还是相信了日本政府的宣传，把它作为美国政府的“友好援助”而接受下来的。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笔需要偿还的债务。

由1945年10月开始活跃起来的工会运动，这时已迅速发展起来。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3月，已有二百五十六万工人组织了六千五百三十七个工会，到1946年12月工会人数已经增加到四百四十一万，工会组织也发展到一万七千六百一十三个。

在这期间，即1945年10月间，工会组织参加了生产管理，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家看到前途困难重重，想借此取得克服生产上怠工现象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工人阶级用以对抗贫困化的一种斗争形式。从此以后，工会管理生产的情况便不断发展。但政府和警察对此是采取否定方针的，而且从1946年2月开始，对管理生产的工会组织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946年4月是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高峰，当时有三万八千八百四十七人参加了五十六个企业的生产管理工作。从此以后便趋于减少。这不仅是由于当局的镇压，也是由于当时在全国和整个产业范围内开展这种斗争的条件还不具备。

由于采取紧急金融措施，通货膨胀得到了暂时的控制。但是，由于银行大幅度扩大贷款，暂时取得回升的生产很快又重新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时有所减少的通货流通额，经过半年之后，到当年9月份便轻易地突破了实行紧急金融措施时旧日元的最高发行额六百十八亿元，到下半年时，迅速地增加了约一倍之多。

在通货膨胀猛烈发展的情况下，生活困苦的工人阶级以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会为基础，开展了一个又一个的斗争，国营铁路、海运、新闻、煤矿等部门的工会组织，为反对裁减人员，也进行了斗争。这些斗争，与当时的“十月斗争”迅速地汇合起来，于是各个工业部门多数企业的广大工人，便带着各种各样的要求，参加了这场

斗争。垄断资本与工人的对立日益激化，占领军当局也从这时开始，直接地干预和镇压工会的斗争。

一系列巨大的斗争浪潮，使私人企业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资和其他劳动条件，但政府机关和公共团体的公务人员的工资待遇，相形之下显得特别恶劣，于是广大公务人员为提高工资等待遇，也展开了斗争。公务人员的斗争是以政府为直接对象的，所以政治要求较多，政治性较强。正因为他们是以政府为对手的，所以自然地向着共同斗争的方向发展。

政府不仅不答应公务人员的要求，而且气势汹汹地摆出反击的架势。这时，全体工会组织都起来支援公务人员的共同斗争，于是一场以公务人员为中心的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斗争发展起来，而且形势日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以强大武力为背景的占领军便公开地、直接地出来进行干涉，因此，预定的二·一总罢工，在其前夕即1947年1月31日，便被占领军强行禁止，使这次占有组织工人总数40%的公务人员的总罢工计划遭到了挫折。但是斗争的结果，使公务人员的工资大幅度地提高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人统一战线的声势浩大，另一方面也是占领军本质虚弱的暴露。二·一总罢工的挫折，使资本的攻势一时有所加强，工人运动被迫暂时处于退守的状态。

二、占领政策的“改变”和重新恢复生产

1. 美国占领日本的根本方针

有近半数工会工人参加的二·一总罢工，在关键时刻被占领军的一纸禁令禁止了。这场大规模斗争的领导方面的重大弱点是，对占领军的本质没有透彻的认识，因而对占领军的可能干涉缺乏预见，没有充分的准备和完备的对策，以致在这场历史性的伟大斗争中，对于占领军的镇压，仅仅地方上有部分的分散抵抗，而且很快就收场了。战后，处于最困难时期的劳动人民，从广泛的经济要求到掀起打倒吉田内阁的大规模斗争，对占领军来说，有破坏社会秩序的危险，与其占领日本的目的相违背的，遂以命令的形式中止了这场斗争。

很明显，占领军的禁令，是其本质的反映。占领军的这种本质，早在1946年春季以来对群众示威运动的镇压上已有所表现，到1946年秋，这种表现便明朗化了。大约从这年的11月份起，美国政府已开始暗中“改变”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将原来削弱日本的方针改变为强化日本资本主义，即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对日本加以利用的方针。对日占领政策的这种“改变”，后来逐渐表面化，到1947年春便以非常露骨的姿态表现出来，及至1948年初，更是赤裸裸地“改变”了。

美国的占领政策虽说有了很大改变，但还不是根本的、一百八十度的改变。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是与日本有交战关系的联合国

各国的联合行动，然而实际上是美国单独占领和单独统治。既然如此，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国，对于战后日本的未来自然会发生极大的影响。因此，美国在占领初期即明确地制定了其基本目的，即：（1）确保日本是美国资本和商品的出口市场；（2）将日本作为美国推行亚洲政策的“远东工厂”；（3）在军事上极力利用日本的力量等。尽管在占领初期也有瓦解日本军事力量的目的，但是总的说来，上述三点是美国从占领初期、占领中期一直到解除占领这整个过程的一贯目的。这个目的，到最后也没有任何变化。

2. 所谓“占领政策的改变”

美国垄断资本对日的既定方针，并非经常以表面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是在看清日本与世界的形势后，才使其表面化并积极加以推行的。占领初期还是美国观望形势的时期。从根本上说，占领初期也是美国对日本经济采取削弱政策的时期。所谓削弱就是切断日本军国主义向外侵略的经济根源。美国不仅要在军事上、也要在经济上从日本消除将来可能成为美国垄断资本的障碍的巨大的资本势力，故对日本资本主义采取了明显的限制和削弱的方针。美国当时的对日方针，也可以说是要在一个时期之内，使其没有任何负担地慢慢地按照意图塑造出一个有利于美国的资本主义日本。所以当初美国政府在“占领初期的基本指令”中，明确地指示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说：“你对日本经济的复兴和强化不负任何责任。要向日本国民明确表示，你对日本应当维持一个什么样的特定生活水平也没有义务。”鲍莱大使在1945年12月的中间赔偿报告里也曾言明，撤销赔偿后的日本生活水平，不得高于被日本侵略过的各国的生活水平。对日占领方式，是否应与美、英、法、苏联合占领德国的直接军事统治有所不同？关于这个问题，虽然多少有过争论，但结

果还是由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通过日本政府执行占领政策，最高司令官只有在特殊必要时才拥有对日本人民进行直接统治的权力，在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日本政府即采取间接的方式进行统治的。

众所周知，在占领初期，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是美国占领政策的主要支柱。其中经济方面的非军事化，就是禁止军火生产；经济上的民主化，主要就是“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和“劳动改革”。这些改革一般都有赔偿的问题。其中禁止军火生产的问题，前面已经谈过，这里不再重复。

“解散财阀”的具体措施，乃是依据两项指令（1945年10月，总司令部要求十五家财阀^①提出有关自己的业务内容和资本结构的报告，以及11月初总司令部有关冻结财阀资产的指令），对财阀总部的控股公司进行肢解，以废止财阀家族的统治。与此同时，对大财阀总部以外的控股公司也予以肢解。为防止财阀或其他垄断形态的产生，1947年4月还公布了禁止垄断法。但是“解散财阀”的措施执行后，大企业仍然继续存在，为了达到进一步分割或分散大企业的目的，1947年12月又公布了“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在这项法令公布的前一个月即11月，世界上最大一级的贸易资本即三井、三菱两大财阀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被勒令解散。这是实行解散财阀的措施以来，对两个漏网的巨大贸易公司采取的重大步骤。这也可以视为英、美两国达到了阻止强大竞争对手在世界市场上复活的重要目的。此外，根据总司令部1946年1月关于从公司中清洗“财团人物”的指令，财阀和垄断资本的主要人物^②，多数都被从重要的经营岗位上撤下来，于是在人

^① 十五家财阀是指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富士、日产、浅野、涩泽、大仓、野村以及古河、鲇川等。——译者

^② 当时被列为十大财阀家族从经营岗位上被撤下来的人物有三井高公、岩崎彦弥太、住友吉左卫门、安田一、中岛知久平、野村文英、浅野总一郎、大仓喜七郎、古河从纯等五十六人。——译者

事方面也取得了削弱大资本势力的效果。

总之，从占领初期到1947年末，是总司令部采取措施，解散财阀和削弱垄断的时期。鉴于日本财阀与过去的日本军国主义一样，都负有对外侵略的责任，因而采取“解散财阀”的政策，以免日本重蹈覆辙。另外也要使日本财阀明白，即使战争可以发财，但也决不是有益的事业。因此“解散财阀”这个措施，比实际更有耀眼的外观。

关于农地改革问题。日本投降后不久，各地农村普遍掀起反对地主统治的运动，世界舆论也主张日本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因而日本政府主动地提出了改革农地的方案。这当然是一个极不彻底的方案，即使如此，也遭到了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于是美国占领军司令部不得不于1945年12月发布了一个要求彻底解放农地的“农地解放指令”。在这个压力下，日本政府才把农地改革纳入计划，并准备实施。但是第一次改革还是不彻底的，因而没有得到占领军司令部和联合国方面的支持。后来以联合国对日理事会的中间方案为基础，即以居于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英国方案为基础，重新制定了进行第二次农地改革的方案。根据这项决定，从1947年3月开始，由政府强制收购地主的佃耕土地，然后出卖给佃户，从而使“佃耕的解放”取得了迅速的进展。

“劳动改革”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根据总司令部的指令，在1945年10月废除了战时用于统制工人和镇压工人运动的各种法规，然后立即制订并于1946年3月开始实施工会法，同年10月实行了劳动关系调整法（简称劳调法），第二年9月又实行了劳动标准法。其中工会法为战前和战时遭到残酷镇压的工人提供了进行组织和开展活动的法律基础，促进了战后初期工会组织的急剧发展。从这一点来说，工会法的意义是重大的。由于这个工会法是在占领军总司令部指导下仿照美国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全国劳动

关系法(所谓瓦格纳法案)制订的,特别是在1947年美国将进步的工会法案修改为反动的劳资关系法(所谓塔夫脱—哈特莱法)之前制订的,所以是一个相当进步的法案。这种进步性质,也是当时推动日本工会组织急剧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美国在占领初期企图削弱日本的一个最露骨的表现,就是以拆迁设备作为战争赔偿。1945年12月鲍莱大使在其中间赔偿报告里提出(所谓中间报告即不是最终处理的报告),战后日本工业的生产规模大体上只能以“九一八”事变前夜的规模为限。例如,钢铁生产量限制在二百五十万吨以内,其差额部分——一千一百万吨的设备,要作为战争赔偿予以拆迁。全国工作母机生产设备的二分之一、火力发电厂设备的二分之一以及其它优良设备,都要作为赔偿加以拆迁。据说,日本用作赔偿的工厂将达一千一百个,等于平时工业生产能力的30%左右。

但是,与开始占领时相比,日本的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群众运动不断高涨,特别是工人和市民的反美倾向不断加强。美国对此深感不安,唯恐日本变成非美的国家。不用说,比这更大的问题还有国际形势的变化。美苏之间以及东西方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进入1947年后,这种情况又进一步恶化,美国终于在1946年3月宣布了杜鲁门主义,即对共产主义实行封锁的政策,到5月份,美国政府便在四大国之间难以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声明自己愿意单独承担日、德两国的复兴工作,接着在6月份公布了马歇尔计划,使东西方之间的对立愈益激化。

由于国际和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美国深切感到必须迅速改变当初预定的时间表,提前实现对日占领的根本目的,于是改变了迄今为止那种削弱日本资本主义的方针,一方面逐步地大幅度修改与此方针有抵触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路线,一方面开始加强扶

植日本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为将来的军事生产打基础。这就是所谓“美国占领政策的改变”，实际上，这是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本来面目的表现。

3. 初期政策的缓和

这种占领政策的“改变”，使占领初期作为大改革而明确宣布的各项主要经济政策，都变为缓和与温情脉脉的东西了。对于财阀，从来就没有肢解的打算。所谓“解散财阀”，主要是解散作为财阀总部的控股公司，亦即取消财阀的家族统治。总之，把财阀的外观改变一下再保留起来，这是美国的一贯政策。尽管没有遭到真正的分割，但在这一、二年间，财阀还是受到了一定的伤害，其它一些垄断资本利用“解散财阀”的时机取得了发展，新、旧财阀之间的差距从而缩小。例如开始解散财阀时，四大财阀^①及其下属公司，资本合计总额占全国的24.5%，十大财阀^②及其下属公司，资本合计总额占全国的35.2%，这种极高的比率，表明财阀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是经过分割之后，它们的相对地位已在某种程度上降低，陈腐的财阀家族的统治将不存在，垄断之间的竞争比之过去将有大幅度的发展。

尽管如此，在财阀康采恩中起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对外方面拥有很大权力的财阀银行，由于不受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制订于1948年7月）的约束，仍旧得以完整地存在下去，这也大大地减轻了财阀的分散程度。

占领政策的改变，对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影响极大。这项

^① 在解散之列的四大财阀，是指三井、三菱、住友、安田，1946年8月又追加富士产业（旧中岛飞机）。——译者

^② 在解散之列的十大财阀，是指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富士、野村、浅野、大仓、古河、鲇川。——译者

法律在正式制定之前，不仅日本、甚至连美国也有人激烈反对，因此在实施时，同美国政府原来的方针相比已明显缓和，法案的主要部分已被抽掉。于是指定为必须分割、改组的三百二十五家大企业，大都因“占领政策的改变”而被一一地取消分割。按此法律受到分割的实际上只有日本制铁（其钢铁部门一分为二：八幡和富士）、三菱重工（分为三家，后又合并为三菱重工业公司）、王子造纸（分为三家，即现在的王子、十条、木州）等十一家。

在这期间，作为解散日本工业、清洗财阀人物和排除经济集中的基础的远东委员会（FEC）第二百三十号文件的大部分内容，都被放弃了。实际上应当说，从1947年末起，所谓“解散财阀”、禁止垄断等削弱日本经济力量的政策，大体上已经开始出现变化的征兆。

在农村土地问题上虽然进行了第二次改革，但在进行以解放山林、荒地为主的第三次改革时，由于日本政府反对，总司令部不得不于1948年6月以“没有特殊必要”为由放弃了这项改革。

在劳动政策方面，占领初期，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于1945年10月与天皇会谈时，曾直接要求天皇积极促进工会运动。但是实际上，美国占领军却较早地开始镇压工会运动，在禁止二·一大罢工之后，美军对工会运动的弹压更步步加紧，日益向着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发展。

赔偿问题也是如此，美国国务院从1947年6月开始便采取了缓和的方针。在1947年到1948年春这段时间里，斯特莱克及杜勒帕两个调查团（团长杜勒帕是陆军部副部长，美国大财阀吉龙·利德的首脑之一）相继访日，先后发表了斯特莱克和杜勒帕报告书（杜勒帕报告书亦称约翰斯顿报告书），随后便逐步确定了提高日本工业水平，缓和甚至停止拆迁赔偿的方针。这样一来，鲍莱的中间赔偿方案也就不起作用了。实际上，在早期的拆迁赔偿中，只是

拆除了旧军工厂的一部分机械,从1949年5月起,美国政府已指示麦克阿瑟司令官停止中间赔偿,为中止拆迁赔偿准备了条件。到旧金山媾和会议后,拆迁赔偿已完全停止,由以生产新产品来进行赔偿的方式所取代,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

按拆迁赔偿的金额计算,斯特莱克方案比鲍莱方案少了70%,约翰斯顿方案又进一步少了26%,因此,实际拆迁规模已经变得很小,1947年末到1950年间,从各地军工厂拆除的工作母机仅为五万多台,约值一亿六千万美元,这就是向旧中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所作赔偿的全部内容。从金额上说,这个规模只不过是鲍莱方案的7%和约翰斯顿方案的27%。被指定用作赔偿的私人工业设施。大部分属于财阀公司所有,这些私人设备全部免于拆除,军工厂的设施也大部分免于拆除,其中多数后来都处理给私人企业。

在这期间,美国政府提前于1949年5月发出了停止中间赔偿的指令。对于这项指令,菲律宾和旧中国都立刻提出了抗议,随后以菲律宾为首的所有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都相继发表声明反对停止赔偿。尽管如此,无论是中间赔偿还是拆迁赔偿,正如以上所说,只有极少一部分得到兑现。

4. 重点生产和特殊的资本积累过程

在“占领政策改变”之后,美国不仅缓和了削弱日本资本主义的政策,而且采取了进一步加强日本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的方针。重点生产,正是与美国这种政策改变相结合而实行的重新开始生产的方式,旨在为走投无路的日本经济打开局面。在接近1946年年末时,日本面临的两大问题是:2月的“二·一大罢工”和2月之后的“三月危机”。当时传说,到1947年3月,工业部门的原料库存大都要枯竭,生产将急剧减少,供应不足的危机就要爆发,于是人

们不断高喊“三月危机”。实际上这个“三月危机”并未爆发。但是为了摆脱当时原材料库存濒于枯竭的严重局面，进而将工业生产纳入扩大再生产的轨道，日本在吉田首相领导下，以顾问之一的有泽广己教授为中心，制定了一个“重新开始生产”的计划。

当时的工业生产指数不过是战前的30%，有泽等人认为，将生产迅速提高到60%，便可结束通货膨胀，进而摆脱社会不安的危机，并强调只要制止通货膨胀，就能真正地重新开始生产。然而，要想把工业生产指数提高到战前的60%，就必须把煤炭生产由1946年的二千万吨提高到年产三千万吨，为此就必须要求占领军为钢铁生产部门提供重油，然后以增产的钢铁供应煤炭部门，使煤炭增加生产，再以增产的煤炭来促进钢铁增产，最后将这两个部门结合起来，使钢铁和煤炭同时增加生产。这种侧重于煤炭、或者说侧重于煤炭和钢铁的重新开始生产的方式，被制定方案的人们称为“倾斜生产”，即重点生产。

针对这项计划，美军总司令部答应向日本提供剩余的重油。由于得到美国的重油援助，在1946年末决定的重点生产方式，便从1947年开始进入执行阶段。但是仍然困难重重，并非象计划安排的那样顺利。单以增产煤炭这一项来说，也决不是仅仅依靠简单的计划所能推动起来的。在一场力不胜任的大战及其惨败之后的破坏和混乱状态下，要使已经陷入崩溃状态的再生产重新走上扩大再生产的轨道，没有复杂而庞大的组织和机构是不行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又必然要明显地加重工人和劳动人民的负担。

所谓组织机构，包括国家权力和财政金融机构。这里包括以美国占领军的武力为背景的国家权力和美国政府的援助物资（炼铁用重油、铁砂、原料煤和粮食等）、金融机构及其融资措施等，以及当时特别设立的中心机构复兴金融金库（设于1947年1月，简称“复金”）。还有各种公共团体（建立于1947年）作为辅助机构，以加强控

制。依靠强权，政府强行征收重税，强制农民以低价交售大米（分别实行于1947年和1948年冬）。进而制定了以一千八百日元为基本工资的新的物价体系（1947年7月），规定物价比战前增加六十四倍，工资比战前增加二十四倍，这就是一方面竭力压低工资标准，另一方面则大幅度地提高物价。

于是以日本中央银行的信贷为主要资金的复兴金融金库，便主要向煤矿部门并部分地向化肥和炼铁等工业部门提供了大量的融资（参阅第1表），在1947年和1948年两年内，融资的金额合计达一千二百五十九亿日元，相当于整个工业部门借款总额的三分之一（1947年度复兴金融金库的融资金额约为私人融资的一倍）。另外，这两年政府还从国家预算中提取八百五十亿日元以上的巨额资金（占岁出预算总额的12%以上），以价格差额补助等形式向企业提供。这些资金大部分落入了包括财阀在内的垄断资本手里。

第1表 “复金”对各工业部门融资金额
(1948年度末)

100万日元			
矿业	54,484	化学工业	10,059
(煤炭)	(47,519)	(肥料)	(6,030)
金属工业	4,389	电力业	22,400
(钢铁)	(3,526)	其它	25,444
		合计	113,777

(备考)根据“复金”调查资料。

这种极端依赖日本中央银行信贷的方法，势必引起通货的高度膨胀，加上国家特别会计^①项目上的庞大赤字的影响，通货膨胀更以猛烈的势头向前发展。急剧发展的通货膨胀，一方面使工人等

^① 特别会计(Special account)是日本国家财政预算的项目之一，以特别资金从事特别事业或以特别收入弥补特别开支等，这种国家预算叫做“特别会计”，例如产业投资特别会计、外汇资金特别会计、粮食管理特别会计等等，有数十种之多。——译者

劳动群众的实际工资大大下降，来之不易的工资提高部分，都被物价上涨给夺走了。由复兴金融金库慷慨地提供给垄断资本的大量贷款，却在货币急剧贬值的情况下，使他们在实际上大大地减轻了债务的负担（大部分借款实际上只偿还五分之一或七分之一便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垄断资本极其容易而迅速地进行了资本积累，再加上动员一切组织和全部机构的特别方法，垄断资本的资本积累，其规模之大和速度之快都令人难以想象。这就使已经陷入破产的垄断资本获得起死回生的机会，它们将为数巨大的资金投入生产，用作不变资本和雇佣廉价劳力的可变资本，从而得以重新开始扩大再生产。很明显，这与一般情况下的资本积累是不同的，不用说与资本主义初期的原始积累倒有相似之处，我暂时把它叫做“垄断资本起死回生的积累”。

5. 特殊积累过程所造成的后果

这种特殊的资本积累过程，就是将比较少量的美援物资如重油等投入生产，然后以其所增加的生产为“杠杆”，利用通货膨胀，扩大再生产。这种做法，在头一年的1947年里还有许多障碍，如钢铁生产增长很快，但煤炭增长较慢，以致工业用煤配额不足，使整个工业生产的增长幅度不大，相反地，通货膨胀却猛烈地发展起来了。到第二个年头即进入1948年时，煤炭产量迅速上升，大大突破了当初三千万吨的目标，工业用煤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参阅第2表）。

随着煤炭、钢铁两个部门的增产及其资本积累的进展，其它工业的生产也有显著增加，通货膨胀的发展速度却比上年有所缓和。从生产指数上看，1948年12月的工矿业生产约为战前1930—1934年平均的三分之二，除纺织品外，都恢复到接近于战前的水平。

第 2 表 工矿业生产的增长

(1946—1948 年度)

	普通钢材生产	煤炭生产	工业用煤炭配额	工业生产指数
	1,000吨	1,000吨	1,000吨	
1946年度	296 (100)	20,310 (100)	6,104 (100)	39.2
1947年度	480 (162)	27,170 (134)	8,467 (138)	46.2
1948年度	1,027 (348)	33,722 (166)	12,184 (200)	61.8

(备考) 工业生产指数包括工矿业和公益事业在内, 是综合生产指数 (企划厅公布), 以 1934—1936 年平均为 100 的日历年指数。

生产的大幅度增长, 使经济规模过小的危机得到克服, 于是“重新开始生产”的第一阶段得以实现, 以两年时间完成了当时的重点生产目标。根据政策, 被指定为重点部门的煤炭、钢铁、化肥等垄断资本, 都在这个时期恢复起来, 其它许多工业部门的生产, 也在这时随着走向回升。

与此有关的银行问题, 也简述如下。前面已经提到, 财阀系统以及其它系统的大银行, 依靠紧急金融措施, 从破产和崩溃的危机中摆脱出来, 同时又作为新日元借贷资金的提供者, 在极端缺乏资金的情况下立即取得了对工业部门的强大发言权。此外, 战时国家对企业的巨额补偿, 由于战败在战后不得不停止支付, 为了处理由此而产生的企业损失, 做出了“重建和整顿企业”以及“重建和整顿金融机关”的决定, 并于 1946 年 8 月进入实施阶段。由于中断战时补偿, 财阀系统的大银行与半官半民的兴业银行受到极大的打击, 但是它们利用重建和整顿的时机, 依靠美国(总司令部)特别保护和积极培植大银行的方针, 利用通货膨胀, 把巨大的损失转嫁给一般企业、工人、储蓄者及一般群众, 所以它们本身比工业部门更先一步地得到了恢复。再有, 重点生产、复兴金融金库的融资等也都为大银行的恢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从 1948 年 10 月开始, 财阀系统的大银行也暂时摘掉了财阀的帽子, 以新的外装重新

起步。

绝大部分垄断资本依靠重点生产得到恢复，多数中、小企业却困难重重，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也长期化了，再加上部分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中小企业的困难愈益严重。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中、小企业的工资水平都低于大企业，战后企业因规模不同而工资差距很大的现象就是从此时开始发生的。

在这特殊的资本积累期间，由于通货膨胀的急剧发展和1947年严重粮荒的再度爆发，在二·一大罢工受挫后陷入停顿状态的工人斗争重新活跃起来。特别是工厂、企业的工人斗争，从未因上级组织指导的混乱而有所减弱。例如在1948年的“三月斗争”中，各工会参加罢工的人数共达一百万人，规模空前庞大。与此同时，政府机关和公共团体公务人员也掀起了大规模的斗争。当时美军总司令部曾明令禁止全日本邮电工会举行全国性的同盟罢工，禁止全日本邮电工会和全国铁路工会举行地区性罢工，禁止政府机关和公共团体公务员工会要求给予假期等等的斗争；到7月份，麦克阿瑟又颁布了最高司令官“书简”，政府根据“书简”修改了国家公务员法，完全剥夺了公务人员的争议权和集体交涉权；11月份总司令部又提出“工资三原则”，企图阻止民间工业工会的斗争。这一系列非法的压迫和依靠实力的弹压政策，并未削弱工人的斗争，在麦克阿瑟“书简”影响下一度发生动摇的公务员斗争，也很快地恢复起来了。

在结束重点生产问题的论述之前，让我们再接触一下这个时期稍具特色的两个事件。第一是国家管理煤矿问题（简称“煤矿国管”）。重点生产开始后约半年时间，即1947年6月，日本组成了以社会党为中心的社会党与保守党的两党联合内阁。社会党根据自己的既定政策，主张由国家管理煤矿，但是煤矿资本与联合内阁中的保守党，因为这个办法带有社会主义倾向而极力反对，作为妥

协的产物，最后决定，为达到增产的目的，由国家接管煤矿。实际上，这不仅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倾向，与国家管理这个名称也不相符，所以到1950年为止，这个接管一直是临时措施，不论政府、煤矿资本或煤矿工会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执行国家管理的诚意，甚至连提倡者的社会党后来也很不热心了。因此，煤矿的国家管理终于成为一个无用的疣物，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便消失了。这种国家接管煤矿的失败经验，后来却成为煤矿工业遭受最大的危机时反对国有和国家管理主张的借口，从这一点看，过去的国家接管反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第二是1948年保守党与社会党的联合内阁芦田内阁时发生的“昭电事件”。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贪污案件，这样的案件虽然到今天也没有绝迹，但是战后初期，由于大资本家、政治家和官僚的特别腐败，这种贪污案件是层出不穷的。昭电事件是其中对世人震动最大、并引起强烈公愤的事件。昭和电工是一家有代表性的化肥公司，围绕着向这家公司提供复兴金融金库的巨额融资而发生的行贿和受贿问题，从该公司的总经理开始，包括当时的现任阁僚（前大藏大臣）经济安定本部长官栗栖在内，都遭到逮捕，社会党书记长、副总理西尾末广以至芦田首相，在辞职后也被逮捕起诉，芦田内阁不得不总辞职。尽管这个事件的疑点已经弄得一清二楚，但最高法院在最后判决时仍以一般难以认可的理由，把大部分问题都弄得糊里糊涂以后便结束了。

这一时期，为了增产粮食，国家对化肥工业垄断资本提供了特别援助，因此也把当时的工业生产称为“以煤炭、钢铁、化学肥料为重点生产”。所以上述两个事件，从广义上说，也是重点生产的副产品。

三、经济安定九原则与道奇路线

1. 匆忙的“稳定政策”

随着美苏关系的恶化,美国进行了所谓“占领政策的改变”,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由此得到加强,首先以重点生产方式揭开了“重新生产”的序幕,接着便走上了扩大再生产的轨道。

但是在这期间,在马歇尔计划支持下,西德及其他欧洲各国都迅速地取得了恢复经济的成果,因而这些国家在恢复生产和发展贸易上都比日本抢先走了一步,并成功地阻止了通货膨胀的急剧发展。美国乃急于缔结 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早日巩固在军事上可以对抗苏联的西欧阵营。当时在亚洲,中国解放军以破竹之势打败蒋介石军队,并席卷整个中国,这对美国来说也是它自己的惨痛的败北。尤其是 1948 年 9 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告成立,朝鲜半岛的政治形势又使美国陷入了日益加剧的不安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环球策略的一环,美国企图迅速将占领下的日本变为自己在亚洲最重要的坚固据点,使其成为反共基地,以对抗亚洲大陆上突然崛起的共产势力,阻止其扩大发展,并将其消灭掉。这种企图虽然在外观上与美国垄断资本将日本培育成商品和资本输出市场的意愿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统一的。这一点,美国陆军部长路易亚尔在 1948 年初的声明中已经和盘托出,他说:为把日本变成防御共产主义威胁的干城,必须促进并支持日本经济的稳定和独立。

日本经济要在稳定的基础上谋求独立,已经成为美国的国策。

1948年春，以调查团团长身份访问日本的美军前陆军部副部长杜勒帕曾经向芦田首相强调平衡预算收支的重要性，指出这是谋求经济独立的必要条件。同杜勒帕一道来日的美国陆军部约翰斯顿委员会在其报告书中（也称做杜勒帕报告书）明确指出，当时日本已经具有达到预算平衡的条件。为进一步推行美国政府支持日本发展经济的方针，1948年7月，总司令部指示日本政府公布了“稳定经济的十项原则”。

在这前后，作为收缩通货膨胀或稳定经济的对策，日本国内有过以吸收外汇为内容的“中间稳定”的设想，政府和中央银行也为此制订过试验性的方案。从战争结束到这段时间，在如何重建日本经济的问题上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稳定是复兴的必要条件，必须首先制止通货膨胀；一种意见则认为没有复兴便没有稳定，首先扩大生产才是重建经济的道路，实际上这是赞成通货膨胀的论点。正如当时大内兵卫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所谓中间稳定论，就是这两种观点的折衷，亦即一边复兴一边逐渐求得稳定发展的观点。但是，使急剧发展的通货膨胀缓慢地平息下来，逐渐达到经济稳定发展的看法，只是一厢情愿，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实际上，由于单一汇率制度的实行比预计的时间要早，上述设想便立即化为泡影。

另外，美国经济在1948年10月和11月达到高涨后便走向恶化。这是美国的战后危机，很多人认为它反映了战争结束的后果。它迫使美国政府尽量削弱对日援助，因而美国更加强烈地希望日本尽早实现经济独立。亚洲形势日益不利于美国，也使其增加了紧迫感。从另一方面看，日本政府虽然提出了“十项原则”，但对于收缩通货膨胀、提早实现经济稳定等等，并未做出认真的努力。美国政府从日本的生产及其它经济的恢复情况上，也看出了日本垄断资本那种相当顽固的态度，于是美国政府和占领军当局断然

站在前台（据当时安定本部副长官说，美方采取如此强硬的形式，是美国对日本政治力量不满的表现），采取不通过日本政府而以美国政府直接指令的形式，于1948年12月18日由总司令部公布了所谓“稳定经济九项原则”。

“九项原则”的内容可简单列举如下：（1）实行平衡预算；（2）改革税制；（3）限制信贷；（4）稳定工资；（5）扩大、加强价格统制；（6）改善外贸管理方式；（7）对出口工业的原料供应实行重点分配；（8）增加国产原料和工业品的生产；（9）提高粮食征集工作效率。以上列举的原则都是抽象的词句，从中很难了解具体执行时不断出现的重大问题。这九项原则的内容同“十项原则”几乎没有区别，最大的不同而且意义也极为重要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新增加了提早实施单一汇率制度。为了提早实施单一汇率，就必须贯彻执行与九项原则有关的计划。所以麦克阿瑟元帅在给吉田首相的“书简”中，以极其强硬的态度和严厉的措词，要求日本贯彻执行九项原则。他要求接受美国援助的日本人民在各方面忍受困苦，甚至暂时放弃“自由社会”所承认的一部分自由和权利，绝对不允许并严格取缔有碍九项原则和旨在反对九项原则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并认为这是提供援助的国家的当然权利。

组阁时间很短而且处于少数党地位的第二次吉田内阁，看到自己没有力量来镇压在各阶层中可能掀起的反抗运动，便在占领军的暗中指导下解散国会，举行了总选举，这才使民主自由党在众议院里获得了绝对多数，组成了第三次吉田内阁，从而为九项原则的实施一一做了安排。

2. 道奇路线的目的与计划

约瑟夫·道奇以公使资格，作为麦克阿瑟的财政经济顾问，于1949年2月初到达东京，立即以他为中心制定了执行九项原则的

具体方案。道奇是美国底特律银行总经理，他在美国占领下的西德取得了指导制定财经政策的实际经验。他的方案以及在他领导下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通称为道奇路线。

在社会党两次组阁失败之后，在中国解放军取得辉煌胜利的形势下举行的总选举，使共产党人大举进入国会，它的候选人有三十五人当选。所以吉田首相在组阁后的第一次讲话中特别提出反共策略，强调以稳定国民生活作为根本对策，而以停止通货膨胀作为稳定国民生活的先决条件。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态度更为彻底，道奇路线的根本任务就是全力以赴地稳定经济。与道奇一起再次来日的路易亚尔陆军部长在谈话中公开表示，只有建立健全的经济，才能对抗共产党的扩张；建立健全的经济，是美国占领政策的基点。道奇也就这一点作过极其扼要的发言，他在美国下院作证时说，与经济稳定有关的真正问题，是人们对政治和社会的反应。当时日本的重要问题，是保证政治和工资的稳定，维持一种能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发展的较高的生活水平，为此必须提高实际工资，重要的是提高货币的购买力，归根结底是提高粮食配额和棉制品的销售量。从最后一点看，可以说他对一个国家如何全面扩大利润和扩大资本积累的基本方法，是颇有体会的。总之，非常明显，解决与日本国内外共产主义势力相抗衡的问题，是道奇路线的根本和中心。如上所述，他是以自己的方法来对付共产主义势力的，当时他提出的目标是加强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其中心目的却在于反对共产主义势力。

上面概述了道奇路线最重要的目标，以下再说一下这条路线的具体内容、结构和概略。

道奇认为，为了复兴日本，首先必须稳定经济和收缩通货膨胀。道奇路线对付通货膨胀的策略是采取所谓“一劳永逸”的方式。他在自己的声明中这样说道：“夸耀生产指数提高和出口增加

是愚蠢透顶的行为，因为实际上这不过是美国的援助资金、（日本国家财政的）补助金和赤字扩大的表现而已。”他还作过一个当时很有名的比喻，他说：“日本经济好象骑在竹马上一样，竹马的一条腿是美国援助，另一条腿则是国内的资金补助机构。把竹马的腿弄得过长，就有摔倒而将脖子折断的危险，现在必须迅速把马腿缩短。”

第3表 租税及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战后道奇路线时期和战前的对比

（单位：亿日元）

年 度	国 税	地 方 税	合 计	国民收入
1934—1936年度	12 (8.5)	6 (4.5)	17 (13.0)	144 (100.0)
1940年度	375 (10.4)	37 (1.0)	412 (11.4)	3,609 (100.0)
1947年度	1,892 (19.5)	202 (2.1)	2,093 (21.6)	9,680 (100.0)
1948年度	4,460 (22.7)	777 (4.0)	5,237 (26.7)	19,616 (100.0)
1949年度	6,361 (23.2)	1,424 (5.2)	7,785 (28.5)	27,373 (100.0)
1950年度	5,702 (17.0)	1,883 (5.6)	7,585 (22.6)	33,610 (100.0)

（备考） 根据经济企划厅编《战后经济史（财政金融篇）》第123页。括号内数字是对国民收入的%。

制定平衡的预算 制定平衡的预算是“九项原则”的第一个重要要求，道奇认为这是在稳固的基础上重建日本经济的根本条件，他责备日本人对这一点认识不足和漫不经心。1948年度的预算只是在一般会计^①上采取收支平衡的形式，而在特别会计上则是庞大的赤字，因此该年的全部预算赤字高达一千五百亿日元。与此相反，由道奇制订的1949年度预算，包括一般会计与特别会计在内，不仅综合平衡没有赤字，而且还有二千五百七十七亿日元的巨额盈余（相当于岁出总计一千八百亿日元的14%）。这样，道奇预

① 一般会计(general account)是日本政府最基本的会计，它以租税收入、发行国债作为收入的财源，为推动一般行政工作(如教育、外交、国防等)而提供经费。——译者

算已经超出平衡的范围,成为超平衡的预算。与上一年度比较,一般会计的岁出有大幅度的增加,与此相适应,岁入也有大幅度的增加,租税收入比上年一举增加近50%,因此国民收入中的租税比率(国税总额+地方税总额/国民收入)创战后最高记录,据政府公布为28.5%,比战前1934—1936年的平均比率13.0%增加了一点二倍,这是惊人的高比率(参阅第3表)。由于道奇路线征收了远远超过战时的重税,低收入阶层平添了难以忍受的负担。

另一方面,二千五百七十七亿日元的剩余资金,既可由国家用来偿还债务,使通货膨胀得到收缩;又为金融机关增加了头寸,使其在有利条件下为垄断资本等提供资金。总之,通过政府清偿债务,既煞住了通货膨胀,又促进了资本积累。但是教育、文化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预算却蒙受牺牲,被大量削减。如上所述,大幅度地增加国税,是与民主自由党竞选时所许诺的减税大相径庭的。不仅如此,根据九项原则,为了改革税制和加强课税,日本政府还根据总司令部的命令创设了国税厅。随后,夏伍普税制调查团于1949年5月来日,协助改革税制。夏伍普方案从根本上说就是九项原则在税制方面的具体体现。但是,银行家道奇与大学教授夏伍普之间在资本积累的方式上存在着若干不同的意见。道奇主张尽量多收租税,以偿还国债(公债等)和充实银行的资力。总之,他是以增税和加强银行为中心来进行资本积累的,是银行中心主义。与此相反,夏伍普则主张以减税的方法来减轻个人、企业、特别是大资本家的租税负担,以促进资本积累。当时虽然根据夏伍普的方案进行了税制改革,但由于有各种反对意见,他的方案并未得到全面贯彻。因此大幅度减税的税制改革,从1950年度开始执行的情况来看,虽然减少了一些税务负担,但结果还是沿着道奇的路线,只是减轻了大资本家的负担,而中小企业和人民群众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所以整个国税的减少额比预料的

要少得多。在地方税方面，也是在建立地方财政的名义下加重了低收入阶层的负担。进入 1950 年度后，由于在岁出方面大幅度地削减了价格补差的资助，在岁入方面通过税制改革实行减税等原因，国家预算的规模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但是整个预算仍与上年度一样有很大的盈余，可用作偿还债务的资金。因此这个预算依然是超平衡的预算。

此外，复兴金融金库从 1949 年度起完全停止贷款，同时开始回收过去的信贷，这也消除了通货膨胀急剧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但是复兴金融金库自身的债务，作为政府债务的一部分，也要在 1949 年度内大量偿还。

单一汇率的设定 其次，必须提到的是单一汇率的设定，其意义之大，决不次于超平衡预算的制订。提早实施单一汇率对于执行九项原则的作用前面已有叙述。此外，单一汇率制还有其本身更为重要的意义。不设定单一的汇率，日本经济、日本商品和资本市场，便不能与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和市场建立真正的联系，商品和资本的进出口也就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仅不能称为一个出色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战后变化很大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要想得到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现实上几乎完全与外界隔绝、在温室中培养起来的日本工业经济，一旦被抛露在冷空气之中是否能够站住也是问题，因此日本极力把这个单一汇率订得很低，尽量使日元处于疲弱地位。这样一来，国内的通货膨胀非但无法控制，反而会急剧发展，所以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提高汇率，使日元过多地升值，出口贸易就要发生困难，而且这样一来进口货物价格就要降低，为了竞争，国内制品的价格也必须下降，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经济破产，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潭。制止通货膨胀，保持通货稳定，这在当时无论如何也是必要的，但是一个中心的问题是，既能防止通货膨

胀又能刺激企业促进生产的单一汇率，究竟应该维持在怎样的高度上。

结果是，美军总司令部于1949年4月23日突然指示日本政府，从4月25日开始实行一美元兑换三百六十日元的官方汇率。一美元等于三百六十日元的汇率，与通常以战前为基期的1949年的日美两国的物价水平对比，大体相当，但这一日元汇价比一般预期的幅度三百二十日元至三百六十日元偏低一些，对出口工业的打击多少有一些缓和，而自行车、金属餐具、陶瓷器、船舶等范围相当广泛的商品的出口则可能因此陷入困境。面向国内市场的商品，也因废除价格补助制度，在与价格较低的进口商品的竞争中会发生相当的困难。

一美元兑换三百六十日元，作为单一汇率还有其划时期的意义。这就是它使日本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联系起来，特别是加强了与美元的联系，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战后以来日本对美国资本主义的从属关系，并为将来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加深打下了基础。

对外贸易方式这时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外贸易几乎完全处于停顿状态，但在一笔笔具体贸易都必须取得总司令部批准这种严格的监督之下，国营贸易开始稍有增加。从1947年8月开始，部分地准许进行没有自主权的所谓“有限制的民间贸易”。随着道奇路线的实施，通常形式的贸易有所恢复，民间贸易范围逐渐扩大，出口从1949年12月开始、进口从1950年1月开始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但是当时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商社势力比日本商社强大得多。

回头资金的设置 与编制超平衡预算和设立单一汇率平行，作为道奇路线的另一翼，还设置了美国对日援助物资回头资金。资金的使用置于占领军最高司令官的管理之下。这也是意义很大

的措施。

前边已经提到，道奇在声明中曾经主张迅速削减美国援助和国内补助金。实际上，这种制度是早应废除的。在1949年度的预算中，补助金的金额至少比上一年增加近一倍，占岁出总额的30%；同样，对日援助也在继续增加，由日历年1948年的四亿六千万美元增加到1949年的五亿三千四百万美元（经济复兴计划委员会资料）。现在不仅要改进处理援助物资上那些暧昧和不完备的手续，据美国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有效地使用这种援助出发，设立回头资金制度。这种制度，就是要求日本政府将贩卖美援物资收到的货款存于特别会计账户，亦即将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冻结起来，置于占领军的管理之下。日本政府只有取得总司令部的同意，才能一笔一笔地使用这批资金，并且限定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和用作重建经济的直接投资。从实际使用情况看，由1949年度到1951年度支出总数三千一百六十五亿日元中，偿还政府债务和购置公债占34%，对公私企业的投资占65%（参阅第4表）。

美援物资的回头资金，通过偿还政府债务和购买公债，在收缩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很大效果。同时，通过购买和偿还金融机关的公债，不仅大大加强了大银行及其它金融机关的资力，大大提高了金融机关的地位及其统制力量，也使有关产业的垄断资本得到了加强。在这三年当中，以美援物资回头资金对企业进行的直接投资中，私人企业占55%，政府企业占45%；在私人企业中，电力和海运方面占大部分，在政府企业中，铁路，电报电话、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以及住宅金融金库等政府金融机关也占了大部分（参阅第4表）。基础工业部门的垄断资本，多数都掌握着日本的经济命脉，因此将回头资金用于复活日本垄断资本主义，从美国或占领军的立场来看乃是正当和必要的投资，从美国的军事立场来看，也是必要的。

第4表 回头资金支付实况

(1948年度—1951年度)

开支总额及其内容			政府企业投资		
	亿日元	%		亿日元	%
支付总额	3,165	100.0	政府企业投资总额	884	100.0
1. 偿还债务	1,118	35.4	1. 公共事业	109	12.4
购买国债			2. 国营事业	460	52.1
2. 公私企业投资	1,951	61.6	a. 电报电话	240	27.2
a. 政府企业	884	27.9	b. 国营铁道	190	21.5
b. 私人企业	1,067	33.7	c. 国有林野	30	3.4
3. 其它	94	3.0	3. 政府金融机关	315	35.5
私人企业投资的内容			a. 开发银行	100	11.3
私人企业投资总额	1,067	100.0	b. 输出银行	75	8.5
1. 电力	432	40.6	c. 住宅金融公库	100	11.3
2. 海运	427	40.0	d. 农林渔业金融公库	40	4.5
3. 煤炭	64	6.0			
4. 钢铁	22	2.1			
5. 其它产业	35	3.2			
6. 中小企业	34	3.2			
7. 其它	52	4.9			

(备考) 据大藏省理财局回头资金科编《回头资金记录》制成。

1949年以来的三年期间,日本私人产业从外部筹措的设备资金中,财政资金比率最大,占37%,而财政资金中的70%(占全部外部资金的26%)是回头资金。特别是在1949年和1950年上半年金融紧缩的情况下,回头资金的比重如此之大,对产业的发展动向,无疑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美援物资的回头资金在推行道奇路线过程中,发挥了作为控制财政、金融、工业等有力手段的机能。此外,回头资金有时还被总司令部用作迫使政府对美国俯首贴耳的手段。这里有例为证。战时为了由国家管理电力,成立了日本发电送电公司(简称“日发”),战后根据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决定解散“日发”。后来将解散“日发”作为电力事业改组交给新设的公益事业委员会来

进行，但由于总司令部在改组的方针上与日本垄断资本的根本想法不一致，以致电力事业改组委员会内部分歧很大。后来按照总司令部的方针，将“日发”分割为九家，但因国内各方继续激烈反对，此案终于在国会上遭到否决。于是总司令部不得不在1950年11月作为波茨坦政令发布指示，解散“日发”的方案才勉强通过。当时，总司令部已明确表示，如果解散“日发”方案继续遭到反对以致电力事业的改组推迟，就以停止为电力事业提供美援物资的回头资金来施加压力。

设立回头资金后，美国对日的物资援助仍以粮食为主，其它还有石油、医疗品、棉花等。这种以剩余农产品和过剩商品为主的物资“援助”，首先是表示美国对日本的恩赐，然后在日本国内抛售这些剩余物资，再以抛售的收入作为道奇路线下的调整资金来使用，有时作为必要的压力手段来利用。因此回头资金的设置，对美国来说真是效率极高而妙味无穷的方策。

3. 道奇路线执行经过与结果

道奇路线是道奇于1949年2月到任时开始制订的。道奇路线开始执行时就出现了迟发或欠发工资的问题，全国私人工业裁减人员的现象不断增多。从1948年末开始，中、小企业破产现象也进一步扩大了。4月以后，随着超平衡预算的实施、单一汇率的设立、美援物资回头资金的设置，道奇路线正式形成。这时货币流通额的增长趋于停滞，通货膨胀暂告平息（参阅第5表）。但是，阶级对立却大大加深了。

道奇路线的实施，采取了所谓通货紧缩政策（即在不减少生产和就业的情况下收缩通货），对于来自财政方面的紧缩的影响，则由金融机关积极提供贷款来消除，这就是以缓和金融的方法来维持生产的上升，同时压缩国内的购买力，尽可能将商品用于出口。

第5表 战后日本银行券的膨胀及道奇路线加以制止的情况

日本银行券流通额		日本银行券流通额指数(战争结束时流通额=1)
	100万日元	
1945年末	55,440	1.9
1946年末	93,397	3.2
1947年末	219,141	7.5
1948年末	355,280	12.1
1949年末	355,311	12.1

(备考) 据日本中央银行《本邦经济统计》，指数是著者计算的。

然而在执行这个路线的初期，美援物资的回头资金的运用投资方面没有进展，因而银根比较吃紧。出口贸易也因美国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而困难重重。工矿业生产虽然没有下降或者呈停滞而略有上升的趋势，但消费却停滞不前而且趋于下降，因而存货剧增。于是银行大力增加库存贷款，使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迅速扩大，一时出现银行贷款过多的状况。

尽管如此，大多数中、小企业并没有得到贷款，加以课征重税和撤消经济统制，需求和订单减少，因此中、小企业破产和合并现象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大幅度全面下跌，黑市价格也明显降低，但由于废除价格补差，政府的牌价上升，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由于生活费用提高、税收增加、劳动强度加强以及失业等原因，工人阶级承受极大的负担。被解雇的工人数目，在1949年一年中估计近百万人。尽管不少大资本家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打击，但与中小企业相比，一般地说没有问题，而且有实力的企业还相当稳定，特别是金融机构，在道奇路线下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1949年秋后，由于美援物资回头资金的投放和增加滞货贷款，形势有所缓和。但是9月份英镑突然贬值30%，日本的出口更加困难了。另一方面，与英镑贬值相同，日元汇价也发生了预期的下降。于是反对道奇路线的空气一度高涨起来，政府也开始考虑改

变政策的问题。尽管国际经济形势已经出现好转，但日本经济状况一直到1950年也未见改善，而且美国政府和道奇不仅不缓和道奇路线，甚至表明了坚持的方针。到5月份时，日本中央银行和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金融的方针，于是一场真正的危机就要爆发了。正当此时，6月25日突然爆发了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事态遂为之一变。虽然已经处于道奇路线所造成的危机前夕，但并未发展成为真正的危机。从表面上看来，这场危机只是一种特殊的萧条而已。

4. 国家统制的急剧缩小

由战时到战后初期这段时间，全部经济还是处于国家的严格统制之下。国家对经济的直接统制虽然从“九一八事变”时便已开始，但是真正的统制经济还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事情。“七七事变”一发生，日本就制定了各种重要的经济法规，第二年即1938年便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这项法令既是战时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基础，又使国家对经济的直接统制急剧扩大与强化。所以从战时到战后，在国家统制下，日本的经济活动和国民生活都被捆得死死的了。

如上所述，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曾一度倾向于废除国家统制，但在物资奇缺、极端贫困而混乱的情况下，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只能火上加油。于是很快又回到老路上去，国家总动员法在1946年失去效力之后，政府就公布了新的临时物资供应调整法，以此为基础，才废除了国家直接统制经济的战时方式，采取了以经济安定本部（经济企划厅的前身）为最高经济机关的战后新方式。但是，这样一来，反而加强了对生产、分配和价格等的统制。在1947年的社会党内阁时期，又成立了由政府一手收购和贩卖煤炭、石油、肥料、粮食和酒类等的一系列分配机构和其它各种分配机构。

特别是1948年末颁布的“九项原则”中提出要加强物价统制，必要时还将扩大统制范围，以及加强粮食的集中管理等等，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统制，并没有迅速缓和或撤消这种统制的迹象。但是进入道奇路线时期以后，大幅度削减价格差额补助以及将控制经济的中心由财政转向金融方面的设想，必然或至少要缩小甚至废除国家对价格的统制以及其它的直接统制。不难理解，作为对将来的期望的一种姿态，道奇总要表示希望推行自由经济。然而作为当时的实际问题来看，道奇究竟打算把经济统制撤消到什么程度，态度尚不明朗。实际上，由于大大削减了价格的补差，物价已大幅度地上升了。生产虽然回升，但在道奇路线下的国内购买力却急剧降低，道奇本来企图压缩国内需求以增加出口，但出口却意外地不振，致使生产严重过剩。自由价格与黑市价格大幅度下降，政府牌价与黑市牌价之间的差距全面地迅速接近起来，物资的供求关系又趋于缓和。生产资料与消费物资的配给以及价格的统制等等，从1949年4月起便大幅度撤消或被调整，一系列的专卖机构，有一部分被改组，大部分被解散了。

从1949年到1950年间，以极快的步伐废止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统制。朝鲜战争爆发后，以战略物资为主的各种物资，一度出现世界性的短缺，于是总司令部和道奇又不得不部分地恢复经济统制。尽管如此，废除统制的方向仍然没有发生重大变更。因此到1951年年中，除主食价格和主食分配还由国家直接统制外，其它的直接经济统制已被全部废除。

以道奇路线为开端的“排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恢复自由经济的本来面貌”——所谓价格机制的恢复有了急剧的进展。中小企业，最初对“撤消统制”的做法抱有最朴素的期望。因为经过长时期的战时和战后的国家统制，它们都成了大资本和垄断利益的牺牲品，故对撤消统制寄予很大希望。然而实际上，撤消统制根本没

有给中小企业带来任何好处，不仅如此，由于竞争激化等原因，反而使拥有强大力量的垄断资本，愈发加强了对中小企业的统治地位。实际上，废除统制和实行道奇路线的结果，中小企业受到了大规模的排挤，因而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垄断资本与中小企业的差距绝对地扩大了。

从形式上看，除极少数例外，国家对经济的直接统制已全部废止。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对经济失去控制，恰恰相反，国家对主食的直接统制，以及通过增减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控制经济的现象，至今仍然顽固地保存着。此外，当时国家对贸易和外汇的管理虽已大幅度缩小，但也没有完全废止，而且政府日益重视通过通货管理和财政制度来实现国家对经济的统制。

5. 在道奇路线袭击下的工人阶级

如上所述，“九项原则”的目的和本质在于压制共产党和活跃的工人运动，在于谋求劳资协调和加强资本家的地位。故在“九项原则”公布的次日，总司令部的劳动处长便露骨地劝告各个单位，停止年末的罢工活动。

社会党认为“九项原则”从来就是它的方针；共产党则认为“九项原则”是复兴日本经济的基本原则，问题在于由谁并为谁来推行这些原则。两党都完全赞成“九项原则”，并认为日本政府有忠实执行美国政府提出的这些原则的义务。工会对这九项原则也未表示反对。因此在“九项原则”基础上形成的道奇路线，便开始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攻势，特别是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系统的工会或工会活动家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就使斗争落后而一再受挫的工会运动，又陷入了预料之外的困境和混乱。反对共产党上层领导的民主同盟派（简称“民同派”）的工会干部和社会党，为了削弱共产党的势力，不惜一切地破坏工人团结。为了这个目的，政府和自民

党对“民同派”所领导的政府机关及公共团体职工要求提高工资等等，也表示了让步和协助，从而大大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对抗力量。

在这种状况下，道奇路线从1949年初期开始便对劳动人民展开了进攻。首先是扩大裁减人员，迟付或少付工资，进入2、3月时，这种状况进一步扩大，并且从中小企业波及大企业。4月以后，开始执行道奇的超平衡预算，于是与一般会计和特别会计有关的部门，都大量地裁减人员，裁减的幅度分别为30%和20%。从7月开始，以国营铁道为首的政府部门，又大规模地裁减人员，进行“行政整顿”。私人企业的人员裁减也以7月为高峰，达到了惊人的大规模。1949年中，被裁减的人员虽然没有准确的数字，但估计公务人员有二十万人，私人企业约八十万人，总计近一百万人。在此次人员裁减中，首当其冲的是工会组织的活动分子。

如此大规模地裁减人员，当然要引起劳动人民的反抗，这种斗争在初期是相当激烈和广泛的。但是当7月以国营铁道工人为中心的工人斗争处于高潮时，发生了下山事件；接着是三鹰事件；8月又发生了松川事件。这三大事件的发生都与国营铁道有关，因而被宣传为共产党和左翼工会的阴谋，这种宣传的目的是想使左翼势力陷入困难境地。不管怎么说，这一连串奇怪事件对国营铁道工会的斗争起到了打击的作用，而且以此为开端，即从7月以后，工人斗争进入了低潮，“民同”系统陆续地脱离了各工业部门的工会组织以及全国工会同盟等左翼组织，于是战后在日本工人运动中居绝对优势地位的左翼系统丧失了主导权。从1949年秋季开始，这个主导权便为“民同”系统所控制。在工会运动中共产党的势力急剧下降以及工人阶级斗争的后退，这正是“九项原则”下道奇路线的最大目的之一，而这个目的，也只有通过强制的办法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实现。但是工人阶级绝不是简单地后退了，他们对残酷地牺牲工人利益的道奇路线进行了反抗，通过1949

年年末要求发放年终奖金和1950年的“三月攻势”，这场斗争取得了广泛的开展。此外，要求大幅度修改道奇路线的“民同派”的各种势力也联合起来，为成立总评准备了条件。

道奇路线制造了庞大的失业队伍，总的说来就业人数大量减少，在中小企业中减得最多。经过斗争，一般地说，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多少有所提高，但是由于企业筹措资金困难而不能进行设备投资，完全靠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来维持生产。如果将劳动强度考虑在内，实际工资并没有增加，加上失业人数激增，更谈不到实际工资的增加。

6. 战后初期的农业

这里再简单地介绍一下当时的农业情况。

日本农业由于长期战争的关系，土地已经荒废，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农业的生产力极端低下。而且由于战败，当时农村拥有数量相当庞大的离职人员、由海外撤退的人员以及战时疏散在农村的人员。因此农村人口急剧扩大，农户增多，特别是小农户激增。日本的农村耕地面积在1931年为五百八十万公顷，1946年减少到五百万公顷，1950年大约仍是这个数字。农户总数从战前昭和初期到战时中期大约有五百四十万到五百五十万户，战后的1947年增加到五百九十万户，1949年更增加到六百二十四万户，为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战后初期农户手中都有粮食，所以当时苦于极端缺粮和黑市价格高涨的城市居民，对农户有反感。但是对农民来说，不管表面上如何，实际上生产已趋于缩小，加以国家强行低价征购大米以及租税负担等等，大部分农民的生活还是相当艰苦的，不少农民不得不依靠黑市收入和进城做工来维持生活，这也是实际状况。

1946年决定进行第二次农地改革，这是日本资本主义制度下

相当大的变革。这场改革，以占领军的力量为背景，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迅速取得进展。从1947年3月开始的一年当中，政府顺利地收买了地主的土地，在1948年里又顺利地将这些土地卖给了农民。到1950年为止，被解放的农地约达一百九十五万公顷，基本上实现了解放农地二百万公顷的目标，近80%的佃耕面积得到了解放。因此第二次农地改革，在这一年里，实际上以很好的成绩告终。此次农地改革的效果虽然不可能立即表现出来，但由于废止了高额的地租，特别是农民分得了土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在短短的数年之内，生产和收入以及农业投资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这就为农民提高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此次农地改革虽然使寄生的地主制度解体，为农民提供了土地，但是当局并未打算进一步从根本上解放在农民中占多数的小农户，也不想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来进行这场斗争。所以此次农地改革虽然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但还是把农民限制在小生产者的范围内，扩大生产也只限于个体农户所经营的范围。农地改革原则上是将拥有三町^①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加以分割，使农业的生产单位化小。但是后来当日本的生产力在非农业部门取得很大发展时，这种分散的农户便成了农村经济广泛分化的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寄生地主制度的解体，农民运动失去了过去斗争的主要对象，加之农民小私有者意识增强，因而农民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但是为了推进以恢复经济为目标的重点生产，尤其是为了在短期内实现资本的迅速积累，资本家要求工人拿最低的工资，政府极力压低了主食的征购价格。劳动群众的购买力极低，也为进口粮食增加了压力。因此在农业生产还没有充分恢复起来的时

^① 町，日本土地面积单位，一町约合一公顷，即九千九百十八平方公尺。——译者

候，从1948年春季开始就提早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倾向，农产品价格开始下降，农村经济形势恶化。进入1949年后，由于道奇路线下的大幅度增税和消费能力的急剧减退，上述生产过剩的倾向又进一步突出起来。因此1948年以来，由于重税和过多的征购等原因，各地甚至出现“放弃耕种”的情况，到1949年这种情况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四、朝鲜战争与景气的出现

1. 从道奇危机走向“朝鲜景气”

在加强紧缩金融的方针下，道奇路线下的危机更加深化的时候，1950年6月17日，美国国务卿顾问约翰·福斯塔·杜勒斯（后为国务卿），在远东旅行途中出现在日本。他在日本仅仅停留了一个半小时，便匆忙地飞往南朝鲜首都汉城，在那里他同李承晚总统及国防部长举行了会谈，然后视察了三八线的最前方，于21日又出现在东京，参加了由美国抵日的国防部长、联合参谋部主席等与麦克阿瑟总司令官举行的秘密会议。23日夜，南朝鲜军便越过三八线，猛烈轰击北朝鲜军的阵地。6月25日，两军进入交战状态。朝鲜战争终于爆发，27日，美军便在南朝鲜出动了。

南朝鲜在很早以前就要求美国援助，企图北进，这是毫无疑问的。原来的计划是，先由南朝鲜军进攻北朝鲜军，然后美军按约以援助形式出兵参战，西方各国有很多足以证明这一计划的材料。从杜勒斯在开战前夕辗转于日本和南朝鲜之间的诡秘行动上也可以清楚看出，这场战争与其说是“北方先行侵略”，倒不如说是南朝鲜“对北方发动进攻”更为符合实际。

南朝鲜原以为可以轻易战胜北朝鲜军，美国的估计可能也是如此。这与希特勒对苏开战时的错误估计一样，甚至远远超过了希特勒的错误估计。

既然这场战争是在美国与南朝鲜紧密联络下有计划地进行的，就必须把道奇路线也考虑在内。朝鲜战争是在道奇路线面临严重局势时爆发的，不是偶然事件。是否一切都按预定计划进行

还难以准确判断，同时道奇作为最高司令官的财经顾问，事先也不可能得到开战日程的详细通知；但是必须看到，为确保日本这块反共基地，而急于重建和加强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道奇路线，没有遭遇更大的困难便告结束，这也是道奇所没有预料到的朝鲜战争爆发的结果。

从另一个角度广义地说，必须看到，这也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发生了效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对日政策的改变”使日本垄断资本主义体制得以迅速地重建起来，接着日本的产业也很快地得到恢复，从而对在朝鲜作战的美军立即发挥了作用。

2. “朝鲜景气”的出现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处于道奇路线下的日本经济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然不是所有部门都因战争而突变，即使有所变化，也因部门不同而差别很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变化的大小、缓急也各有不同。

战争的爆发，首先使物价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本来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即从废除物价统制时起，物价便已广泛地上涨，当时美国采购战略物资和扩张军备，引起国际物价上涨，从而影响到日本，使其国内物价在这年春后重新上涨。朝鲜战争开始后，由于在日美军紧急采购补充物资，而且估计战争将要扩大，在国内外的采购将趋于加紧，于是物价又急剧地上涨起来，特别是以纺织品和金属类为中心的物价涨势最为猛烈。例如棉纱价格在战争爆发后的一个半月内上涨了一倍半，钢板价格在四个月内上涨约一倍。所以当时国内把汉字“绞丝边”（糸）和“金字边”（金）等都作为“景气”和“暴利”的代名词来称呼。

尽管物价上涨有较多的投机因素，但是在需求剧增而供应不

足的情况下，物价总要沿着全面上涨的方向发展。因此，日本中央银行的批发物价指数，从6月到12月间上升了23%，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34%，消费资料价格上涨11%，前者上涨最为突出。日本政府为抑制物价上涨，于8月份制定了取缔暴利的对策纲要，但是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相反地，由于战争使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在道奇路线下积压的一千至一千五百亿日元的庞大物资，在大量特需和出口增加之下立即消散了。

股票的动向与物价不同。战争爆发初期股票曾一度上升，随着战局对联合国军不利又下跌了，后来虽然在小幅度的升降中起伏，但由于对战局的担心和浓厚的警惕气氛的影响，股票行情一直处于混乱状态，进入1951年后才开始大幅度回升。从战争打响到1951年3月为止，股价指数（东京市场）上升近50%。

如果分阶段来看战局变化，第一阶段应是战争打响后，北朝鲜军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席卷南朝鲜，一直把联合国军赶到半岛南端的时期；第二阶段是联合国军在仁川等地大举登陆（9月15日），一直入侵到中国国境的时期；第三阶段是中国派遣人民志愿军（10月25日），美国陆军遭到了历史上最大的失败，联合国军被推到三八线以南，北朝鲜大举反攻的时期。在这时期，还发生了美国总统扬言要使用原子弹和罢免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职务等惹人注目的事件。第四阶段是由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停战方案开始的（1951年6月23日）。以这个提案为开端，于7月开始举行停战谈判，经过两年的曲折斗争，终于签订了停战协定（1953年7月27日）。这是联合国军对北朝鲜狂轰乱炸，战局始终处于胶着状态，以及美国的反攻企图完全化为泡影的时期。

美国占领日本后，一直通过日本政府，以日本国家预算中的战争处理费来筹措驻军物资。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便改变了方法，立即撇开日本政府，由自己出钱，直接在日本国内筹措战争所必需

的物资和劳务。为了区别于日本政府的间接筹措，故称此为特需（特别需要）。

以上所说的紧急军用物资，在战争初期都是作为特需从仓库中提取的，这为道奇危机下的过剩库存物资提供了可观的“销路”。此后便不是临时的应急筹措，而是根据美军的筹措计划进行广泛的订货。于是日本正如美军和垄断资本所期望的那样，作为美军的前进基地和兵站基地发挥了巨大作用。

随着战局阶段的变化，特需物资有时以作战资材居多，有时以民用资材居多。例如第二阶段以后，战车等武器修理任务增加；到第四阶段，比较简单的武器如大炮和炮弹等制成品的直接订货，包括从棉布、麻袋到建筑用钢材、军用卡车、凝固汽油弹、坦克、迫击炮等范围广泛的购买，便大量地增加了。其中主要的是金属和金属制品、棉制品，卡车等运输工具，煤炭以及武器的修理和改装，运输、通讯等劳务方面的供应。

特需合同数额随着时期的变化有很大的增减，因此是一种极不稳定的需求。接受订货的厂家有时也很赚钱，但产品被压价收购的也不少。关于这些问题，通产省编印的《战后十年经济史》中作过令人注目的描述：“关于特需的显著特征，……在于其订货的无计划性、变动性、缺乏持久性以及人们易于遭受愚弄这一点。特需合同完全是以美方的筹措机关为主并按美军的筹措规则来签署的，而且强迫签订不符合日本实际情况的合同条款”，该书还列举了“合同的从属性和订货的不等价交换”等情况。不仅如此，该书还指出，“与经济军事化和对美国的从属性相比，特需还起了容许并支持国内物价与国际价格相背离的恶劣作用”（见通产大臣官房调查课编《战后十年经济史》第413—414页）。关于特需对日本产业的全面影响，在经济企划厅编辑的《战后经济史》中令人注目地这样写道：“这种特需对日本经济和产业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一个

时期内既使供求发生混乱,又使特定部门的生产取得了飞跃的发展。……结果造成了我国产业结构的畸形化。”(《战后经济史》总观篇,第234页)

关于对特需的依存问题后面还要提到。以上所述,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特需的种种不利方面。但是特需毕竟在顷刻之间为日本创造了巨额的外汇收入,这也是明白无疑的事实。战争开始后的一年间,特需的合同金额已达三亿三千八百十六万美元(合一千三百七十七亿日元)以上,全部以美元支付。从1952年开始,一部分特需改为以日元支付。到1953年末的三年半时间,特需的合同金额高达十三亿美元,其中以美元支付的约为十一亿一千七百万美元。除去上述这种狭义的特需之外,还有一种广义的特需,即为了支援战争,大量的美军和军属来到日本居留,这些美军和军属以及他们的家族在日本国内的消费以及非军事机关在日本的美元开支,也应算作特需。(自然这里也包括日本妇女为美国大兵服务的收入,据说这是一笔相当大的金额。)这种广义的特需,在1952年和1953年分别超过八亿美元,到1953年末的三年半时间里,仅特需收入就在二十三亿美元以上。这笔收入,除去弥补在这期间的贸易逆差外,还剩余约四亿美元。其中1953年一年的美元特需收入,竟占外汇收入总额的38%。

尽管特需是一种很不稳定的需求,但由于它持续了很长时间,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关于这一点,在最后一章还要进一步讲到。

在贸易方面,在战争开始的两三个月前,出口贸易已经趋于增加,战争开始后便急剧增加。由于各国对出口的限制加强和其它各种原因,进口贸易却遇到了困难,一时反而减少,因此到1950年下半年贸易收支出现了为数不多而在战后却是首次的出超。这时物资进口不足已成为最大障碍,所以政府采取了促进进口的政策,加

以估计物资将要涨价，因而进口激增，进入1951年后进口贸易已大量扩大。尽管如此，由于特需的美元收入仍在大幅度地持续增加，所以政府的外汇储备显著增多，例如1949年12月末外汇储备额仅有二亿三千万美元，从1950年6月到12月，便由三亿二千六百万美元增加到五亿一千九百万美元，到1951年12月末又增至九亿一千三百万美元。

另一方面，由于特需收入巨大、出口扩大和景气好转，工矿业生产也从1950年10月开始正式回升。据总司令部发表的工业指数看，到10月份已突破战前水平(1932—1936年平均)，到第二年3月份与朝鲜开战时(1950年6月)相比已回升了38%。纺织、化工、机械、金属等与出口和特需有关的工业部门，生产急剧增长。相反地，以供应国内为主的消费资料部门的生产却增长得比较缓慢。煤炭和电力因需求激增而供应不足，船舶和铁路也在告急，运输力量不足。

关于物价上涨问题，前面已经讲过；由于投机的原因，进入1951年后，涨势又急剧加强。这年3月，日本中央银行的批发物价指数比战争爆发时上升了50%。从1951年开始，国内物价上涨率已经超过了国际物价上涨率。

3. 景气的消失

特需的景气不仅是不稳定的，而且随着投机和通货膨胀的急剧发展，在短时期内便迅速地宣告后退。美国是于1951年3月停止采购战略物资的，在这前后国际市场行情又出现低落，不仅出口增势立即停顿，连出口合同也陆续被解除；因估计行情较好而采购的进口货物又大量到货，于是在国内有庞大的滞销物资积存下来。因此贸易公司和批发商连续出现兼并和破产的现象，银行不得不向它们提供大量的救济贷款和库存贷款。批发物价开始下跌，纺

织和钢材价格分别从3月和4月的高点开始下跌，其它所有商品大体上也从这时开始呈现下跌的趋势。

朝鲜战争的景气就是这样急剧地衰退和消失的。景气恶化，首先反映在商业部门和价格上。工矿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减缓了，但还在继续增长。其后不久，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于6月23日提出停战方案，7月10日开始停战谈判，于是景气的衰退进一步扩大，工矿业生产停滞或仅有微弱的增长。工矿业生产没有转入下降的最大原因，是停战开始后战斗仍在继续，以及为支援南朝鲜的战后恢复工作，特需依然维持在较大的规模上。与此同时，库存开始不断增加，人们都注视着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前景，对将来的经济动向感到强烈的不安。

4. 垄断资本的庞大利润及其积累问题

正当天空笼罩着乌云，道奇路线下的经济危机即将进一步加深的时候，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这使日本垄断资本和日本政府都情不自禁露骨地喊道：这真是“天佑神助”、“起死回生的妙药”、一股“神风”啊！

实际上，垄断资本不仅在走投无路中得到了挽救，而且得到了比这更多的东西，他们的野心更大。

前边已经谈到，从工矿业生产指数的变化上看，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的工矿业生产便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在“朝鲜景气”中，又取得了大幅度的增长。这对垄断资本主义来说，意味着它在经济上又重新掌握了最小限度的必要力量。当然，要想持有战前那样的力量，它感到还有若干不足之处，它必须对产业进行更多的投资，积累更多的资本（参阅第6表）。

实际上，垄断资本在这场战争的景气中（包括战争结束后的短时期）攫取了莫大的利润，例如棉纺织业的十大公司，在朝鲜景气

第6表 朝鲜战争时期日本经济的恢复水平

(1934—1936年平均=100)

	1950年	1951年
(1)总人口(10月, 现在)	121.3	123.2
(2)实际国民收入(会计年度)	97.2	107.1
(3)人均实际国民收入(会计年度)	80.1	86.9
(4)私人设备投资(会计年度)	94.4	102.5
(5)工矿业生产指数	83.6	114.4
(6)农业生产指数(粗生产指数)	100.8	104.4
(7)出口数量指数	37.2	35.8
(8)进口数量指数	32.1	55.3

(备考) 资料来源: (1)总理府统计局, (2)(3)(4)(5)经济企划厅, (6)农林省(著者换算), (7)(8)大藏省。出口数量指数包括特需。

时期增加利润九至十九倍之多, 而且利润的90%以上都用作自己的资金积累; 化学纤维、造纸等垄断资本, 也取得了与此相仿的利润; 钢铁垄断资本也是利润激增, 明显地扩大了资本积累。根据经济安定本部的资料, 为工业提供的全部资金中, 属于垄断资本自己积累的资金, 1950年比1949年增加约一倍, 1951年又比1950年增加约一倍。

以这一时期的资本积累为基础, 加上大量的借款即所谓外部资金, 设备更新加快了, 经济规模也扩大了。通过特需和增加出口取得的大量外汇, 为进口原材料和引进新技术创造了资金条件。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月公布的外资法, 也对引进外资和技术发挥了作用。

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从其发展的初期开始, 就是以战争为摇篮的。通过日中、日俄两次战争攫取的领土、海外权益和赔款等, 日本经济取得了大幅度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日本参战的规模很小, 但是它乘其他国家鏖战之机为自己捞取了巨额的战争利益, 迅速地发展了工业经济, 为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因发动战争而遭到破产，长年的积累大部丧失，但是在朝鲜战争中，它又依靠战争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为其在第二次大战后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日本通过战争大发其财这一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

总之，在朝鲜战争景气这个时期，部分垄断资本获得的庞大利润和整个垄断资本取得的大量外汇收入，为垄断资本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如此急剧而又具有重要意义的大规模资本积累，完全是朝鲜战争的结果。从这一点看，朝鲜战争的爆发，对垄断资本来说确实是一股“神风”。如果没有朝鲜战争，战后日本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高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5. 资本的攻势激化与工人阶级

在朝鲜战争初期的紧迫气氛中，在美国示意和大力支持下，总评^①于1950年7月1日宣布成立。此时的总评与社会党一样，一方面“反对北朝鲜军的侵略，支持联合国军”，一方面又“对朝鲜战争采取不介入”的态度。

此后约半月时间，美国占领军利用战争的非常状态，开始着手清洗工作，对在民间和政府单位工作的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皆以非法手段强行驱逐。这种清洗工作几乎遍及所有部门。截至1950年12月为止，被清洗者已超过一万二千人。由于这次清洗工作是在共产党已将秘密党员公开、各个团体根据波茨坦政令申报了共产党员的名单之后进行的，所以众多的共产党人受到清洗，对战斗的工会运动打击很大。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总评的成立和清洗

^① “总评”是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简称。日本工会是按企业组织的，同行业的企业工会组成产业联合团体，不同产业的联合团体再进一步集中起来，组成全国性的工会中央组织。日本工会的全国性中央组织有如下四个：“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同盟）”、“中立工会联络会议（中立工联）”、“全国各产业工会联盟（新产联）”。总评规模最大，拥有四百五十五万会员。——译者

的进行,工人运动进一步消沉了。

在非法强行清洗工人阶级的同一时期,却针锋相对地广泛地解除了对战犯和战争合作者的清洗。在10月份的一个月里竟解除一万多人,在11月份释放了甲级战犯重光葵,其后又解除了对旧职业军人的清洗。翌年又进一步大幅度地解除与缓和了清洗工作,对旧财阀公司高级职员任职限制也缓和了。

另一方面,尽管面临严厉的镇压,一部分工人还是掀起了阻止运输军火等直接的反战斗争。更明显而广泛的是和平运动的抬头。这是由于朝鲜战争继续发展,有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国内的反动攻势也可能加强,所以反对战争的和平运动逐渐扩展起来。总评的态度,也由支持联合国变为坚持中立,反对重整军备,反对军事基地,拥护和平独立。朝鲜战争不仅威胁到日本的和平,也威胁到日本劳动人民的生活。因此只要劳动人民的斗争局限于保卫生活和不损害总评干部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总评也不得不赞成工人的要求。本来总评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工会的民主同盟派的集合体,是以合法活动和经济斗争为宗旨的,但为了不致失去工人对自己的支持,它也不得不同压迫劳动人民的美帝国主义政策以及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进行斗争。这样一来,总评也逐渐成为占领军的异己力量。

总评既批评共产党对工会的控制,又支持社会党;既非难按不同产业组织的产业会议,又支持按不同企业组织的产业工会。实际上产业工会与产业会议一样存在着根本性的缺点,前者的缺点甚至大于后者。产业工会内部民主气氛很少,存在着以干部为核心、忽视工会会员和广大工人群众积极性的倾向。

在占领军和政府加强镇压和工会姿态十分软弱的背景下,各个企业的资本攻势日益加强。生产虽然急剧增加,但工人就业并未增加,垄断资本竭力加强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据劳动

省^①调查,从朝鲜战争爆发前一月到爆发后的八个月里,整个工矿业就业人数减少不多,只减了0.2%,但加班加点却使劳动时间增加了31%以上。还有一个明显的倾向是,增加临时工和大幅度地增加承包企业,以及增加这种企业的雇佣工人。由于物价暴涨和生活费用上升,在这期间实际工资仅提高3%,如果考虑到劳动时间延长和劳动强度加强,则实际工资不仅没有提高而且下降了。特别是劳动事故急剧增加,据劳动省统计,战争爆发后的半年同爆发前的半年相比,劳动事故增加了50%。因此,在战争景气下,工人的负担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大大增加了。

6. 战争为日本垄断资本带来了什么?

将战争视为易事的美国,没有料到竟在朝鲜吃了苦头,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虽说美国的经济景气因战争而得以维持,但它受到的打击也是很大的。唯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日本和西德,在朝鲜战争中捞取了巨大的利益。特别是日本垄断资本,由于供应特需,获得的利润最多,它在顷刻之间急剧地增加了资本积累。垄断资本依靠战争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期间,垄断资本对待工人阶级的立场也明显地强硬起来了。尽管如此,也必须说,这个时期正是战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发展时期。

在战争末期即1952年3月份,美国开始准许日本制造军火。战争一开始,美国便命令日本以警察预备队的形式重新武装自己,并解除了对战犯和旧军人的清洗。实际上在此以前,美军便在日本工厂制造用于朝鲜战争的比较简单的部分武器,至于武器的改

^① 劳动省即劳动部,日本中央行政机关之一,1947年由厚生省分离出来。其主要任务是处理工人福利和就业问题,在劳动大臣之下设有劳动政策、劳动标准、妇女少年、安定职业等局。——译者

造和修理等，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就命令日本的一部分大工厂去做了。这样，从美军占领开始就被禁止生产军火已有六年之久的日本工厂，终于又在美军许可下，重新公开地生产武器了。

不久，1951年5月，总司令部便发表声明，停止对日本的援助。其理由是日本在朝鲜战争中得到了美国的巨额特需，日本的经济状况已经迅速好转，美国已无必要再提供援助了。例行的补助金，也在这一年的国家预算中完全取消了。至此，道奇所说的日本战后经济的“依赖”状态已不复存在。但是代替援助的特需极不稳定，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变化。补助金制度被取消之后，维持财政平衡也非常困难。虽然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依靠偶然的战争取得了相当的发展，但是战争继续并扩大下去已经难以期望，如果继续采取积极的经济政策，可能立即爆发通货膨胀的危机。话虽如此，垄断资本还是宁愿忍受急剧发展后的衰退和停滞，也不想缩小经济规模。但是由于美国不断扩军备战所引起的世界性通货膨胀，以及内外经济形势的恶化，这样放任下去，日本中小企业以及其它体质软弱的企业就有崩溃的危险，甚至不可避免地要爆发全面危机。在政府内部也有不少人根据这种看法而主张采取收缩经济的政策。

五、朝鲜停战和解除占领

——从景气消失到经济危机

1. 背景

从1951年3月起,日本经济的朝鲜景气开始消失。马立克的停战方案是在6月份提出来的,日本经济从此时开始转入下降,到重新回升为止,大约经历了三年半时间。简单地说,这一期间的景气内幕已经暴露出来了。在这内幕里有非常复杂的动态和各种各样的问题,内幕的背后又有国内外重大的政治背景。这里,先就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背景作一简单的介绍。

美国在占领初期即公开声明,对日本的占领时间将于短期内结束。尽管如此说过,实际上占领时间大大延长了,但是朝鲜战争一爆发,所谓“自由世界的国家”便急于单独对日缔结和约,因此旧金山和约宣布成立,并于1952年4月生效,从此美国也就大体上解除了对日本的占领。不幸,这是一个被歪曲了的和约,不是全面媾和而是片面媾和的和约。美军原封不动地继续驻扎在日本,日本只是取得了形式上的独立,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完全的独立。正如人们经常谈论的,这是以“旧金山体制”来代替美军的占领体制。一直处于占领状态下的日本经济,正是依靠占领体制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用说,这种变化与完全的独立经济是有区别的。

美国与南朝鲜不仅顽固地阻止朝鲜战争停下来,而且企图扩大这场战争。尽管如此,朝鲜战争还是在1953年7月停下来了。后来的印度支那战争也是这样,是由于有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危险，在要求世界和平的强大声势下停止的。美国与北朝鲜终于在1954年7月达成了停战协议，一个很有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火种从地球上消失了。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东西方冷战告终，更不是美国的反共军事体制有任何缓和。随着战争逐渐消停，和平空气不断加强，对于越来越依赖美国的日本经济不能不发生一定影响。

日本垄断资本既采取加强对美依赖的方针，又谋求部分地从占领的体制下解脱出来；从加强对美国的依赖中，谋求打破朝鲜停战后的困难局面，取得经济的大发展。虽然这种企图使日本工业生产在1953年取得了迅速增长，但日本经济很快又走投无路，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这种大幅度的上下波动，曾使人们陷于苦闷和焦虑之中。然而很快出现的景气回升，又使日本经济获得了一个划时期的新发展。

2. 景气消失后的变化

朝鲜战争景气消失后，日本经济因受到接踵而来的各种重要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

从1951年春起，纤维和钢铁等的价格已从高点向下跌落，一般地说，这是景气开始消失的象征，但是工业生产仍在增加。前面已经提到，景气趋于停滞而工业生产还继续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特需仍在发挥作用；从1950年末到1951年初这段景气时期所取得的巨大利润，大部分都用于设备投资，而这些新设备又是比较早地投入了生产；此外为降低成本也增加了生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起作用的因素。但是这种倾向，进一步导致了生产过剩和库存的增加，因此入夏以后重新趋于上涨的物价又开始下跌。在过剩产品还没有消散的情况下，继续提供大量的库存信贷，这也是支持生产增加的一个有力因素。尽管如此，到1951年底，一些主要部门

的生产增势开始停止，加以当时国外的需求减少，出口不振，市场行情普遍恶化，特别是以出口为主的商品价格后来大幅度地下跌了。

从1952年后半年开始，工矿业设备投资的增势与上年相比已经明显减退，出口也陷入停滞状态。但是由于扩大消费的政策发生了作用，国内的消费需求反而大幅度地增加，因而与工矿业中生产资料生产以及面向出口的消费资料生产都陷入停滞的情况相反，面向国内的消费资料生产大量地增加了。因此整个地说生产还是扩大的，增加的幅度为上年的二分之一或者是前年的三分之一。物价因商品不同而涨跌有异，但整个地说是平稳的或略趋于下跌。

比较地说，这时国内物价水平仍略高于国际物价水平，因此进口商品利润很大，使进口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上。进入1952年度后，由于采取扩大国内购买力的政策，进口进一步扩大。相反地，因国内价格较高而出口比较困难，贸易赤字大幅度增加。到1953年便放弃了财政收支平衡的方针，采取降低利息、促进融资等积极的金融政策，结果使投资和消费需求迅速地扩大起来，因而工业生产又有了急剧的增加。根据企划厅的生产指数来看，1953年比上一年增加了24%。由于同样的原因，进口也增加了，1953年进口额比上年增加近四亿美元，但出口完全没有增加，所以贸易赤字在1952年为七亿五千万美元，到1953年超过了十一亿美元。特需（广义的）收入虽然在1952年已达八亿二千四百万美元的最高纪录，但1953年即减为八亿零九百万美元。因此包括特需在内的外汇收支出现出超，最终只有把手中的外汇全部用光。

朝鲜战争爆发时日本的外汇储备只有三亿二千六百万美元，其后由于有大量的特需收入，外汇储备不断地大幅度增加，到1952年末达十一亿三千八百万美元，一度几达十二亿美元。但到1953年

年中，由于外汇收支急剧恶化，储备大幅度减少，到1953年末已减至九亿七千六百万美元，外汇储备降到十亿以下。外汇储备的减少趋势到1954年初仍未停止，这年5月末已减至七亿八千万美元，其中一部分是固定债权，实际上外汇储备只有五亿美元。这些外汇储备，对当时的贸易来说连最低需要也难以保证。巨额的滞货贷款和救济贷款，充分表明政府企图维持景气和扩大产业基础的政策已经失灵了。

1953年9月，日本中央银行已不得不采取紧缩银根的政策。朝鲜战争以来，日本经济以远远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各国的速度急剧发展，特别是1953年，由于采取扩大国内市场的政策，经济发展速度已大大超过其他国家。但是1953年秋，由于美国景气趋于恶化，对美国依赖关系较强的日本经济，也不得不停止其过份扩大的倾向。

为避免朝鲜停战减少特需所带来的困难，此时政府和垄断资本按照美国的要求，采取了与美国缔结MSA协定（相互保障安全协定）的方针，以便从美国获得经济援助。但是美国对于缔结MSA协定的国家有许多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稳定货币和平衡财政收支，当时对日本也强烈地要求做到这一点。于是日本中央银行从10月开始进一步紧缩银根。由于这一阶段的紧缩政策是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勉强采取的，日本政府和银行都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委，经济企划厅编的《战后经济史》上也有记述（参阅此书“经济政策篇”，第335、342页）。

不久世界银行调查团来日，该团在12月份劝告政府抑制通货膨胀，对政府产生了很大影响，到迫近年末的时候，吉田首相便突然指示削减预算，将1954年度的预算削减10%，接着在内阁会议上又决定坚决将预算压缩在一万亿日元以内。就在这次内阁会议上，吉田首相传达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通过日本驻美大使传来的编制

紧缩预算的要求。

为贯彻执行紧缩政策，1953年度的国家预算规模包括一般会计和补充会计在内共为一万二千余亿日元，1954年度的预算规模又进一步削减到九千九百九十五亿日元。这一年取消了任何新建项目，所以财政投资比上年度大幅度削减约20%。这样一来，该年度内物价下降了5—10%，国际收入也恢复了平衡，影响很大。1954年3月又削减了外汇预算，因而进口规模也缩小了10%。

由于彻底推行紧缩政策，景气趋于恶化，工矿业生产从1954年3月开始减少，一直到9月都处于疲弱状态。在银根吃紧的影响下，破产的公司增加，许多企业进行合并，失业人数迅速扩大。另一方面，由于资金需求减少，物价开始下跌，通货膨胀有所稳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4年夏季以后。

3. 垄断的对策

日本垄断资本依靠朝鲜战争取得了暴利，进行了巨额的资本积累，但是战争景气很快便消失，因为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迅速开始了。这时的世界景气也在消减，但是日本物价从战争景气时开始上涨以来，一直高于其它国家，这在出口竞争上难免处于不利地位。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垄断资本不仅力量不足而且在许多方面都非常落后，因此，尽管在朝鲜战争初期资本急剧积累，本身也得到发展，但是还很不成熟，加上战争停止后的特需前景暗淡，它深感不安。

这时，道奇路线推行以来所采取的财政收支综合平衡方针，已经成为发展的障碍。制订1952年度的补充修正预算时，正当和约生效之后，日本第一次获得了可不受占领军司令部监督的编制预算的机会，于是政府和执政党开始对平衡预算的方针进行了若干修改。到编制1953年度预算时，便明确地抛弃了财政收支综合平

衡的方针，积极推行扩大财政投资的政策。

这个预算方案的说明书制定于1953年6月，正当停战协定缔结之际，这是最能表明当时政府和垄断资本的观点的文件，所以摘录一段如下：

“最近朝鲜停战已经实现，我国必须尽快确立摆脱特需的经济独立态势。为此，首先必须充实和加强经济基础，促进经济的合理化和效率化，纠正国内物价高于国际价格的情况，以牢固的经济态势自立于国际经济之林。在目前的状况下，财政的作用极为重要，必须积极扩大财政投资，以提高生产能力并奠定经济基础，特别要充实国际竞争力和提高国内的自给能力。……”

“但是从最近的财政金融形势来看，再固执地抄袭过去那种财政收支综合平衡的方式，已无必要，相反地，应当灵活运用财政金融政策，积极进行财政投资。”

日本正在开始准备积极发展的时候，国外景气恶化，国内生产过剩，特需削减，种种令人担忧的因素接踵而来。上面摘引的一段话，正是日本垄断资本主义企图打开一条出路的焦躁心理的表现。“政府的想法是……在朝鲜停战后的形势下，如果不及早摆脱对特需的依赖，日本经济就将落后于国际经济。从这种焦虑和迫切的愿望出发，遂不惜冒通货膨胀的危险，扩大经济规模”（经济企划厅编《战后经济史》总观篇，第439页）。该书又写道：“政府是在继续维持特需收入的基础上力图扩大出口以加强产业基础，然后再从依靠特需这个外在的支柱下摆脱出来，以达到经济真正独立的目的”（第43页）。也就是说，政府和垄断资本的真正目的是在未来建成独立的经济，当时就是要继续维持相当规模的特需，也就是一边依赖和利用特需，一边推行扩大经济的政策。这是一种如意算盘，又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这种所谓积极、独立的政策，实际上仍旧充分表现了政府和垄断资本依赖美国的根深蒂固的本性。

战后，一直到执行道奇路线时为止，从未正式进行的生产合理

化工作，到此时才正式地开始了。当时对合理化或现代化的设备投资，虽然不能与1956年以后的情况相比，但也毕竟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合理化、现代化以及积极进行设备投资之所以成为可能的主要原因是，垄断资本依靠获取的巨额利润积极地进行了资本积累（特别是1951年和1953年）；特需和增加出口扩大了外汇的收入，因而有可能进口新的设备、技术和原材料；民间银行积极发放设备资金贷款（特别是1950年和1952年）；通过美援物资的回头资金特别会计和开发银行（建立于1951年5月）为设备现代化提供资金；积极提供财政投资（特别是1952年和1953年）等等，可以举出许多。特别是1951年修改了租税特别措施法，按照新法规定，凡属现代化设备可以大幅度地提取特别折旧费。1952年制定的包括同样内容的“企业合理化促进法”，以及1950年制定的“外资法”等，都为引进新技术和伴随技术引进而来的资本引进开辟了道路，尽管其中还有种种问题，但它们都是特别重要的立法。

于是，各种合理化计划陆续出现，如从1951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钢铁合理化计划，1952年开始执行的棉纺合理化计划，1953年开始执行的合成纤维五年发展计划，1954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硫酸铵合理化计划和水泥三年合理化计划。在第一个钢铁合理化计划中，从1951年到1955年间，以压延部门为中心的投资总额高达一千三百亿日元，这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合理化措施。

合理化的内容包括从企业合理化逐渐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的合理化。从这个观点出发，如何整顿产业组织和完善建厂条件等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整顿产业组织方面，由于生产过剩和竞争激化，组织卡特尔成了中心问题。1949年9月在煤炭部门曾经有过有关价格的自主卡特尔（当时是地下的），在朝鲜景气消失、出现生产过剩之际，又相继出现了以限制生产为目的的卡特尔。1951年夏季首先在人造纤维部门出现了地下卡特尔的活动，

1952年1月在棉纺部门出现了自动缩短生产时间的地下卡特尔，烧碱部门也在此时开始缩短生产时间。为了避开禁止垄断法而使卡特尔合法化，还以劝告形式劝说缩短生产时间，因此从1952年3月起在棉纺和人造纤维部门连续出现“劝告缩小生产”的情况。

上述情况反映了当时资本集中倾向的一面，另一方面也突出地表现为企业联合，即旧财阀系统多数商社的联合，特别是三菱商事的复活（1954年）以及晚些时候三井物产系统的联合（三井物产复活于1959年），1952年以纺织工业危机为契机，各部门垄断资本对中小企业进行的系列化和银行信贷的系列化也有了显著的发展。

日本垄断资本是热望废除或者大幅度缓和禁止垄断法的，所以在该法公布二年后的1949年，即将限制过严的条文作了若干缓和性的修改，但是未做更多的变更，这是因为当时还处于被占领状态，不得不遵循美方的方针，不做大改。后来随着和约的签署，被占领状态接近结束，日本政府才提出了修改禁止垄断法的方案，但是美国政府发表了不予承认的通告。日本政府深感意外，暂且打消了修改的念头，一直等到解除占领的1953年8月，才大幅度地修改了禁止垄断法（第二次修改），允许“萧条卡特尔”、“合理化卡特尔”存在。这样，在这以前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地下卡特尔和受到劝告而缩短生产时间的那些垄断组织的主要内容，在修改后的禁止垄断法中便都被去掉了。对比之下，过去的地下卡特尔组织还是比较先进的东西了。

一般地说，在这一时期，随着占领的解除和资本积累，资本集中与垄断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了。

4. 随着解除占领而发生的变化

美国为重建其占领下的日本资本主义，从改变对日政策以后，

便急于培育和加强日本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美国在日本采取间接统制的方式，即在服从占领政策的前提下，由日本政府承担实施政策的责任。基于这种关系，不论在占领初期还是朝鲜战争之际经济急剧发展的时期，日本垄断资本都没有做过不利于占领政策的事情。在其它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在经济方面，在占领中它便形成了依赖、从属于美国的态势，在这个基础上缔结的媾和条约、安保条约和行政协定，更进一步确定和巩固了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关系。1953年又缔结了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在形式上采取了两国对等的方针，但实际上认可了实力处于劣势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当然的经济上的从属关系。这里也应指出，日本垄断资本的总的意图是在占领中从属于美国，在从属中谋求自己的发展，并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方针。1952年4月和约生效，日本也被解除了占领，这时日本经济和垄断资本的发展道路虽然出现了角度很大的变化，但是并未发生根本的转变。

经过若干年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其对美国的从属程度也降低了一些。日本要从对美国的从属态势中完全解脱出来，就必须自己握有特别的力量或者形势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但是在这之前，也不能说在从属程度上全然没有变化。在日本握有最高权力的美国占领军一旦撤消统治，这对日本垄断资本及其政府来说，是从占领军的严格命令中和直接束缚下得到解放。当时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在经济上需要特别处理的问题大体如下：

首先是放弃道奇路线开始执行以来的财政收支综合平衡方针。这个问题，如上所述，不论解除占领与否，都要立即加以解决，然而很快便遇到阻力，结局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又采取了抑制财政膨胀的政策。经过一、二年之后，日本政府还是改变了方针，即不论景气好坏，在财政上都采取积极的预算政策。所以美国的占

领如果继续延长下去，则日本后来的高速增长必定要受到来自财政和金融方面的限制。

其次是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交流，特别是日中、日苏贸易问题。在解除占领后，吉田内阁对共产国家仍然继续追随美国的禁止贸易的政策，但在垄断与保守的政治家当中，也不乏强烈要求与苏联恢复邦交，促进日苏贸易往来，重新恢复对中国的贸易的人们，他们同吉田一派之间的对立不断加深。下届政府鸠山内阁继续采取吉田内阁的立场，其方针仍然没有改变对美国的依赖关系。旧金山媾和会议虽然没有达到全面讲和的目的，但是作为会议的结果解除占领这件事，还是给日本发展同中、苏的新的经济关系创造了有利的形势。

包括打算与中苏打交道的资本家以及保守的政治家在内，大体上都不打算从根本上改变对美国的从属关系。至于政府和垄断资本，它们虽然取得了形式上的政治独立，也不打算过多地改变其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不仅如此，由于当时面临美国停止援助、朝鲜停战以及丧失特需这些问题，政府和垄断资本在经济上反而采取了更加依靠美国以及加强与美国合作的方针。首先是极力提倡“日美经济合作”，对此，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都寄予极大的希望。早在朝鲜战火最为炽烈的1951年初，美国便企图动员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为其庞大的军火生产计划服务，当时占领军总司令部的言行，曾给予日本当局极大的希望。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从美国引进大量资本，以促进生产的合理化和扩大产业基础。在因朝鲜战争停止而失去特需的情况下，它们希望获得如上所说的“新特需”。然而美国在考察日本工作母机的工艺后，至少是大失所望，它发现日本军火工业的实力极弱。更重要的是，当时美国的军备扩张很快就要减缩，因为这些缘故，与美国重整军备计划相联系的“日美经济合作”不久便消声匿

迹,希望完全落空。

于是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便恳请美国政府继续安排日本提供特需或者向日本提供经济援助。这样,日本便一方面继续从美国得到与越南战争等相联系的新的“特需”,另一方面又接受如后所述的美国 MSA 援助和剩余农产品,并大量吸收外资——美国的私人资本和世界银行的贷款。

日本被解除占领之后,在采取与政治和军事方面相适应的经济上的对美从属态势的同时,其在国内关系方面采取的令人瞩目的措施可举出以下几件:首先,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希望在放弃道奇式财政收支综合平衡方案之后,立即宽缓执行禁止垄断法(尽可能全部予以废止),并从根本上修改有关工运的各种法规(向坏处修改)。如上所述,宽缓执行禁止垄断法,立即部分地实现了。尽管垄断资本顽固地一再谋求更多地宽缓执行禁止垄断法,甚至废除它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主要来自工会、中小企业和一般消费者的强烈反对,终于没有取得成功。后来采取实际上加强垄断资本的方法弥补了这一点。工运法规的修改虽然也受到工会等的猛烈反对,结果还是部分地实行了。如1952年的防止破坏活动法(防破法)和劳动三法^①都部分地作了修改,1953年的罢工限制法(限制煤矿和电力部门的)等,有一部分也作了很坏的修改。后来政府和垄断资本还不断地觅取机会企图全面修改工运法规,但由于工人强烈反对而没有轻易得手。尽管如此,还是从法规以外的方面不断进行效果相同的旨在破坏工人运动的活动。

其次,在这一时期还陆续制订了其它一些措施,例如:为促进垄断资本的资本积累而制定的特别租税措施;进一步推动1950年以来实行的重新估价资产的工作;美国停止对日援助后作为财政

^① 劳动三法,即工会法、劳动标准法、劳动关系调整法。——译者

投资资金而设置产业投资特别预算(1953年);在前述作为政府机构的开发银行之外,另行设置专门为设备投资提供资金的两家长期信用银行(1952年)等。

和约生效后不久,日本即加入了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也是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组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1952年),比参加联合国早四年。

还有,从扩大国际市场的目的出发,于1951年开设了日本输出银行(即现在的日本输出入银行)。这家银行作为政府的金融机关,主要为机械、成套设备、船舶等的出口提供长期信贷。接着于1952年公布了出口贸易法(后来改为进出口贸易法),即依靠出口卡特尔等来维持日本出口行业之间的秩序,以达到促进出口的目的。也是从1952年开始,政府将加强贸易商社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根据旧金山和约,日本对在战时受害的东南亚各国有赔偿的义务,垄断资本想利用这个机会,向这些地区进行经济扩张活动,对此项工作很感兴趣。这种赔偿工作首先是从缅甸开始的,接着陆续对东南亚各国都进行了赔偿,这一方面的情况以后还要谈到。

此外,自朝鲜战争以来,日本政府愈益感到必须强调粮食自给。这不仅是出于战时粮食补给的需要,而且还由于,为了扩大出口必须努力增加原材料的进口,因而必须尽量以国内的粮食生产来代替粮食进口。

总之,在解除占领的前后,日本垄断资本和政府的方针和行动并未立即发生根本变化,这是因为在解除占领之前,特别是在解除占领时的一段时间,日本垄断资本已经陆续提出许多对策,为其发展做了必要的基础准备。

5. 正式引进外资的开始

战后日本历代内阁,包括社会党的内阁在内,都把“引进外资”

作为一项重要政策。在广义的外资之中，作为外国的国家资本输出（外国政府的投资），战后日本已经接受了美国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经济复兴基金的巨额援助；但是引进私人资本即来自外国的私人投资，一直到1950年前半年为止，尚未正式开始。这是因为日本的国内情况还极不安定，而美国的对日方针也不能使美国资本十分安心地拥向日本；此外，日本政府也还没有做好接受外资的准备工作。但是，一般认为，美国在这一时期提供的援助，对以后美国私人资本对日本的扩张起了“铺平道路”的作用。

在占领初期，一部分大资本已随美军迅速进入日本。首先进入的是美国的二大石油公司。所以在其它国家的石油资本进入日本之前，日本的石油工业和石油市场主要被美国资本控制。其次，美国三大银行的资本，也随着美军进驻而进入了日本。

日本于1950年公布了“外资法”。这使日本从法律和制度上摆好了接受外资的态势。正好朝鲜战争在此时爆发，前面已经说过，战争使个别垄断资本获取了庞大的利润，使国家得到了巨额外汇，工业经济也因而急剧地恢复起来。所有这些，迅即使外国特别是美国的私人资本掀起对日本投资的热潮。

根据外资法批准引进的外资情况来看，股票投资和借贷投资等外国资金，除1954年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趋于增加。技术援助（这也是外国投资）的合同件数，到1952年为止也急剧增加，但从1953年到1955年这段时间趋于减少。从战争结束到1954年末，引进外资的实际情况可从第7表上知其概略。在外资法公布前的一个时期，美国政府以援助名义进行的投资已达到庞大的数额，而私人投资在统计上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金额。但是进入1950年度以后，政府的投资减少了，私人投资则大量增加了。

虽说如此，这一时期外国公司以技术援助即以提供和转让专利来取得参加经营股份的情况为数还是很多。随后贷款投资大幅

第7表 战后外国资本的对日投资

(1946—1954年度)

(单位：100万美元)

	1946—1954年度	1950—1954年度
(1)政府投资	1,593	523
(2)私人投资	—	90
股 票	—	32
贷 款	—	58
(1)(2)合计	1,593	613
(3)技术援助合同批准件数	—	446

(备考) 据大藏省发表的资料制成。

度增加,几乎取代了援助投资。但从外国流入的实际资金还不多。

尽管外国的投资还不多,但已出现以下值得注意的倾向。即如综合地考察技术援助、股票投资和贷款投资这三种主要的私人投资形态,可以看到,外国投资主要集中于石油、机械(包括电气机械)、化学和电力这四个部门。外国资本此时已经深入到日本的各个主要工业部门,这些工业部门的重要装备都与外国资本有一定程度的关系。实际上,这种急剧变化是在短期内发生的。

日本政府此时在引进外资方面特别着力于取得世界银行的借款。世银的借款后来虽然也用于其它各个重要工业部门,但这时期首先是为建设火力发电厂而向中部、关西、九州三家电力公司提供“火力借款”,总数为四千零二十万美元,借款合同于1953年达成协议。主要条件是:“日本国”要充当保证人,要以国家的全部财产做担保,并规定世银借款在日本的一切法律中均处于优先地位,而且世银有权干预各电力公司的收费标准等等。以上各点,在日本国会上都被作为重大问题来处理。

尽管当时美国政府和垄断资本特别希望私人资本和美国企业直接进入日本,但是在日本引进的外资中,美国资本的直接投资还是不多,最多的是技术援助。正如美国商务部所指出的那样,此中

原因之一乃是日本资本害怕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国内，害怕外国资本夺取它们的经营权和它们的企业。此外也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即从当时的状况来说，美国还未感到日本象英国、西德、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那样具有魅力，还不值得美国认真地进行投资。这个问题，与日本对外资依赖态势的强弱，一般地说是两回事。而且在经济上的从属程度如何，也不能单纯以外国投资金额的大小来判断。这些问题以后还要进一步阐述。

6. 依赖特需与MSA体制(安全保障体制)

由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金额每年都很庞大，日本的外汇收入也随之急剧增加。到1954年为止，外汇总额已达约三十亿美元，其中外国的汇款收入占30%。特需既为日本创造了巨额的外汇，又改善了日本的国际收支。但特需原本是一种极不稳定的需求，因此从1953年停战以来大幅度减少，预计将来还要减少，因此人们愈益感到不安。如上所述，特需既有与通常的出口相同的一面，也有促使国内物价水平上升的一面。

美国以特需使日本出口得到增长为由，于1951年7月开始停止对日本的援助。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预计到特需将随战争的停止而停止，即使不停止，也要大幅度减少，但是一旦停止，仍不免惊慌失措。

正当这个时候，美国同日本缔结了MSA协定(相互保障安全协定)。此时，日本已经得知美国不再提供经济援助，但政府和垄断资本还是抓住这个协定向人民宣传美国似乎将继续给予经济援助。MSA协定已于1954年3月签署，但是日本并没有由此得到经济援助。为了多少做点弥补工作，日美才以MSA协定为基础缔结了MSA小麦协定，日本勉强得到五千万美元剩余农产品的援助，并将其出售所得的一部分用做财政投资，以此来掩饰它们夸

大宣传的错误。但是在选择贷款对象时，日美之间的意见很不一致，双方长期争执不休。

接着，根据美国剩余农业品处理法，日本于1954年11月和1956年2月分别接受了一亿美元和七千万美元的剩余农产品的援助。这些农产品出售后的收入，一部分用做日本政府的财政资金，表明政府具有依赖这种援助的倾向。但另一方面，接受剩余农产品也在国内引起了很多纠纷，以致政府与垄断资本受到了种种批评。

总之，特需在每况愈下，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的不安，于是它们求助于一种新的体制，即MSA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日本虽说取得了独立，但不论从政治、军事、经济的任何方面来看，都没有从依赖美国的从属体制下解脱出来。

7. 从危机到回升

从1953年的“虚假繁荣”（见1954年《经济白皮书》）到实行紧缩政策、制订“一万亿日元预算”的1954年，企业倒闭和失业人口都急剧地增加了。“特别是从失业方面来看，其数量已超过道奇路线时期，达到战后的最高水平。紧缩政策使社会的不安逐渐增加，已经发展为深刻的社会问题。”政府的资料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状况（见《战后经济史》总观篇，第576页）。

生产过剩危机引起物价下跌，1954年度年中物价下跌4.5%，基本上跌到了预期的程度。与此同时，欧洲各国的景气开始好转，已经恶化的美国经济也在这年的秋季出现回升。包括一部分倾销在内，日本的出口开始增加，大量的积压物资趋于减少。出口增加，促使生产从秋季开始回升，吃紧的银根也逐渐缓和。已被大幅度削减的预算，由于上年度结转下来的金额较多，也意外地增加了，加上地方财政预算增加等原因，严重的紧缩后果消失。

1953年发生了“保全经济会”的贪污事件（一个假的金融行业——保全经济会，向保守党干部大量行贿的事件），接着在1954年又发生了大规模的造船贪污事件（造船公司干部、自由党干部、运输省^①官僚，围绕着分配造船贷款、为制定造船利息补助法提供的政治献金等而发生的行贿受贿事件。预定要逮捕的佐藤现国务大臣，由于法务大臣使用了指挥权而免遭逮捕；预定要逮捕的现首相池田，也未逮捕而结案）。国民对吉田内阁极为不满，保守阵营内部斗争激烈，吉田内阁陷入危机。尽管景气趋于回升，吉田内阁仍在此时失去垄断资本的支持，终于在1954年12月以任职六年而下台。与东西方一时出现的紧张缓和相对照，吉田内阁的崩溃与其片面执行依赖美国的方针，特别是在经济上对MSA体制在经济上过份期待的破产，看来不无关系。

^① 运输省即运输部，是日本主管水陆运输、港湾、船舶、铁道等的中央行政机关。——译者

六、从解除紧缩到神武景气

1. “数量景气”的到来

吉田内阁自道奇路线开始执行前成立以来，连续执政六年（被称为“长期政权”），但其寿命终于到了尽头。吉田内阁的方针是追随美国的占领政策及其反共的世界政策，为日本的垄断资本谋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但是，美国在亚洲的反共战略，在朝鲜、在印度支那相继归于失败。同时在日本国内，顺从美国要求而采取的经济紧缩政策，不仅遭到国民的反对，甚至招致垄断资本的批评。开始有人认为，吉田首相的留任已经成为实现垄断资本强烈要求的保守联合的障碍。这样，吉田内阁只好总辞职了。虽然吉田首相最后向美国乞求经济援助以延长其内阁的寿命，但未成功。

当吉田内阁紧紧抓住政权挣扎图存之际，日本的景气正如前面稍许述及的那样，以出口好转为先导，于1954年9月开始逐渐回升。鸠山内阁在1954年12月成立，进入1955年后，景气回升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日本经济恰如顺风扬帆一样顺利地向前发展。

可以称为顺风的有以下两件事情。一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上升。1953年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节节上升，美国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于1954年秋开始恢复景气，并在这一年转为上升。还有一件是日本创纪录的大丰收，大米生产在1954年有相当数量的增加后，又于这一年取得了历史上最大的收成，产量比上年增加三成，达八千二百五十六万石^①，全部农产品增产二成以上，甚至

^① 石是日本容量单位，1石=180.5公升。——译者

超过了同年工矿业生产的增长率。

由于海外经济上升,日本的出口大大扩大了,继上年增加三亿五千万美元之后,这年又增加了三亿八千万美元,即23%,出口总额达二十亿美元(海关统计)。上年纺织品出口显著增加,而这年钢铁出口又增加了56%,三年后便赶上棉织品,重新成为出口的第一位商品。服装、人造棉织品、玩具等消费品的出口也显著增加,船舶出口也开始大幅度增加。

与出口相比,进口增长缓慢。1955年进口额为二十四亿七千万美元,仅比上年增加七千万美元,即3%。由于国内丰收,粮食进口量减少,以及价格下跌和紧缩银根的影响,纺织原料和机械类的进口金额减少,以致整个进口额未增加。

其结果是1955年的外汇收支(国际收支)约有五亿美元的盈余,超过上年的盈余额约四亿美元,国际收支有了大幅度的改善。

另一方面,出口的增加促进了工矿业生产的扩大。这年工矿业生产指数按日历年计算增加了8.2%,从会计年度看增加了12.5%。1955年度的生产增长份额中与出口增加直接有关的占25%,如果加上出口商品的原料生产等与出口有联系的生产增加部分,则占本年度工矿业生产增加份额的五、六成。这说明此时工矿业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海外经济上升所带来的出口增加,其次是国内消费的增长。至于设备投资,因为只比上年度有些微增加,所以对于整个工矿业生产的增长几乎没有起作用。因此生产增长的主要是上述出口商品以及与出口有关的工业产品和非耐用器材,至于机械等生产资料的生产,毋宁说是处于停滞或降低的状态。

1956年度的《经济白皮书》曾就1955年度的经济举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国际收支的大幅度改善,而且国际收支的盈余与特需的金额几乎相同。因此,对日本来说,这年终于实现了没有特需

国际收支也能够平衡的多年宿愿。第二是经济的增长没有伴随通货膨胀,国民收入增加约一成(12%)。尽管经济大量增长,批发物价并未随之上涨,消费物价也始终处于停滞状态。所以这种情况被称为“数量景气”。第三是经济发展正常。战后被称为日本经济慢性病的银行超额贷款明显地改善了,用不健全的方法进行设备投资和库存投资的情况也减少了不少。

就这样,日本一方面实现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做到了国际收支大幅度改善、物价稳定,并纠正了超额贷款。这三件事同时出现,在战后还是第一次。

不伴随物价高涨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日本无需新的大规模设备投资,利用已有设备便可以绰绰有余地扩大生产。故1953年和1954两年大型私人企业的设备投资只有一万一千亿日元,加上中小企业的投资合计约为一万六千亿日元。这些扩大生产的投资,大工厂主要是用于合理化建设,因而在这期间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近二成到三成左右。因此,生产能力大为增加。虽然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却几乎没有增长,原料价格也多数下跌。所以,即使不提高产品价格,利润也很大。

由于出口增加,紧缩时剩余下来的滞销货物在海外找到了销路,于是呆货变为现金,厂商得以清偿库存贷款,从而银行的头寸增加了。出口增加,外汇特别会计^①用于购进外汇的资金就要增加。由于农业丰收,粮食管理会计^②对收购大米的贷款支付也增

① 外汇特别会计是日本政府的特别会计之一,专门处理外汇储备、买卖以及外汇交易业务。例如,外汇银行外汇多余时,即将外汇卖给政府以换取日元,在外汇不足时,则以日元向政府购进外汇。出口增加,国库的外汇资金增多,进口增加,日元的卖价就要提高,外汇特别会计就是经理外汇损益的业务。——译者

② 粮食管理会计也是日本政府的特别会计之一,主要经理大米、小麦的收购、销售、分配等业务,以调节主要粮食的供求关系,稳定国民的饮食生活。粮食管理会计分国内大米管理、国内小麦管理、进口饲料的调整等七个帐户。——译者

加了。所有这些都扩大了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供应。但是另一方面，产业的设备投资并不旺盛，在财政方面，1955年度国家预算的规模与上年一样控制在一万亿日元以内，财政投资贷款增加有限，对大企业的财政贷款甚至比上年缩小。由于资金需求不旺，商业银行不断地将借款归还日本中央银行。1954年8月末日本中央银行的贷款曾达到三千五百六十二亿日元，自1955年10月开始大幅度减少，到同年12月降低到一百七十八亿日元。日本中央银行的信贷规模如此缩小，在战后几乎未曾有过。

随着经济呈现好转，存款大幅度增加，但是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却不活跃，故当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归还借款告一段落之后，便出现了存款过多，以至银行为寻求适当的贷款对象展开激烈竞争的罕见现象。金融的这种呆滞，使长期、短期利率大为降低，由于利率下降和企业利润增加，股票行情大大上升了。

日本经济很顺利地从严缩向景气转变，其主要原因是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性经济上升带来的出口增加，以及未曾有过的农业丰收的影响。在经济顺利好转的过程中，也多少纠正了战后经济的一些不正常状况。但是，出口的增加是由海外经济上升的外部因素造成的，大丰收主要是天气赐予的。所以日本经济的好转大部分是依靠经济以外的因素。不论从哪方面来说，这时的景气好转和少有的顺利发展不是靠日本经济本身的力量，而主要是依靠外部因素、即所谓偶然因素得来的。诚然，要利用海外经济上升的机会求得自己的发展，就有必要预先扩大设备，进行合理化，进而对中小企业和工人进行整顿。而这种准备工作在1951年以后的发展时期和1954年的紧缩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偶然地完成了。因为原委如此，所以政府当局也在《经济白皮书》中把这种情况写做“不得不说是交了好运”。

2. “已经不是战后了”

1956年的《经济白皮书》在谈到这个时期被称作数量景气的经济发展过程时，用了以下一句话作为结语：“已经不是‘战后’了”。这句话曾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语。它常常成为日本垄断资本夸耀战后重建完成、新的发展即将到来的一种得意之谈。这种自我欣赏，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是不要忘记，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主要是几次偶然的运气和对外国的依赖以及对中小企业、劳动人民实行剥削的结果。

但是，白皮书中所说的“已经不是战后了”这句话的意思不如说是在于另外一点。因为继这句话之后白皮书又这样写道：“我们现在行将面临不同的情况，即经济恢复阶段已经结束”。就是说，今后的经济增长不会象过去恢复过程时那样比较轻易地进展。在强调这点之后，白皮书便提出以现代化来支持新阶段及在不同情况下的经济增长，并要求人民为此承受相应的负担。这也就是以后要谈到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

白皮书所说的“恢复过程”已经结束的观点就是这样。但是问题在于战后的恢复过程此时已经结束的提法是否正确？不久前出版的经济企划厅编写的《战后经济史》中提出了“经济正常化”的说法。如该书中所说那样，所谓经济正常化，“意味着经济水平已恢复到战前水平，并已突破这个水平”（该书总观篇，第624页）。但是，经济正常化就是恢复到或突破战前水平的说法极难理解。要观察是否恢复到或突破战前水平，就必须把这时期的经济和战前作具体比较。至于用怎样的方法来和战前比较，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在这种场合大体上只能以人们经常使用的代表性指标即按人口平均的实际国民收入来比较。以政府发表的这一指标来看，战前的1934年到1936年的平均数为100，1955年增为

113.3,也就是说,在1955年恢复到并突破了战前水平。为什么以人均实际国民收入额来比较就行,而用别的比如用实际国民收入总额或者其他指标就不行呢?何况工矿业生产指数突破了战前基期年份的水平,而贸易却比战前水平低了许多,与战前的整个水平比较,到底如何看待这一点还是问题。因而如果要作正确和完整的表述,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整个日本经济是在什么时候恢复到战前水平的。于是有人不准备以数字来作战前和战后水平的比较,而离开数字,用另外的观点来判断是恢复时期还是积极发展时期。如果这样来考虑,那么1955年还说不上是属于恢复时期,而是属于日本经济将进入积极发展时期的分界之年。看一下此后第二年即1956年经济上升的过程,大体上就清楚了。

现将以战前为基期的1955年的各种指数列举在第8表上,供大家参考。此表将1955年的人口及其它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与战前的水平作了对比。

第8表 以战前为基期的1955年各项指标的水平
(1934—1936年平均=100)

人 口	129.7	劳动生产率指数	131.3
就业人数	133.5	实际国民总投资额	154.2
实际国民收入额	139.0	生产设备总量	200*
同上,每人平均	107.1	农业生产指数	133.7
(按会计年度计算)	113.3)	出口数量指数	71.6
产业活动综合指数	187.9	进口数量指数	90.1
制造业生产指数	189.4		
(耐用器材)	222.6)		
(非耐用器材)	168.0)		

(备考) * 此项是以1935年为100的指数。

从此表看,以达到与战前同等水平的人均实际国民收入为中心,工业生产特别是耐用器材的生产、生产设备总量等都达到了显

著的高水平，唯独进出口特别是出口，很明显地处于低水平。政府发表的实际工资和城市消费水平的指数很有问题，因此在此表中没有列举。如果将表中指数加以修正，估计实际工资指数约为85左右，城市消费水平约为90左右，都比战前水平有所降低。的确，从总体看，超过战前水平的很多，相反地，尚未达到战前水平的是少数，但其意义比较重大，如贸易特别是出口、实际工资和消费水平等重要指标都没有达到战前水平。

3. 向“价格景气”突进

生产扩大和经济增长而没有引起物价高涨，这在资本主义是少有的。生产扩大、经济增长未使贸易收支恶化，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中更是少有的。因此，象1955年那样经济扩大而物价趋于下降、贸易收支好转的“数量景气”，对日本资本主义来说是绝对罕见的。即使如此，这种趋势也不会长期持续，作为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只要经济扩大和景气上升继续下去，物价便不可避免地要上涨。利率下降也是诱导投资的重要因素。果然，进入1956年后，日本经济就呈现物价上升、进口激增和贸易赤字大幅度增加的趋向。“数量景气”为“价格景气”所替换。

从以上所说的来看，可以说这是当然的演变，但是，与1955年相比，在不同意义上还带来了异乎寻常的结果。根据1956年度开始时政府的预测，该年度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为4.3%，工矿业生产的增长率为7.2%，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国民收入增长13.9%，工矿业生产增长23.4%（都是生产指数增长率），实际增长率都比政府的预测高二倍。

诚然，日本国民收入增长率如果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增长率最高的西德、法国比较，已经达到了同等或稍微超过的程度。从实际国民收入对上年的增长率来看，日本1956年约为1950年的

二分之一，与1951年、1952年和1955年几乎相同^①。与1951年的美国、1950年和1955年的西德等增长率高的国家比较，1956年日本的国民收入增长率约低30%左右。的确，从工矿业生产指数的上升率来看，1956年^②日本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上升率最高的法国高一倍，比意大利高一倍半，比西德高二倍，与日本1953年的上升率相同，比1951年的增长率37%低得多。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来看，当时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的上升率连续四年高于1956年的半倍到一倍半，说明该时的景气不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说，都远远高于1956年。因此，1956年的日本经济高涨，决不是古今东西没有先例的情况。即使在1956年的前一年，日本也有过高速发展的经历。这是交了好运，取得了顺利的发展，到1956年景气进一步直线上升。再从每人平均的实际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指数来看，在从1955年到1956年的经济高涨中，人均实际国民收入超过了过去最高纪录192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指数也超过了1944年的最高水平。也许是从这一点出发，在这一年大肆宣扬“神武景气”^③，散布乐观的气氛。

上年秋季以来有所上升的物价，进入1956年后，发展为全面上涨，领先的是机械、五金等生产资料和资本货物的价格。在上年，生产的扩大是在没有进行大规模新投资的情况下实现的，需求与供给相适应，因而物价没有显著上升。但是这种状况不久就达到极限，“没有通货膨胀的增长”的时期结束了。

基于经济持续增长的期望，生产的扩大从以往的重点——与

① 根据本书统计表9计算，日本国民收入增长率1956年为9.8%，1950年为18.7%，1952年为9.8%，1955年为9.8%。——译者

② 根据本书统计表1计算，1956年日本工业生产增产率为23%，1953年为21%，1951年为37%。——译者

③ 日本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是“神武天皇”，所以“神武”二字在日本有建国初年之意，“神武景气”，即空前繁荣。——译者

出口有关的产业,扩展到投资器材、基础器材等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和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等。其中机械生产部门、特别是船舶(开工量增加63%)、电机(生产量增加52%)以及汽车(生产量增加40%)、普通机械(生产量增加32%)等生产部门的生产急剧增加。机械生产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扩大的,此后机械生产的大发展也是以此为开端的。造船的开工量也大大增加,接近于上年的一倍。全部机械的生产指数增加了45%,而且在这一年当中,机械、钢铁两个部门占生产增加部分的五成,化工部门的各种产品占生产增加部分的二成。

如上所述,这样大幅度增加生产,没有设备的补充已不可能,而且生产增加部分的一半以上,是由扩大设备投资所造成的需求带来的。年间的设备投资额达一万二千亿日元,比上年增加了65%,超过了被称为设备投资景气的1953年的半倍。这样,1955年以增加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在1956年便过渡到以设备投资为中心的经济景气。投资重点转到以石油化学工业、电子工业为首的新兴产业和新产品部门,以及以汽车工业的流水作业及其他自动机器为首的设备现代化方面。这一年,正式开始建设石油化学联合企业,所需资金达二千七百亿日元的第二次钢铁生产合理化计划也着手执行。所谓“技术革新”的设备投资时期就是从此时开始的,1957年以后设备投资进一步扩大。同时,电力、煤炭、钢铁、铁路运输等已告不足,为扩大产业基础,对这些要害部门也增加了投资。

银行对产业扩大投资也持乐观态度,并予以援助,因此信贷激增,银根吃紧,在上年总算趋于消除的超额贷款又大量增加。为此,日本中央银行的贷款再度急剧增加。于是1955年作为经济特点之一的经济正常化,很快在一年后发生逆转。

此时,埃及于7月实现了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同英、法的对立激化,10月末,英法终于对埃及开始进行武装侵略。日本垄断资

本也在这场战争中活跃起来，对扩大战争和爆发战争景气寄予很大期望。但是战争刚进行一个星期，英法便不得不停战，于是战争景气、朝鲜景气再来之梦破灭了。

景气暂时出现后退迹象，但是垄断资本预期苏伊士运河因英法军的轰炸而将被长期封闭，于是到年末，便由政府提出积极的预算方针，为下一年度编制“一千亿减税，一千亿财政投资”的预算，垄断资本希望以此强烈地刺激景气。（所谓一千亿财政投资是比上年增加一千亿日元预算，用来刺激景气。）

另一方面，这一年的出口在上年大大增加之后又增加了24%，增长率为世界第一。但是，进口的增长率超过出口，增加了31%。这是由于投资扩大，原材料和生产设备的进口突然增加。入超比上年增加六成，达七亿三千万美元，贸易收支进一步恶化。

4. 农业出现的变化

农地改革在1950年实际上已经结束。从此开始，日本的农业便摆脱了以往的寄生地主制度及其高额地租而进入新的阶段。但是农业仍然是小农经营，生产方法没有立即发生大的变化。

日本农村在战后拥有特别庞大的过剩人口，经过农地改革，已开始部分出现农业生产过剩。道奇路线实行后，生产过剩进一步加剧，农产品价格显著下降，农业户的经济状况恶化。

朝鲜战争爆发后，农业状况因地区和农产品的种类不同而有差别，但一般地说多少有些恢复。政府在1950年8月内阁会议上决定了确立粮食自给的方针，重点放在土地改良和米价政策上，以此谋求粮食的增产。需要确立粮食自给的理由有三：一是战争爆发；一是要节约进口粮食的外汇，以增加出口产业和重工业等的原料的进口；另一是确保以低价稳定地供应粮食，是将来积极发展经济的基础条件之一。

然而，当时的农政常常被称做“三成农政”。这是一种批评性的说法。例如，按当时的农政，交售大米，要以全部农户约六百万户中不到三成的上层农户（约一百六十万）作为确定米价的主要对象，才能保证交售数量；此外，为了增产粮食，在土地改良和米价政策上，也是以这些上层农户作为主要考虑对象，中下层农户只是农政上的一种点缀而已。

诚然，上面列举的粮食增产政策目标，在这一时期并不是一贯的，而且也不是立即生效的。1953年遇上自然灾害，出现了荒年；1954年也是歉收。荒年和歉收为根据MSA小麦协定接受美国的剩余小麦和大麦、接着根据美国的剩余农产品处理法接受美国的农产品（粮食及其他），提供了最好不过的理由。荒年和歉收造成的粮食不足起初并非不存在。但是，1955年以后，粮食不足已明显缓和。无论怎样，美国剩余农产品的最大魅力并不是日本可以借此弄到粮食，而在于剩余农产品在国内销售后获得的日元货款，可以用作财政投资，为垄断资本的设备投资和开发事业提供资金。

由于接受美国这种剩余粮食和通过通常途径进口的粮食增加，尽管1953年国内因灾荒而减少产量，农产品价格仍上升较少（参看后附第9表）。因粮食生产不足而粮食价格高涨的现象，就是在这灾荒年份也没有发生。

米价和与此有关的主食的统制，在这时期发生了相当大的质的变化。对主食的统制政策，从战时一直延续到战后，目的是在粮食不足时，也可保证最低限度的供应量；同时，低价政策可以抑制粮食供应价格的上升，从而防止因粮食不足和价格暴涨而引起的社会混乱，其最终目的是避免提高工人工资，以确保垄断资本的利润和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以这个意义来看，主食的统制政策有很重要的作用。只是由于执政的自由党以前有过完全撤消统制的口头许诺，所以在欢迎撤消统制和实行自由经济的气氛中，于

1950年3月简单地决定了对主食撤消统制和自由贩卖的方针。但是，它遭到了在野党各派的强烈反对，在人民群众中间反对的呼声也很强烈。

由于国家管理粮食或统制主食，使政府增加了巨额的财政负担，因而出现了撤消对主食的统制以减轻这项财政负担的要求。当时在垄断资本中，这种要求很强，后来池田财政大臣提出的坚决主张也反映了这种要求。农林当局对此却持慎重态度并加以反对，一向主张自由贩卖大米的农民也表示反对。尽管如此，1951年10月3日政府还是公布从次年1952年1月1日起撤消对大米的统制。但是，后来在11月1日池田财政大臣为编制追加预算而与道奇会谈时，因撤消大米统制牵涉到追加预算，能否撤消统制就成了问题。道奇担心撤消大米统制会破坏低米价、低工资的基调，发生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危险，持强烈反对态度。于是政府于11月6日立即发表声明，废除撤消主食统制的方针。接着，经济企划厅在《战后经济史》（经济政策篇）中写道：“当然是道奇的慎重论发挥了有力的作用”（参看该书第287页）。

1952年6月，撤消了对小麦的统制，接着，对大米实行了“完成交售任务后自由上市制”。从根本上说，这几乎未使一向实行的大米统制发生什么变化。重要的是，虽然大米统制照样继续执行，但是它的作用从这时起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历来强烈反对强制以低价交售大米的统制制度，一直要求撤消这种制度。但是，1951年秋在政府公布撤消米麦统制时，全国农民却举行大会，反对撤消这个统制。当时农业方面反对撤消统制是基于农协^①等的立场——

^① 农协，全称“农业协同组合”，是根据1947年的法律规定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农业合作组织，主要工作是在生产、贩卖、采购、技术、经营、信贷等方面为农民提供服务。全国农协分三级组织，即单位农协（基层组织），都、道、府、县农协联合会，全国农协联合会。——译者

反对难以对付的竞争对手即商业资本向农村的扩张。但是，撤消小麦统制之后，得自美国的剩余农产品和其它粮食的进口都有增加，而1955年又是创纪录的丰收年，农产品普遍地大幅度增产。到这时候，大米的供求和价格也逐渐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从1953年起，大米交售量已超过了政府规定的目标。前面已经谈到，尽管1953年还是荒年，大米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仍仅有些微上升。政府管理的大米储存量在1954年度特别是在1956年度显著增加，黑市米价在1953年涨至高点后就明显地降低了（参看第9表）。从粮食厅1955年12月发表的数字看，无论在产地还是在消费地区，大米的黑市价格还稍稍低于配给的价格。特别是在产地，大米配给制广泛地取消了。

第9表 大米供求缓和及黑市米价的降低

	1952年度	1953年度	1954年度	1955年度	1956年度
政府管理的大米 (存货量, 单位: 千吨)	1,260.0	1,514.0	1,514.0	1,406.0	2,535.0
黑市米价的指数 (1951年度=100)	108.9	129.8	123.9	116.2	106.0

(备考) 根据农林省资料。

黑市米价的降低，对于一向依靠黑市大米收入来弥补经济亏空的大多数农户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不仅如此，由于黑市或自由价格低于配给价格，一旦撤消大米统制，农民就不得不担心又发生压价收购大米的情况。因而，此时农民离开了原来的立场，反对撤消大米统制。同时，政府和垄断资本在决定1956年度大米的收购价格时，虽曾以丰收为理由加以压低，但对于大米统制本身，不得不将重点从原来的确保粮食供应的目的转到农民强烈要求的支持价格上来，使统制继续保存下来。为了维持保守政权，它们不能无视地域广阔的农村的这个要求；同时，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发生不测而导

致米价显著上升，为抑制米价上涨，还是守住大米统制这一隘口为好。这样，大米统制的主要目的便由确保供应逐渐转到支持大米价格上来，政府除收购、保管、投放及控制产地价格和配给价格外，继续维持作为直接统制的大米配给制度。

然而，经过1953年的荒年和1954年的歉收之后，到1955年，大米生产剧增36%，获得了创纪录的丰收，除麦类和水果以外，其他农畜产品也普遍获得大幅度的增产。增产主要是风调雨顺的结果，但是从其后每年的收获情况来看，大部分农产品都恢复到1954年以前的产量水平，而且不管天气如何，都维持在比1955年高得多的水平上。

日本的农产品特别是大米的产量，1955年起突然大幅度地上升。这是农地改革的结果，也是1950年开始的以土地改良和价格政策为支柱的粮食增产政策以及农业技术进步的反应，这些效应借摆脱荒年和歉收的机会，一下子都表现出来了。除大米以外，商品性的农产品特别是牛奶、猪、鸡、鸡蛋等畜产品，从1955年之前起到这之后都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商品性的农产品和畜产品生产大幅度增加后不久，多数出现了过剩的倾向，价格水平也趋于下降。

对此，1958年度的《经济白皮书》写道：“这些农产品的消费水平现在还是低的，在低水平的情况下，出现了过剩的倾向”，而且指出日本的农业是过度的小农经营，这就很难调节生产，“这种过度的小农经营，本身就具有助长生产过剩并难以调节的性质。”（1958年《经济白皮书》，第198、199页，括号内是作者所作的补充）

可以认为，在农畜产品过剩倾向的背后确有这样的因素在起作用。农地改革也没有改变日本的小农经营和耕地分散的现象，关于这一点，除白皮书指出的以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需要补充说明。这就是小农经营妨碍以生产的现代化来降低生产费用，从而妨碍了消费的大幅度增长，这又进一步加强了过剩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对大米以及大豆、淀粉、菜籽、蚕茧等采取的某种程度的价格支持制度，在丰收、大幅度增产、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大米，在1955年或以后的丰收时，价格支持制度发生了相当显著的效果，政府的收购价格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普遍有些提高，没有发生丰收贫穷和丰收饥饿的现象，而且对景气上升也产生了好的影响。因此，垄断资本撤消大米统制的要求越来越受到农民的强烈反对。不过，不能忽视的是，价格支持制度一直在扩大国家的财政支出，而且也丝毫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的倾向，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如上所述，1951年，池田财政大臣曾为垄断资本谋求实现的撤消大米统制作过很大努力，只是由于道奇的干预，在行将实行之前停止了。此后约四年，自民党经由保守合流而诞生，该党内阁中的农业大臣河野远比过去历代农业大臣强硬，并露骨地站在垄断资本的立场上推行农业政策。这就是所谓的“河野农政”。他顽强地执行垄断资本对农业的要求。最重要的是，为撤消大米统制作了不同寻常的努力。尽管如此，由于农民强烈反对和保守阵营内部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矛盾，撤消大米统制仍旧难以实现。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日本农业尽管受到农产品消费水平低和过度的小农经营的制约，但在这一时期总算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可是，它的发展速度、水平和规模与其他产业特别是急剧发展的工业和建筑业根本不能相比。换言之，在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农业的发展是极端落后的。不仅如此，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急剧发展，农业反而受到强烈的冲击。农民的分化进一步加剧，进而农业的发展也受到制约。关于这个问题，后面再作叙述，这里先稍为谈一下这一时期的前半期已明显暴露出来的专业农户减少和兼业农户急剧增加的问题。

日本在战后膨胀起来的农业人口，到1949年已停止增势，至

迟从1954年起便转入减少时期。这当然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以工业为中心的各种产业急剧扩大所带来的强大影响。农户总数也以1949年的六百二十五万户为最高,其后一直到1955年,几乎是每年减少。从农户总数的变化中可以看到,专业农户在1950年前就开始出现减少的倾向,1950年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的比例还各占50%,几乎彼此相等,以后专业农户便不断减少,而兼业农户每年都趋于增加,到1955年时,专业和兼业的比例是35%对65%,兼业农户约占全部农户的三分之二。至此为止,兼业农户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经营规模过小,要以非农业收入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或者是自己从事的工作工资收入不足,要以农业收入来补充。

进入1955年后,专业户微减,兼业户微增,农户总数也很少增加。但是从兼业农户来看,第一种兼业农户和第二种兼业农户在1950年和1955年期间都有增加,而1955年以后则变为第一种兼业农户趋于减少,第二种兼业农户趋于增加。(参看第10表。所谓兼业农户即家属中有人从事其它职业的农户。第一种兼业农户,是指以农业为主的兼业农户;第二种兼业农户,是指以农业为辅的兼业农户。)第二种兼业农户虽说包括在农户当中,但不能说是正经的农户。这种农户后来在1960年约占整个兼业农户的半数。从统计上可以看到,在1955年和1960年期间农户总数增加得很少(从六百零四万三千户增加到六百零五万七千户),但农业人口减少的倾向停止了。实际上,因为不能称为农户的“农户”增加了,在1960年这样的“农户”中专业农户和第一种兼业农户的户数相等。实际上正式农户从1955年到1960年减少了约三十万户,因此1960年约六百零六万农户中算得上农户的大体上约占三分之二,比1947年约减少二百万户。

总之,从农业就业人数连续减少的趋向看,在农户数上,1955

第10表 农户总数及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数的变化

(1) 实数

(单位: 千户)

	农户总数	专业农户数	兼业农户数		
			总数	第一种兼业	第二种兼业
1947年	5,909	3,274	2,636	1,678	951
1950年	6,176	3,086	3,090	1,753	1,337
1955年	6,043	2,105	3,938	2,275	1,663
1960年	6,057	2,078	3,978	2,036	1,942

(2) 构成比

1947年	100.0	55.4	44.6	28.5	16.1
1950年	100.0	50.0	50.0	28.4	21.6
1955年	100.0	34.8	65.2	37.7	27.5
1960年	100.0	34.3	65.7	33.6	32.1

注: 1. 本表系据农林省统计调查部的资料制成。

2. 不包括冲绳。

3. 1947年系当年8月1日数字, 其余年份均系当年2月1日数字。

年前是专业农户趋于减少、兼业农户趋于增加, 而1955年以后则是专业农户减少的趋向放慢, 兼业农户脱离农业的趋向在发展。这种变化是值得注意的。

5. 垄断的加强和对外关系

替代吉田内阁的鸠山内阁刚一登台, 就打出“完成独立”、同世界各国进行“独立自主的外交”的旗号, 迅速同苏联进行恢复邦交的谈判。但是进行这项谈判实在极其困难。与此同时, 日中贸易在朝鲜战争时被美国禁止以后, 通过缔结民间形式的第一次贸易协定(1952年6月)、第二次贸易协定(1953年10月), 在美日两国政府的禁运政策下, 仍旧有所恢复, 日苏谈判开始后不久, 于1955年5月签订了第三次日中贸易协定, 至此, 政府总算给予了间接的保证。日中贸易尽管受到日本政府及在它背后的美国方面的

严重阻挠，但还是大幅度增加了，进出口合计 1955 年超过了一亿美元，1956 年达到一亿五千万美元。日苏恢复邦交虽有曲折，但也于 1956 年 10 月实现了，1957 年两国正式建立了通商关系。日苏间的外交、经济关系和日中间贸易关系的某种改善，是解除占领后、吉田内阁下台前后日本垄断资本的一项方针，或者是一部分人的方针。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日本于 1952 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又于 1955 年 9 月加入了关税贸易总协定，1956 年 12 月加入了联合国。

这样，由鸠山内阁提出的“完成独立”、“自主外交”的路线，在冷战暂时缓和、国内经济好转以及随之而来的垄断资本加强的情况下，逐步取得了进展。同时，在对美关系上，日本政府由于国内的景气和丰收，曾谢绝第四次接受剩余农产品的协定。但是，随着防卫责任的增加，美国强硬要求日本承担义务的压力，在鸠山内阁加紧重整军备的配合下，已把日本深深地纳入了美国的远东战略体系。当然，日本对美从属关系的根本不是在这届内阁才确定的，而是在占领时期、吉田内阁时期早已确定了。

另一方面，迎来了真正发展时期的日本垄断资本，开始热衷于向海外扩张。在国内，垄断资本还以其强大压力实现了保守联合；病弱的鸠山首相于 1956 年末下台之后，石桥内阁代之而起。此后不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出现了重要的变化。

七、外汇危机和“锅底景气”

1. 外汇危机

鸠山首相因病下台，继任的石桥首相也病倒了。石桥内阁组阁后仅两个月就为岸信介内阁所代替。岸信介是声名狼藉的反动人物，战前与关东军勾结，操纵“傀儡”满洲国政府，侵略中国，又作为东条内阁的阁僚参与对美宣战的决策。战后他从巢鸭战犯监狱出来，摇身一变而为强调日美合作的人物，而且迅速取得机会，当上了新内阁的首相。这届内阁遵照日本垄断资本的意图，十分热心地追随美国，为垄断资本的内外膨胀、加强反动统治而积极活动。

但是，由石桥内阁向岸信介内阁过渡时，日本经济正面临着非常的事态。日本垄断资本围绕着苏伊士运河战争所做的景气之梦，随着战争迅速结束而很快破灭了。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封锁捞取一大笔财富的期望，也随着该运河提前五个月开放和日本贸易的损益相等而落空了。问题不仅如此。由于原来估计战争将会扩大，苏伊士运河将长期封闭，因而从海外大量购进物资，以致进口激增，到1957年时便出现了巨额入超，使外汇丧失殆尽。于是实行了外汇配额制度，加强外汇管理。这样一来，估计限制进口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如果不及早进口货物，将来可能失去进口的机会，于是进口反而更加迅速地增加。贸易收支每月都出现巨额赤字，1956年末，日本的外汇储备近十亿美元，五个月后便减少到近五亿美元，到5月末时仅有五亿一千万美元，其后又进一步减少到四亿美元。

这样猛烈的投机进口造成了巨额的外汇流失。最初，政府以抑制国内物价高涨需要增加进口为理由肯定增加进口是正确的，并在国会上提出了刺激景气的“积极预算”，没有将外汇滔滔流失的重大事态特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但是，该项预算在3月末才获得通过。在外汇储备从五亿美元进而减至四亿美元的形势下，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增加进口了。实际上，进口反而剧增，4月、5月都突破了四亿美元。日本经济在对外方面顿时处于行将破产的境地。于是垄断资本急剧扩大的方针和池田财政大臣的积极财政，都遭到了大失败。

2. 景气恶化和摆脱危机

由于估计错误而发生的这场深刻的外汇危机，政府原来是无所作为地置之不理，此刻才匆忙改变政策。5月上旬，当人们还在讴歌神武景气时，日本银行突然公布提高公定利率，开始紧缩金融。抑制进口的措施也采行了。到6月中旬，政府决定了制止国际收支恶化的综合对策。

为摆脱外汇危机，政府乘早先预定的岸信介首相访美的机会，向美国政府和在美国政府影响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提供外汇贷款。结果到6月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给予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并于7、8月交给日本。8月间，日本同美国政府的华盛顿进出口银行之间又达成了一亿一千五百万美元农产品进口贷款的协议。

由于巨额的进口仍在持续进行，这时日本的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尽管接受了外汇贷款，但到9月末，其外汇储备仍维持在四亿五千万美元的低水平上。如果没有外汇贷款的援救，日本经济将会出现不可想象的状况。所以岸信介在访问美国以后，对美国的追随和从属态度迅即更为坚定。

由于采取了紧缩金融、紧缩财政、抑制进口等政策，景气陷入了停滞状态。1957年初以来大量进口的原材料和产品，造成了极大的库存压力。为了拯救垄断资本，由银行提供了巨额的库存贷款，另一方面却大幅度地削减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

尽管紧缩银根，垄断资本的设备投资并没有中断。正是因为这样，1957年垄断资本的整个设备投资比急剧增加的上一年（1956年）又增加了二成。与此相适应，金融机构对设备资金的贷款1957年度比上一年度增加约四成。就是说，在金融紧缩的情况下，银行对垄断资本的贷款反而大大增加了。

为了满足扩大包括库存贷款、救济贷款等在内的周转资金信贷和设备资金信贷的需要，日本商业银行大大增加了从中央银行的借贷。所以日本银行即中央银行的贷款在1956年4月末缩小到一百八十四亿日元以后，到年末便增加到一千四百亿日元，进入1957年后更以异乎寻常的势头进一步增加，到8月时终于超过了五千亿日元，此后一年间一直维持在五千亿日元的高水平上。在通货管理制度下，作为国家机构的日本银行如何以提供信用的办法来援助垄断资本和防止景气恶化，于此可见一斑。

在金融紧缩的情况下设备投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当时的通产大臣和《经济白皮书》试图以设备投资的大型化和长期化以及连续工程很多来说明这个问题。对于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认可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不是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支持下对产业垄断资本提供庞大的信用，象这样的“大型投资”或长期投资持续下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产业垄断资本急剧而大幅度的扩张，完全是依靠银行的巨额贷款来维持的。撤回这种贷款当然不用说，就是对正在进行的设备投资停止发放追加贷款，也将给这类企业带来致命的后果。至于与产业垄断资本关系较深的银行本身，所受的损失和打击可能更加严重。

所以银行特别是以信用为招牌的银行，特别害怕出现这种情况。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经济恶化时，银行也要对产业垄断资本提供包括设备资金和周转资金在内的大量信贷。

这样，从1956年度初开始紧缩而在1957年度转为大幅度增加的设备投资，到1958年度时便减少了一成。到1957年年中为止急剧扩大的原材料库存以及到1958年初为止还继续增加的制成品库存，从1958年春开始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工矿业生产指数从1957年3月达到高点之后缓慢地趋于下降，但是进入1958年情况又有了变化，从春季开始，生产指数缓慢而明显地趋于上升。一度显著增加的就业，在金融开始紧缩时趋于减少，但在1958年春又有所增加，以后继续维持这个水平。

进口贸易在采取紧缩金融和抑制进口措施前一直猛增。然而，由于政府的紧急措施以及国内进口物资库存严重过剩，在抽紧银根的同时，进口大幅度地减少，一直到年末，连续减少有半年之久。到1957年末贸易收支大致恢复平衡，1958年中进出口仍处于平衡状态。整个国际收支比贸易收支先行一步，从同年10月起转为盈余，外汇储备也从这时开始增加。这样，外汇危机便由于进口剧减、获得外汇借款以及特需等原因而勉强摆脱。持续维持高水平的日本银行的信贷额，随着库存的减少和国际收支的改善，也从1958年9月起趋于减少。

另一方面，批发物价在实行紧缩措施后也缓慢地下跌，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股票行情也下跌了，但跌势比较微弱，因而比其它指标回升得早，从1957年末起趋于上升。

除股票价格和外汇储备的变动外，进入1958年后的经济形势，如上所述，从下降趋势转为停滞状态，而且1957年度的设备投资又意外的多，根据这些情况，经济企划厅判断，从此以后，由设备过剩引起的景气停滞将比较长期地持续下去，《经济白皮书》也发

表了这种看法，称之为“锅底景气”。

然而，这种预测实际上并不准确。景气的停滞虽在1958年中还在继续，但并没有拖得很久，进入1959年后，工矿业生产首先明显地趋于增长。“减少库存”持续一段时间后，从1959年5月起便开始补充库存，就业也从这时起趋于增加。继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到同年4月已超过十亿美元。因此到1959年的4、5月，景气已摆脱停滞而转入上升。

对于此次景气从恶化到回升的经过，有种种说法。有人认为景气后退不是由于设备过剩而是由于单纯的库存调整，以设备过剩论为根据的长期停滞的预测不成立后，这种主张更为得势。诚然，应当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库存变动的影晌是大的，但设备投资的剧增及以后的增减，对景气也不可能没有某种程度的影响，无视这一点而单纯注意库存的变动是不妥当的。仅着眼于库存的变动，就不会从周期危机方面考虑问题，而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中间危机或部分危机，不认为这是周期危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少。这种观点的论据无非是：生产没有全面下降，物价下跌轻微，没有伴随金融危机，或者景气在较短期间便由下降转为回升，等等。

但是，否定周期危机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首先，前面已经谈到，设备过剩作为当时景气恶化的一个原因，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次，当时的外汇危机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如果不能从海外得到外汇贷款，势必要改变紧缩金融，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景气进一步恶化，从而引起连锁反应，促使汇率下降，并使通货膨胀随之爆发。对于这些，所以能够防患于未然，主要是仰仗战后新的国际经济机构和基于同美国的关系而得到的外汇贷款，多少缓和了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恶化的景气。同时，商业银行提供信用，与此相关的日本中央银行提供信用，以及作为这种信贷的基础的通货管理

制度,还有国家财政的运用,即实行“积极”预算和增加财政投资额度,通过产业特别会计^①延期支付景气繁荣时期的剩余金额,这些防止景气更加恶化的措施,都发挥了值得重视的作用。

总而言之,这种危机虽然不是战前那种在金本位制下出现的最典型的危机形态,也不是部分危机,而是普遍的生产过剩引起的普遍的生产下降,其基础仍然是某种程度的设备过剩。而且外汇危机造成的悲惨结局和景气的极端恶化等,即使依靠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新机能而回避掉,也可以认为这仍然是危机,而且是最近新条件下的危机的一种类型。在最近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以伴随金融危机为必需条件的循环性、周期性危机,虽然不敢说绝对没有,但也是极少发生的。如果将来真的发生了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经济危机,那将是资本主义濒临崩溃的危机,是比周期性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的重大事态。1957年的这场危机主要是经济的内部因素引起的,因此将它作为战后的经济危机来考察,是最适当的事例。

3. 从对外经济关系的动向来看

如上所述,正当外汇危机期间,岸信介内阁依靠美国援助得到了外汇贷款,这使岸内阁进一步加强了从属美国倾向,增高了对美国要求的修订安全保障条约的热情。但是在这里,我们不把它作为日美经济关系而首先作为日本自身的对外经济扩张来考察。

在日本垄断资本进入正式发展时期的鸠山内阁时,即在“神武景气”时期,垄断资本的眼睛已经贪馋地朝向海外、特别是朝向东南亚和中南美,这在前面已经谈过。岸内阁成立后,这种倾向进一

^① 产业投资特别会计,是日本为发展经济、促进产业开发,以财政资金向重要产业投资的一种特别会计。这项会计,是在美援物资回头资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译者

步加强；与此同时，日本垄断资本的海外扩张、在海外的活动，迅速进入实行的时期。

作为一般的倾向，这是垄断资本谋求取得真正的发展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确保海外的原料基地、产品以至资本的输出市场的明显表现。同时也反映出，在神武景气碰到挫折和外汇危机时，为了摆脱危机和谋求将来的发展，垄断资本深感有向海外扩张势力的必要。

作为推进经济外交的姿态，岸首相在 1957 年曾两次出访东南亚各国，显示了相当的热情。而且在这期间，正当外汇危机之际，他又访问了美国，向美国提出了有关东南亚开发的岸设想。这就是设立五亿美元的开发基金及组织管理这笔基金的国际机构。总之，要求美国拿出巨额资金，主要由日本用于开发东南亚资源，这是因为由美国直接进行这种开发容易引起旧殖民地各国的警惕，所以由日本出面干，完全出于自私的目的。这在东南亚各国也招来了坏名声，而美国本意也不想干，结果这笔基金并未成立。但是，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岸设想在表露日本垄断资本随心所欲的愿望和意图的同时，直截了当地展示了它的从属美国的倾向及作为从属者所扮演的角色。这一设想也许在暗中得到了垄断资本的中枢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等的赞同，因此也可以视为它反映了日本垄断资本或者现已逐渐抬起头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对美从属性。

下面，我们将举出这一时期垄断资本向海外扩张的几个明显的例子。

钢铁垄断资本八幡、富士、日本钢管三家公司，为确保原料铁矿资源，从 1958 年开始着手对印度铁矿的长期开发。这是三家公司 1955 年对菲律宾、1956 年对马来亚和果阿铁矿进行开发的继续。1957 年，以八幡、富士两家钢铁公司为中心的日本垄断资本预定投资一亿美元，与巴西政府合办巴西乌季米纳斯钢铁厂并开始

建设。引人注意的是，作为开发海外石油资源的资本输出，在1957年到1958年，为获得阿拉伯海上油田利权并进行开发工作，成立了阿拉伯石油公司，使垄断资本获得并开发海外油田的多年夙愿得到实现。接着在1959年同印尼谈判提供日元贷款，着手开发北苏门答腊油田。

除此之外，各种各样的海外投资在把主力放在东南亚、中南美的同时，也涉足中东和阿拉斯加等地。

根据贸易会公布的材料，截至1959年1月1日为止，日本民间的海外投资总额达一亿一千四百二十三万美元，技术援助达一百十八件。

在民间投资以外，为促进成套设备的出口，在1958年决定对印度发放日元贷款（三年间达一百八十亿日元），是引人注目的。并且，在1955年以后，对东南亚各国陆续执行了赔偿。前面已经谈到，由于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这种赔偿工作只是部分地实施，以后便停止了，东南亚各国对此极为不满。尽管如此，美国在旧金山媾和条约行将缔结时，还是对日本采取免除赔偿的方针。由于东南亚各国坚决反对，美国不得不承认它们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但不是以拆迁工厂设备和现金来赔偿，而仅限于劳务赔偿，各方就此达成妥协。这样，对东南亚各国的赔偿工作，主要采取以新制造的产品偿付的形式。这种赔偿的代价完全是由日本的财政来支付的。这种赔偿方式，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方面还具有补充的作用。此后，对外赔偿都是与签订经济合作协定同时进行的。诸如1955年同缅甸、1956年同菲律宾、1958年同印尼签订的赔偿协定及其执行，都是这一时期对外经济关系和资本输出的重要动向。接着，于1959年同南越也签订了赔偿协定。对以上四者的赔偿合计达十亿多美元，赔偿期限最短是五年，最长达二十年。在实行上述赔偿的同时，还进行了经济合作，金额合计达八亿多美元。

与这些动向相反,好容易好转起来的日中关系,由于岸内阁的上台而被完全破坏。1958年5月在长崎发生的中国国旗事件,尽管有台湾等方面捣乱的因素,根本原因仍在于岸内阁追随美国、热衷于加强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其对中国的关系,完全以此为基点来考虑。1958年达成协议的日中钢铁协定、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以及其他协定和商谈,都由于岸内阁的这种态度,致使中国方面不得不宣布取消和失效,贸易关系于1958年5月陷于全面中断状态。美国强加于中国的出口限制,实际上在此前一年通过英国等国家之手已经大大突破,而与中国邻近,在银根吃紧和国际收支恶化的情况下十分需要扩大贸易的日本,却不与欧洲各国一起同中国进行贸易,而竟然与美国一起断绝同中国的关系,这是不可想象的。

4. 提高生产率运动

自神武景气出现前后到这一时期,劳资之间和工会内部的中心问题之一是提高生产率运动。

这一运动在欧洲,早在1948年就开始了。当时是在美国的指导和援助下,与马歇尔计划一起进行的。它的现实课题,正如日本生产率总部在自己出版的图书中所说的那样,是“在政治上,适应美国对苏联的战略攻势,……在经济上,依靠美国援助迅速恢复西欧经济,这是肯定无疑的。”(山本孝:《提高生产率的诸理论问题》,第59—60页)关于它的目的,该书又写道:“提高生产率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取高额利润,而且不能否认,为维持资本主义的现实,也要求美国与西欧双方开展这一运动。”(第63页)可以说,这一记述反映了问题的实质。

美国政府从1953年开始将提高生产率运动引进到日本,希望将这一运动注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恢复的日本资本主义。不

久便进入准备阶段，以美国剩余农产品的回头日元和从日本政府预算中拨出的一亿二千万日元作为活动资金，这样，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政府和垄断资本共同出力，于1955年2月成立了日本生产率总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听任资本家来掌握，势必给工人造成巨大的负担。不叫劳动生产率，只叫生产率，到底指的是什么，不明确。然而正是这样含糊其词，才被资本家利用来为自己扩大利润，给工人增加负担。生产率提高之后，或者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应该提高工资，提高生产率的利益应该在资本家、工人和消费者三者之间分配。但结果恰恰相反。

提高生产率“运动”的本质，正如刚才所引用的记述那样。因为提高生产率本身存在着很大问题，工人不能立刻表示赞成是理所当然的。这一运动引进日本之后，也曾遭到强烈的反对，围绕这一运动，在工人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纠纷和混乱。

日本工会总同盟明确了八项原则或条件后，于1955年9月最早参加了生产率本部。全日本工会会议因所属全日本纺织工会同盟内部存在若干反对意见，稍后才参加。但是，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以下简称“总评”）采取了强烈反对这一运动的立场，并倡议进行反对提高生产率的斗争。

由于日本工会是以企业为单位组成的，在联系企业之间的竞争提出进行这一运动的问题时，持反对立场能否贯彻始终，不是没有问题的，何况垄断资本、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使用了各种巧妙的手段来进行瓦解活动。因此，总评及其所属的工会，特别是一部分工会干部，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接受了提高生产率运动的影响。加以垄断资本正从此时开始积极谋求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生产现代化和技术进步等，在这样的浪潮当中，提高生产率运动的影响自然要继续扩大。所以在这一时期，总评所属工会不得不把斗争的重

点放在反对提高生产率上，但是取得斗争的效果，需要花相当大的气力，这也是很清楚的。

但是，从提高生产率运动的本身来说，其主要工作是实现所谓经营合理化、现代化和有领导的劳务管理。它们大部分是引进美国式的方法来进行。当时属于垄断资本一级的大公司，被列为受现代化指导的对象。但是，由于垄断资本迅速壮大，不久它们都各自从外国直接引进新的方法。所以此后重点逐渐转移到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对垄断资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等企业的现代化指导上。最受重视的是对工人方面的工作。和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①采取的与工会正面对立的形式不同，它深入到工人中间，把工人的想法引导到对资本有利的方向，以消除其斗争力量。这种工作主要是针对工会干部和专业人员以及车间主任等进行的。于是，在劳资关系现代化的题目下，按照美国形式采取劳资协调的方针，进一步引进了“劳资协议制”。并以与海外交流的名义，接受美国政府的资金及其他援助，每年派遣为数众多的资本家、工人、学者、专家主要到美国进行考察。最近也向欧洲派遣这种考察团。到1962年为止，由日本生产率总部向海外派遣的考察团大致达四百七十个、四千七百人以上。

提高生产率运动在六十年代初似乎已接近于终止它的作用的时期。这一运动可以说在日本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但是并未达到当初指望的那种目标。特别是在从根本上改变广大工人的头脑方面未必取得成功。在日本经济划时代发展时期，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与此相比，工资的提高却很低。于是资本取得的份额增加，而工人所得的份额减少。（据劳动省公布，1955年

^① 日本经营者联盟简称“日经联”，是各地方经营者团体和各行业经营者团体的联合组织，成立于1948年，现在参加的团体约一百个，主要活动是处理劳资问题，作为资方代表，与工会处于对峙地位。——译者

到 1961 年期间,整个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了 61%,而实际工资只增加了 32%。又据日本中央银行分析,资本和工人所得的比例,1956 年为五十五比四十五,1961 年则变为六十一比三十九。)这与生产率总部最初提出的“提高生产率的各项成果在经营者、工人、消费者之间公正分配”的“原则”大相径庭。工人对此都有切身感受。正是因为这样,提高生产率运动没有真正得到工人阶级的广泛支持。

八、得意洋洋的扩大和自由化的起伏

1. 景气迅速恢复及其原因

所谓“锅底景气”正象它的名称本身所显示的那样，取得经济回升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结果在低点爬行约一年时间，所谓锅底景气才告结束。从1958年秋开始，景气在各个方面都出现活跃迹象，到1959年春就转为全面活跃，以后一直保持上升的势头。

1957年危机时景气下降得比较轻微，前面已有叙述，而比较快地转为上升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有库存投资方面的原因。库存的下降大约是从1957年年中开始的，降至一定限度之后，生产和销售便一点一点增加，因此，企业从1958年年末开始增加库存，进入1959年后库存又进一步急剧增加。

其次是出口增加。到1959年上半年，出口增加得特别显著。大部分是由于对欧洲的出口增加，特别是对美国的出口剧增。包括下半年在内的一年期间，出口总额比上年增加了20%，其中的75%即四分之三是得自对美国出口的增加。1959年对美国的出口比上一年实际增加71%，结果是这一年的对美贸易在海关统计上入超仅约六千九百万美元，在外汇统计上竟出超一亿多美元。日本对美国大体上每年都有巨额入超，入超的剧减或出现出超，这在停战后还是第一年。

在日本陷入“锅底景气”之际，欧洲主要国家并未发生危机，它们或者是景气停滞，或者象西德那样呈现缓慢的上升。相反地，美

国在日本因外汇危机而紧缩金融之后就发生了生产过剩危机。此后，美国的景气经历了V字型的过 程，从急剧下降转为迅速上升，于1959年春结束复苏过程后便持续地急剧回升。这种景气好转正是日本对美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美国在景气好转时增加进口的商品多数来自日本，如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胶合板、玩具、纺织品、钢材等大半是从日本进口的。

以美国景气上升为主要原因的出口剧增，使日本1959年的出口总额达三十四亿美元，终于恢复到战前水平（1934年到1937年的平均数）。在恢复到战前水平方面，出口比进口迟了三年，工矿业生产迟了九年。但是，这一年出口的大幅度增加，不能不说是日本景气提前回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出口增加有同样意义的是生产的增长。必须提到的主要情况是汽车、电视机、电动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及其生产的显著增长。到1959年下半年，设备投资急剧增加，随后对资本货物机械的需求及其生产也在扩大。这样，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货物两个领域的机械的生产在生产的扩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种产业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趋势，成了这一时期景气上升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一般认为，日本工业如果没有这种意义上的高级化便不能发展。由此，1957年到1958年间一度发生的设备过剩状况，在短时期内就消除了，1959年并再度出现设备投资扩大的趋势。于是以机械工业的大幅度增产为主导，1959年的工业生产全面地大规模增加。从通产省发表的生产指数看，制造工业综合指数比上年有显著增长，增长率为26%。增长率最高的还是机械工业，例如机械工业综合指数的增长率为44%，电气机械工业为72%。这一年机械工业生产的增加约占整个工矿业生产增加部分的一半。

1959年的工矿业生产和国民收入，虽然没有达到朝鲜战争爆发那年1950年的水平，但是超过了神武景气的1956年，增加比率

很高,因而国际收支非但未出现逆差,反而取得了四亿八千万美元的盈余,整个物价也仅有少许上升,没有发生所谓景气过热现象。其原因是,生产设备尚有余力;劳动力还有剩余,特别是没有感到不足;没有出现引起进口剧增的情况;金融从一开始就有紧缩的迹象,政府和日本银行采取了抑制信贷和提高公定利率的方针,及早地制订了调整景气的政策,等等。

进入1960年后,在上半年出现了若干景气停滞的迹象。这是库存投资已经完成一轮和对贸易外汇在日本开始自由化有所疑虑所引起的。阻止修订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恰好在这时进入前所未有的高潮,全国处在大规模示威游行和以国营铁路工人为中心的大罢工的浪涛中。在广大人民“反对安保,打倒岸信介”的要求下,岸内阁被打倒了。这个时期也从这时开始(1960年7月)大致结束。代之而起的池田内阁为准备大选,作为恢复保守政权声誉的政策,以低姿态伪装自己,为恢复名誉和发展垄断资本,提出了哗众取宠的“收入倍增计划”和“高速增长”政策。

2. 收入倍增计划

池田首相的亲密朋友一桥大学教授中山伊智郎提出,日本在1958年末同西欧各国恢复货币兑换关系(象过去一样,本国货币可与外国货币自由兑换)后,必须同经济迅速发展的西欧各国进行竞争,这就要从根本上改善日本的经济体质,并且要改变想法,把工资提高一到二倍,否则是不行的。当时担任通产大臣的池田采纳了这个建议,到处提倡“月薪倍增论”。

实际上,在1959年日本经济顺利而大幅度地发展之后,为使经济能够持续地这样发展,在岸信介内阁时已经从1959年末起着手制订以国民收入倍增为目标的长期计划。

不久,由于修订安全保障条约,岸内阁下台,池田内阁上台了。

池田首相急忙提倡以迅速扩大经济为方针的收入倍增。因为池田曾经提倡“月薪倍增”，此时国民当中有不少人误认为收入倍增就是月薪一下子要增加一倍。对于政府和自民党来说，这种误解也许是一种意外的幸运。实际上正如后面说明的那样，即使在十年以后，收入倍增计划也未使月薪或工资水平平均增加一倍。

池田首相十分顽强，他要求制订中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尽可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这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近似于国民收入增长率），尤其强烈主张将最初三年的增长率设想为最高水平。池田首相非常乐观，他认为日本经济完全能够迅速增长，而且一旦迅速增长，日本经济的弱点与问题就迎刃而解。但是企划厅的主管官员反对制订过高的增长计划，他们认为要使经济持续增长，当前需要的不是高比率增长，而是大规模地改变产业结构，一句话，就是必须坚决推行结构改革的政策。

当年（1960年）12月末，内阁会议决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是，按1958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要由1960年度的十三万亿日元，到1970年度达到二十六万亿日元，即十年实际增加一倍。池田首相代表的一部分垄断资本的乐观见解，成了这一目标的基础，最初三年的经济增长率定为年率9%，大大高于十年的年平均增长率7.2%，让池田首相来说，这样的幅度实在过低。

可是，如果简略回顾一下战后日本制订的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可以看到多少具备规模的最初计划，是1947、1948年以社会党为首的片山内阁及其后的芦田内阁所制订的经济复兴（五年）计划。这是为了复兴经济，以要求美国援助为最大目的而着手制订的，但是在计划最后决定之前，碰上了美国政府强制要求日本推行道奇路线，这个计划终于被束之高阁。

在这之后的吉田内阁期间，醉心于自由经济的吉田首相认为“计划经济是赤色的”，因而不太关心经济计划，在其“长期政权”之

下只制订了一项“自立三年计划”，但它也因爆发朝鲜战争，在经济动荡中消失。1955年鸠山内阁制订了“经济自立五年计划”。由于第二年神武景气的出现，经济取得了超过预料的发展，因而计划与实际状况相去较远。1957年末再次制订了“新长期经济计划”，提出了更高的经济发展目标，以1962年为计划的最终年度，计划可提前二年完成。

如上所述，正是充分考虑了1959年度出现的意外强烈的经济发展势头，重新制订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了十年后的目标。这个计划是日本战后经济计划中规模最大的，计划编制手法也较过去为好。例如，将政府公共部门和民间部门分开，对前者强调计划性，对后者则确定采取预测和诱导的立场。而且不单纯罗列数字，而就完成计划所必要的政策提出见解。

但是，对于一个综合性的长期计划来说，即使在社会主义经济下问题也非常多，在以无政府生产和对立的分配为基础的、以资本之间的竞争为原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下，情况更是如此；在这种经济下，虽说多少可以执行计划，但毕竟难以完全实现。必须认定，在这种计划中列举的大略方针，恰如其分地表露了垄断资本的意图。至于计划细目罗列的很多象是真的数字，不过是多余的装饰，这样说也不算过分。

基于这样的理由，在此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详细的计划数字，这一计划所涉及的广泛内容，也只有予以省略，但是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就计划的基本点在第11表中举出了简单的数字。从表上可以看到，十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而人均国民收入却没有实现倍增，工资水平比这更低，仅增加零点六五倍。

在产业活动中，工业生产有较大的增长（约增加二倍），在工业中机械工业生产的增加最为显著（约增加二点九倍），重化学工业所占的比率，1960年是63%，十年后上升为73%。相反，农业的地位

显著降低，十年间，生产约增加三成，而农业就业人口估计将减少约三百二十万人，约减少四分之一。

第11表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十年增长率

(1970年同1960年相比)

国民生产总值(实际)	增加1倍
国民收入(实际)	增加1倍
人均国民收入(实际)	增加0.84倍
工资水平(实际)	增加0.65倍
工业生产	约增2倍
农业生产	约增0.3倍
农业就业人口	减少23%

(政府发表的数字大体上是以1956—1958年的平均数为基础的，因此所提的增长倍数，非常容易出错。)

在制订倍增计划方案时，除上述增长率外，还存在着各种对立的意见。其中关于农村就业人口减少到什么程度的看法，分歧最大。过去，政府和自民党害怕农民和农业团体反对，不敢公开提出减少农业人口的政策。池田首相则不同，他断然地说农业人口十年后要减至三分之一，以后改为减少四成。池田首相满不在乎地说出这样的话，可以说是忠实地代表了垄断资本的见解。垄断资本或现代产业的急剧发展所带来的农业分化是太明显了，已经不能再蒙混下去了。另一方面，由于来自农民方面的强烈反对，以及政府内部也有一些反对意见，故在倍增计划中，如上所述，大体确定将农业就业人口缩小四分之一。

不限于这几点，整个计划是以垄断资本的立场为中心的，可以说是很好地表明了垄断资本的扩张欲望，但是在经济这样连续大幅度扩大的时候，果真不发生物价特别是消费物价的猛烈上升吗？在这一点上问题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稳定物价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十年间消费物价大幅度上涨，而实际工资水平十年间只有65%的微弱增加，这种增加岂不是很简单地就被物价的上涨淹没

了吗？同时，这个计划始终只是罗列积极的一面，对于在已经实行贸易外汇自由化的过程中它的不利的一面和扰乱作用，几乎未予考虑，这是必须指出的重大缺陷。

3. 贸易、外汇的自由化

对于日本经济来说，这时期还有一项必须指出的极为重要的经济政策，这就是贸易、外汇的自由化政策。

日本在从战前到战后的长时期里，都进行了贸易管理和外汇管理。对外贸易和外汇交易由国家控制，不能自由进行。战后也长期保持这种状态，主要原因是国际收支极其不稳，外汇储备很少，如果不进行贸易和外汇的管理，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下去；同时，在同外国的竞争中，贸易和外汇的管理制度，是保护并发展比先进各国落后的国内产业和垄断资本的极为重要的手段。而且，西欧许多国家也以同样的理由，对贸易和外汇交易进行若干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各国对日本的作法当然不会说什么，连主动实行贸易和外汇自由化并要求别国也实行的美国，也未对日本说什么特别挑剔的坏话。

因此，就1955年上半年购进商品的外汇预算来看，其中大部分用在外汇配额商品项目上，用在自动批准制即自由化的商品项目上的部分所占比率不过是16%。日本垄断资本尽可能地一边保留贸易和外汇的管理制度，一边在这个制度的保护下使自己在短时期内得到很大发展。

但是，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的各国自1949年以来，已陆续实行相互间的贸易自由化，在1958年末恢复通货之间的兑换关系时，从该组织域内国家进口的自由化率，占域内各国进口总额的89%，到1961年末，域内工业品贸易几乎完全自由化了。这些国家从美元地区(特别是从美利坚合众国)进口的自由化，随着

经济好转和外汇储备的增加,从1954年起终于有了进展。

另一方面,美国在1957年也爆发了经济危机,为摆脱危机而实行的通货膨胀以及垄断价格的提高,导致了物价上涨,从而美国商品与经济继续发展的西欧商品相比,与工资低而劳动生产率相当高的日本的廉价商品相比,其国际竞争力减弱,以致出口急剧减少,进口大大增加。加上巨额的对外军事支出,国际收支显著恶化,因此美国从1958年开始的黄金外流,一直没有停止,黄金储备连续减少。

于是,美国强烈要求欧洲各国实行自由化。欧洲各国考虑了这种要求,以出口连续增加所扩大的外汇储备为基础,恢复了通货之间的兑换关系,其结果促使从美国的进口使用美元的歧视性限制得以消失。这样,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各国对美元贸易的自由化率,在1960年增加到86%,接近于域内贸易自由化率的水平。于是欧洲各国贸易和外汇自由化的进度,远远超过了日本的预想。

虽然从1959年起日本景气回升,但其国际收支并未恶化,外汇储备在1959年年中增加了约四亿美元,到年底达十三亿六千万美元。国际收支好转了,而对贸易和汇兑仍然实行严格的限制,以保护国内专业,从而取得了远远凌驾于各国之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对此欧美各国当然不会默然置之。在这一年美国从日本的进口又增加了约五成,日本本身继续对进口实行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对从美国的进口实行歧视性的限制,这是很成问题的。

果然,美国从1959年开始强烈要求日本实行贸易、外汇自由化。当年年初它就特别强硬地要求撤消二百三十一个商品项目的进口歧视。从此日本政府逐渐放宽贸易限制,特别是以关税贸易总协定1959年10月的东京大会为契机,开始将自由化政策具体化。1960年1月,岸首相为签订新的安全保障条约出访美国,政府利用这个时机确定了推进贸易、外汇自由化的基本方针,

并应美国要求，对许多商品项目实行自由化。有人认为这是岸首相访美的礼物（就在此时，全日本学生联合会学生静坐羽田机场，企图阻止岸首相访美）。接着，日本政府背着国民，于1960年6月23日暗中交换了新安全保障条约的批准书。条约生效的第二天，便决定了“贸易、外汇自由化大纲”。大纲的主要内容是将贸易自由化率（1959年时的自由化商品项目进口额在同年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率）由1960年4月的41%到三年后的1963年4月提高为80%（石油、煤炭自由化时要达到90%）；外汇的经常交易原则上在二年以内自由化；对资本交易也逐渐放宽限制。岸首相在其临别礼物新安全保障条约上，又添加了这一份礼品，在这之后二十天就下台了。

这就使自由化的暂时日程大体上具体地定下来了。正式的自由化终于进入决定时期，在这前后，国内产生了不安之感。政府和垄断资本就自由化进行了种种宣传。围绕着自由化问题产生了种种议论。政府和垄断资本一致认为自由化非常好，首先，自由化可以为日本市场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可以使贸易兴旺、产业发达，促进企业的合理化和体质的改善，如不进行自由化，日本则将被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被孤立起来，或者与世界的进步背道而驰。这些话与接受MSA（相互安全保障法）援助和提高生产率运动时的宣传基调，颇相类似。多数议论认为自由化是“外力”和“内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美国和垄断资本使日本进一步从属于美国的野心的表现，是日本垄断资本为同外国对抗而采取的自发性的发展政策。自由化确实有这样的一面，即它是参加联合国的资本主义各国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集团经济的教训，为建设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秩序而提出来的。但是必须说，自由化对发达国家直接起确保和扩大其商品以及资本的海外市场的主力作用；同时，对竞争落后的国家，即以管理贸易和外汇的保护措施来促进国内产业

积极发展的国家,起着消除障碍、扩大国外市场的主力作用。推进自由化的主体是美国垄断资本。自由化不仅有积极扩大市场的一面,而且有保卫自己的一面。在最近时期,要求自由化的已不单单是美国垄断资本,欧洲各国垄断资本也加入了要求日本自由化的行列。欧洲各国一边处在被要求自由化的地位,一边也明显地加强相互间的协作关系,以对抗美国。欧洲多数国家都倾向于以缓和与撤消对日本廉价商品的进口限制作为交换条件,强烈要求日本实行自由化。

这样,不仅美国一国,而且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推行了自由化。日本处在被要求实行自由化的地位,它既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作为垄断资本,毕竟不能从思想上拒绝自由化。所以日本不得不在不致遭到重大报复的限度内,尽可能地暂时保留贸易和外汇管理,以加强国际竞争力薄弱的部门。在这个前提下,极力促进经济发展,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地从具有实力的部门开始实行自由化。对于处于优势地位的个别资本来说,它如其反对自由化,还不如以实行自由化为前提准备条件,以确保其在同国内其它资本的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而不成为落伍者。这样,只有因自由化而较多资本遭受打击的产业部门,才主张反对自由化。

在池田内阁制订倍增计划,提出积极的方针时,个别垄断资本开始认真制订自由化对策。同时,政府也制订了自由化计划,结果之一,就是欧洲的短期资金欧洲美元,为追求日本的高利率,在1961年上半年集中地源源流进日本。进入1961年时,尽管进口激增,贸易赤字急剧扩大,但非贸易收支由于巨额欧洲美元的流入而出现盈余,外汇储备连续增加,到4月已超过二十亿美元,创最高纪录。是年后半期,外汇储备又形减少,在尚未剧减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日本政府举行了例年的协商会议。因为此时日本经济正在迅速发展,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政府担心会议可能认为日本

没有继续进行外汇管理的必要，将劝告日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国家过渡，而不再根据国际收支方面的理由继续进行贸易和外汇限制。因此，政府一再恳求延期提出这项建议，作为交换条件，拟于1963年4月将贸易自由化率提高到80%的预定，提前半年于1962年10月实行，并将预定的自由化率提高到90%。

这样，政府使自己陷入了既担心贸易和外汇自由化、又将预定的自由化提前实行的矛盾之中。

4. 外资蜂拥而至

战后，日本在正式实行自由化之前，在经济由恢复到积极发展的时期，一直依靠贸易管理、外汇管理和外资法等，防止外国商品和资本拥入国内市场，从而保护和培育了国内的商品和资本，特别是扩大了国内市场。这是战后日本经济急剧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但是，绝不是说，日本垄断资本和政府反对引进外资。一般地说，日本既强烈希望引进外资，又对外国私人资本对国内的每一笔投资，保持相当警惕的态度。主要是担心外国的强大资本一旦直接进入日本，国内的有关公司将被夺走或压倒。日本制订的外资法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将这种不受欢迎的外资拒于门外，同时，它规定对于引进的外资尽可能给予保障，以吸引那些“受欢迎”的外国资本。对于来自外国的参加经营的股份投资和同日本企业共同设立合办公司等，虽然也不表示拒绝，但倾向于欢迎没有夺走经营权危险的外国技术援助和贷款投资方式。前面已经提到，关于这一点，美国商务部在1956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也是这样写的：“日本对外国人参加经营乃至管理的直接投资是担心的，比较希望技术合作与贷款。”总之，作为外资引进的，有美国援助等政府间投资，在私人投资方面有称作间接投资的贷款投资，还有这两者之间

的世界银行贷款等,以及技术援助。日本的方针是,多接受借款和技术援助,限制原材料以外的外国商品、特别是非必需的商品的进口,以保护和培植国内的产业和资本。

在保护和培植国内产业的格局尚未撤消期间,从自由化接近正式实施的1960年起,日本为迅速增强竞争能力而引进的外国私人资本特别是贷款、技术,迅猛增加。引进的技术自1960年起、贷款投资自1961年起、外汇债券自1961年起都急剧增加。随着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本交易的自由化也逐渐取得进展,所以来自外国的股份投资在1960年后也急剧增加,外国公司取得日本公司股份、参加经营的情况,在1960年和1961年都大幅度增加。以往提供技术援助,得到专利费就大体满意的外国资本,利用外资法的执行随自由化的进展而放宽的机会,或以提供更先进的技术为条件,要求参加经营的情况也增多了。此外,外国资本为迅速打开产品的销路,国内外资本设立合办公司的情况,随着自由化的进展,自1960年起也迅速增加(参看第12表)。

这样,随着自由化的进展,从外国引进的技术和资金以及外国的直接投资等,都急剧增加。这一趋势是与经济的迅速发展相联系的。那么,迅速增加的外国投资究竟有多少?完全准确的数字是没有的,据1956年美国商务部发表的概略数字,这一时期日本引进的外国私人投资总数为四亿四千七百万美元,包括技术援助投资在内,约占全部私人投资的三分之二。截至1958年9月末为止,根据笔者试算,外国(均指美国)的政府投资约六亿美元,私人投资约十亿美元(其中,资金投资四亿七千万美元、技术援助五亿六千万美元),包括其他合计达十八亿多美元。粗略估算(参考数),截至1961年度末为止,外国对日投资总额约达二十五亿美元,其中政府投资六亿美元,私人投资十九亿美元(其中资金投资十亿多美元,技术援助八亿多美元)。最近私人投资大大增加,特

第12表 外国私人资本的引进情况

(金额单位: 千美元)

	外 资 实 际 引 进 额				技术援助合同 的批准件数	主要合办公司 设立件数
	股份投资	贷款投资	外汇债券 投资	包括其他的合计		
	(50年) (3,150)			(50年) (3,150)	(50年) (27)	
1951年	(51年) 11,855	1,809		(51年) 13,664	(51年) (101)	17
1952年	6,554	9,264		15,922	(133)	18
1953年	6,959	16,937		24,206	(103)	10
1954年	4,803	38,992		43,852	(82)	8
1955年	2,505	60,877		64,235	(72)	1
1956年	7,685	71,205		78,990	(144)	7
1957年	11,153	95,860		107,154	(118)	9
1958年	11,297	137,461	30,000	173,901	(90)	4
1959年	26,819	123,791		150,860	(153)	10
1960年	45,649 (74,855)	136,012 (128,199)	9,800	192,228 (213,428)	(327)	20
1961年	(116,142)	(387,605)	72,425	(577,529)	(320)	25

(备注) 括弧内为根据外资法批准的数额。技术援助合同数和外汇债务投资据大藏省的调查。

主要合办公司设立件数据经济企划厅的调查。

此外均据日本中央银行的调查, 只合计一项有补充。

别是贷款投资、其次是股份投资显著增加, 技术援助也大大增加了, 在私人投资中占近一半。引进外国技术的件数, 根据外资法批准的情况看, 战后到1961年为止, 达一千六百七十件。工业部门的大企业, 几乎没有不从外国引进技术的。西德、瑞士等欧洲国家的技术援助也在增加, 但美国占绝大多数, 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值得注意的是产业机械部门的技术引进件数最多, 以下依次是收音、电视等通讯机械、有机无机化学药品、汽车等运输机械以及金属等部门。

从日本中央银行发表的材料来看, 从1958年到1962年外资引进额共达十六亿六千万美元(到1961年为十亿九千万美元, 都

不包括技术援助，股份投资只限于参加经营者)。其中，从部门来看，石油、金属、电力、运输通讯等部门引进的最多，其次是机械、政府机关等，以上各部门合计达总额的 87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机械工业、特别是化学工业部门的引进所占的位次降低了。按国别看，在上述期间，美国为参加经营而进行的股份投资占 67 %，一般贷款投资占 80 % (不包括世界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部分)，仍占绝大多数。

5. 中小企业问题和中小企业的工人运动

在占领时，美国政府完全没有把日本的中小企业放在眼里，对日本的中小企业问题也不能理解。这对美国大垄断资本的政府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美军司令部虽然制定了暂时削弱财阀的占领政策，却几乎没有制定一项积极援助中小企业的政策。不仅如此，正如道奇路线所明显表露的那样，它们还把中小企业视为完全无用的杂草一类东西，尽可能加以整顿或者放任不管。

道奇路线使中小企业受到很大打击，多数中小企业遭到整顿而破产。朝鲜战争爆发后，随着垄断资本的迅速恢复和加强，其与中小企业的差距日益扩大。于是垄断资本对中小企业和承包厂的控制迅速加强，系列化也引人注目地开始发展。中小企业工人和大企业工人的工资差别，自 1949 年道奇路线时起到 1952 年为止的期间大幅度扩大了。

而且，政府在这期间，采取了加强垄断资本的各种政策，但对中小企业的困难，占领军采取极为冷淡的态度，垄断资本除对自己有间接利益者外，也没有采取什么对策。在朝鲜战争景气消失、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自解除占领时开始，中小企业便集结力量，提出要求，对抗垄断资本和政府的声势逐渐扩大。中小企业的团结并不容易，所以这种活动没有迅速展开，虽然如此，其声势还是逐渐

增强了。依靠各种中小企业团体的活动能力，不久便制订了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法令。

举其要者，首先是“中小企业安定法”。这个法律是1952年为救济陷入十分困难境地的出口中小企业而临时制定的。这些中小企业特别是经营出口的中心工业，对垄断资本来说是获得外汇的重要产业，所以对它们的救济才被放在优先地位。1956年，根据反对百货商店迅速扩展的中小零售业的要求，又制定了“百货商店法”。虽然这项法律在内容上还不能满足中小业者的要求，但总算对百货商店的新设和扩展多少有所限制，在这一点上是值得注意的。

其次，在1957年向国会提出了“中小企业团体组织法案”。这个法案的目的是谋求中小企业的团结，改善中小企业的地位，使之能与大企业相对抗。其实这是一部分垄断资本家、中小企业团体的头子、自民党、官僚等之间的私下交易和妥协的产物，与社会党也有些关系，与当初的宣传相比，内容极为模糊。就是这样的东西，也遭到纺织协会和经团联这样的垄断资本团体的强烈反对。自民党和社会党（当时社会党和民社党尚未分裂）内部对这个法案也分为赞否两派，结果在众议院审议时，由于工会出身的社会党议员和与金融垄断资本有关的自民党议员的猛烈反对，这个法案未能通过。这项法律在删去主要部分后，于次年1958年获得通过，但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它们的期望完全落空。

关于中小企业的工人运动问题。日本中小企业的工人运动在战后被占领期间，也是极为低沉的。与其说是低沉，不如说在工人运动中实际上是处于几乎被无视的状态。在战后的工人运动中，中小企业工人在参加人数上遥遥领先，在今天工人运动很明显是以大企业的工人为中心的。

1954年6月，近江丝绸工厂发生了罢工。这家公司是名列十

大纺织公司之后的大纺织企业,在战后成了大公司,它的总经理在经营上极端独断专行,对工人坚持严酷的陈腐做法,完全无视工人的权利。工会终于提出“人权要求”,举行了罢工。对此,不仅工会组织进行了全国性的支援,而且社会舆论也对该公司违背人道的做法表示不满,强烈支持“人权罢工”。罢工经历了很长时间,总算以工会方面的胜利而结束。过去这家公司虽说是大企业,但是同中小企业大量呈现的情况有非常类似之处,而且“人权罢工”是工人方面的胜利,所以引起了处于同样情况的中小企业工人的注意,使他们受到了鼓舞,中小企业的工人到处成立工会,举行罢工。这样,近江丝绸厂的罢工,对战后日本中小企业的工人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时,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工会运动比较低沉。这是因为,大企业的工人大部分已经组织起来,加上企业增雇的工人不多,所以工会会员难以大幅度增加,加上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基本工资根本不能提高。也因为在这个时候,为了打开这种困难局面,工会开始把注意力转到组织中小企业工人和展开中小企业的工人运动方面。特别是总评从1955年起确定了在中小企业扩大运动的方针,此后中小企业的工人运动较受重视,中小企业的工人运动也多少地活跃起来了。

可是,要把中小企业的工人组织起来,在中小企业的工人中开展各种活动,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热情。另一方面,历来的大企业中心主义和以企业为单位组织工会的倾向,不容易简单地加以改变。因而,对大企业的工会真正认识中小企业工人运动的重要性并予以支援,不能寄予太大的希望。以后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今天在日本,说到底,困难再大,也只有中小企业才能开展符合工人运动的活动,而且在那里开展工会运动也最有必要。然而实际上,中小企业的工会运动并不出色,发展也不快,主要是依靠

自己的力量逐步前进。

与中小企业工人运动相关联的问题是最低工资制。关于这个问题,以往有过种种议论。我们不在这里叙述这些议论,但有一点必须说一下。这就是,正如许多人至少曾经说过的那样,最低工资制不单单对中小企业的工人是重要的,对全体工人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时对这一点的理解还比较肤浅。正是因为这样,工会在开展中小企业的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把获得最低工资制作为工人运动的一个支柱提出来。当时,先由政府 and 资本方面酝酿,然后根据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协议,于1959年制定了排除工会参与决定最低工资的似是而非的“最低工资法”。(据说适用最低工资法的工人数1961年度末约一百四十万人,1963年6月末约二百三十万人。)这一最低工资法是相当苛刻的,连政府也认为有改善的必要。工会方面认为,如不从根本上修改最低工资法,最低工资制便不能指望在最近的将来得到实现。

6. 合理化和工会

合理化活动,当时在企业内部、产业部门、进而在全产业都在进行。这是因为:第一,技术在不断进步,过去的技术已经落后,日本企业正在积极引进新的技术;第二,与此相关联,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产业和企业的改组和整顿;第三,与此相结合,自由化进展迅速。

关于合理化的涵义,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见解。特别是就其对工人的影响来说,从以上三点来看,合理化的要点,在于增加工作量与减少雇佣人员。削减人员的结果是:解雇、更换工作岗位、加强劳动强度、严格车间纪律、侵害工人的权利、增加对工会活动的压迫、削弱工会,以及在工资方面引进职务津贴等等。

当时部门和企业界合理化的明显倾向,可分为以下几类。第

一，由于采用新技术而发生的合理化，其代表者是电信电话公社，造船、摩托车等部门也可以视为属于这类情况；第二，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所引起的合理化，其代表者有人造丝、毛纺、麻纺等部门；第三，就是由于自由化而引起的合理化，铜、铅、锌、水银等有色金属矿山部门是这种情况的代表。其他，涉及第一、二、三者的有煤矿业，涉及第一、二者的有硫铵、棉纺、铁路（国营）等，涉及第一、三者，自由化比重大的有汽车、汽车零件、纸浆、钢笔等部门，此外，石油精炼、石油化学、钢铁及海运等可以说也属于这一类，或者是与此类有相似之处。当然，对工人发生影响的，除合理化以外，尚有其他许多因素。例如危机与萧条对工人的影响，在现在叙述的时期，也可以看到一些。再往后一年，即1961年9月紧缩开始后的时期，对于危机与萧条的影响，也必须予以极大的注意。

面对合理化对工人所造成的恶果，工会是怎样开展斗争的呢？就总评系统工会的情况来看，一般主要是事前协商，缩短工作时间等，具体地说，就是反对解雇、调换工作岗位、强化劳动、降低工资等，还有其它种种斗争。但是也不能否认，反对合理化的斗争往往是极为困难的斗争。

尤其是煤矿部门的问题牵涉面极广，各种因素又交叉重复，劳资双方的对立非常深刻。煤炭在战后初期被放在重新开始生产的中心地位上，受到国家周密的保护和援助，在以煤炭为中心的重点生产方式结束、道奇路线开始以后，煤矿部门便不受重视。这时，世界上以美国巨大的石油垄断资本为中心，在中东等地迅猛地扩大生产原油。世界的原油产量自1950年起到1961年为止的期间增加了约一点三倍。同时，由这些巨大石油资本组成的国际石油卡特尔，尽管内部历来有巩固的制度，仍由于生产过剩和非卡特尔成员的捣乱而难以维持，加上竞争激化，海上运输改善促使运费大幅度降低，从而后来原油的进口价格大幅度降低。这时日本经济

处于复兴时期,能源消耗大大增加,所以日本作为外国原油的重要市场,愈益引起国际石油垄断资本的极大关注。

对世界上这种形势的发展,日本与煤矿有关的垄断资本和工会,都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政府也没有制订日本独立的基本能源政策,可以说是“得过且过”地追随美国,以致对拥有三十万工人的煤矿业以及与煤矿业有关的许多部门和地区的人口,都没有采取负责的对策。因此日本的煤炭生产没有发展,其价格又高于石油,显然不适应随着经济急剧扩大而迅速增长的需要。与此同时,自由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进口限制逐渐放宽,致使石油进口惊人地增加。1951年以后石油增加的情况是,1953年比1951年增加约一倍,1956年增加约二倍,1959年增加约三倍,而1961年一举增加约八倍。在石油进口量增加八倍的十年期间,煤炭的生产量仅从四千三百万吨增加到五千四百万吨,只增加了26%。

这样,在日本全部能源供应中,石油所占的比重从1951年的8.6%大幅度上升到1961年的36.7%,而煤炭则从53.6%大幅度下降到36.7%。煤炭所占的比重,1951年为石油的六倍,而在1961年终于同石油一样了。

不仅如此。煤矿业在据有优势的石油猛烈攻击面前,已不能继续维持过去的状态。为了重建煤炭工业,政府和垄断资本遂在1959年制订了合理化计划。根据计划,决定:(一)为与石油相对抗,到1963年煤炭价格每吨降低一千二百日元;(二)关闭效率低的炭坑,加强效率高的炭坑(即所谓的scrap and build),国家向效率高的炭坑投放资金;(三)在已经减到二十六万的矿工中,再解雇十一万人。这样的合理化,势必迫使工人起来进行激烈的斗争。但是,煤矿业非但未能重建,而且由于原油进口的急剧增加和重柴油价格的进一步降低,煤矿业陷入了更加深刻的困境,这就需要制订进一步的对策。

世界上出现了日益显著的石油胜过煤炭的倾向，其中日本的煤炭工业危机特别深刻，这主要是由于大量使用低工资劳动者的落后生产结构，煤矿垄断资本对石油的攻势完全采取放任态度，政府对煤矿工人的斗争只要不过分激烈，便加以敷衍，最后，总是使工人承受最大的牺牲。所有这些，都是日本垄断资本对美从属姿态的表现。

在这种形势下，三井矿山公司所属的三池煤矿，时刻孕育着爆发劳资冲突的严重危机。三池不仅是日本最大的煤矿，而且那里的劳资对立在战后已经持续了很久，相当尖锐。这个矿的工会最强，最有斗争力量。针对这种情况，三井矿山的资本曾考虑一举彻底解雇工会的活动家，以削弱这个工会的力量，进行合理化。于是，工会方面组织全国性的支援，资本方面包括三井集团在内的整个垄断资本，则都支援三井矿山，呈现出垄断资本要同工人阶级进行一场大规模决战的姿态。

从1959年初通知解雇六千名工人开始，公司方面逐渐加强了对工会的攻击，1960年初出现了关闭工场的情况，工会以无限期罢工进行反击，并与反对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结合起来。由于双方的冲突反复发生，对立极为深刻。在这期间，公司方面组织了第二工会，从而出现了许多工会会员分裂出去，三井矿山的三池煤矿以外的工会脱离这一斗争的事态，由于庞大的警察力量强行干预，以及暴力团的介入，还发生了工会会员被杀害的事件。最后，工人斗争失败，三池斗争也于1960年9月结束，合理化计划按照公司的方针被强制推行了。

在这以前，总评等工会对斗争的前景深为忧虑，认为这次大规模斗争如果失败，不仅日本工会运动会受到很大打击，而且工会运动也不得不全面后退。情况确实如此，三池的失败使三池工会受到很大打击，也使整个工人阶级遭受了一定的打击。但是，并

没有因此而造成整个工人运动的特大后退甚至瓦解。这是因为工人方面虽说失败了，但组织了大规模的斗争，真正发挥了它的威力。

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在斗争中工人内部发生分裂和出现了第二工会。战后发生了大规模斗争的日产汽车公司(1953年)、日本制钢公司的室兰工厂(1954年)、王子造纸公司(1958年)以及三池煤矿(1959年)等，大多数都出现了第二工会，最后是以工人失败而告终。日产汽车公司工会的分裂，使全国性组织全国汽车工会瓦解，造成了汽车工业实行低工资的局面。第二工会多数是由公司方面出钱组织的，而工会分裂，多数工人转向第二工会的根本原因还在工会方面，特别是工人运动内部的领导有问题。

7. 农业基本法及其背景

前面已经说过，农业就业人数的减少至迟是从1954年开始的，过了1955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倾向就更加明显了。从国势调查的结果来看，自1955年到1960年期间，农业人数从一千四百八十九万人减为一千三百二十二万人，减少了一百六十七万人。在1961年农业就业人数进一步减少，据农林省估计，减为一千三百零三万人。农业人口从此开始大批外流，仅1961年就达七十二万人。

由于从农村外流的庞大人力主要都是新毕业的和年轻力壮的青年男女，农业就业人口中家庭主妇和老人占的比重较高，出现了“妇女和老年化”现象，因而农业劳动力日益削弱。

由于人手不足，农村劳动工资明显高涨，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农业技术装备的改进和投资的扩大，但也产生了农地狭窄、经营分散，使资本装备和投资的效率明显减弱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农户的农业支出增加，加上来自外界的影响，农户的家庭开支也增

加了。为了弥补这种农家开支，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产品的生产，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但仅此仍嫌不足。因此，近年来农民对兼业收入或非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逐年提高。即使这样，农户的收入与产业工人相比，一般地说还是低的。所以农业人口向其他产业流动的情况进一步增加。

农业人手不足，导致了投资和开支的增加，而分散的小农户仅仅依靠农业来筹措资金是越来越不可能了。因此，完全依靠农业的农户，其经营的最小规模一直在扩大，1955年是一点五町（日本面积单位，合一公顷），到1960年提高到二町（摘自《经济讲座》1963年3月号所载小池基之论文《所谓高速度增长的农业》）。据统计，耕地规模为二至五町的农户数量在显著增加，其它规模者在减少或处于停滞状态，总的看来，经营规模扩大的农户是少数，而缩小的农户是多数。特别是规模未满足三反（日本面积单位，合零点三公顷）的农户正在显著减少。脱离农业的农户，90%是耕地不到五反的零散的兼业农户。零散的兼业农户脱离农业的趋于增加，但数量还是比较小的。因而，兼业农户很少放弃土地，尽管农业人口和农村就业人数大幅度减少，农地集中的趋势在当时还是进展极慢。

如上所述，农业愈来愈被其他迅速发展起来的产业所抛弃。其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这些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大幅度增加和工资的提高，加强了农业人口外流的倾向，使农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情况既缓和了战后特别突出的农村人口过剩问题，也给农业带来了相当坏的影响。而自由化问题，又给农业造成了新的困难。

这样，农业受到来自外部的极大影响，根基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农业的自立性？具体地说，如何防止农业和其他产业收入的差别扩大并缩小这种差别？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课题。作

为这一问题的基础对策,在1961年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其根本点在于改善农业的经营结构。要改善经营结构,就必须扩大经营规模,而现在农地这样狭窄,即使是目前尚能自立经营的农户,有很多不久就不可能继续自立经营。于是采用了农业经营协同化^①的办法来扩大经营规模,确保自立经营的体制。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般地说是不能实现的,即使有一小部分能够实现,困难也不小。另一方面,在农村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即其他产业的垄断资本积极向农村扩张,直接掌握农业,大量采购加工用农产品。加上今后预定要实行的农产品自由化的影响,日本农业面临着既紧迫而又不容易解决的几个问题。

8. 过量的设备投资和外汇危机的重新出现

如上所述,日本政府害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日本向第八条国过渡,千方百计要求该组织推迟提出这一劝告,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因日本的国际收支开始恶化,暂不提出这一劝告。

但是,自由化计划提前实行,结果是对企业加速采取自由化的对策。由于上年夏季以来“倍增热”带来的景气上升,多数企业获得了莫大的利润。尤其是在电机工业、汽车工业垄断资本以及与电子工业、摩托车有关的新兴资本中,有数家的利润率(资本金对利润的比率)年率竟达100%到170%。在石油冶炼部门,美国系统富有实力的公司的利润率也有超过120%的。在这些公司中,有好几家的一年利润总额超过一百亿日元。

设备投资也是以1959年据首位的机械工业(包括电机和汽车等部门)为首,其后以石油化学工业及钢铁业、合成纤维工业等为主力,以猛烈的势头增加着(参看第13表)。这样的投资热,在

^① 农业协同化即要求农民普遍加入“农业协同组合”。参看第90页译注。——译者。

第 13 表 设备投资的增加和主要部门在设备投资增加中所占的比率

(a) 民间设备投资实际增加额					
	1956年	1957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499亿日元	330亿日元	500亿日元	896亿日元	832亿日元

(b) 主要部门在民间设备投资增加额中所占的比率					
	化学15%	钢铁21%	机械20%	机械23%	机械22%
	纺织 14	化学 20	钢铁 19	化学 16	化学 19
	电力 12	机械 18	化学 17	钢铁 12	钢铁 9
	机械 12	电力 18	纺织 6	电力 11	纺织 4
	钢铁 8	纺织(-)13	电力 2	纺织 4	电力 3

(备考) (a)和(b)根据个别调查的资料。

(a)根据1961年度《国民收入白皮书》中的资料计算，价格为1955年度的价格。

(b)根据日本开发银行资料计算。

1961年上半年曾一度有所减低。但是乐观的增长气氛，加上对自由化逼近的危机感。这两种因素的混合，又导致了爆炸性的设备投资热。于是景气明显地出现了过热状态。

1961年民间设备投资比上年增加约38%，约达三万九千亿美元，收入倍增计划第一年的设备投资额与第十年的最后投资目标几乎相等(实际金额相当于第一年的96%)。随着设备投资的激增，机械的进口和与扩大的设备相应的原材料的进口，也急剧增加。这年的进口约增加十三亿美元，贸易收支一下子出现十五亿美元的逆差，6月份的外汇储备曾超过二十亿美元，年末则减少到十四亿美元。

1961年内消费物价上涨近一成。另一方面，同年4月实行自由化的棉花和羊毛以及接近实行自由化的石油制品等(包括棉制品、毛纺织品、重柴油、汽油)多数商品陷入生产过剩，价格开始

下跌。其中特别是与纤维、石油有关的商品，受自由化的影响，价格暴跌。

实行收入倍增计划的第一年度，以上述设备投资为首，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规模和其他各种重要方面，与实际情况都有很大出入。同时，消费物价也大幅度上涨。制订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之一，是在避免景气过热和国际收支出现赤字的限度内，尽可能实现较大而稳定的增长。但是，计划的头一年很快便出现了景气过热和国际收支的大量赤字。因此，收入倍增计划的原来目的，在最初的一年就打乱了。

为了抑制景气过热和压缩投资，摆脱外汇危机，政府开始加紧紧缩金融，限制进口，景气从1961年9月起进入了所谓调整时期。在生产设备大规模扩大的情况下，经济危机开始了。

* * *

为寻求一个“排泄口”来排泄由于大幅度扩大生产能力而造成的生产过剩，乃强行增加出口。这样一来，国内的生产过剩和外汇危机总算得到克服，危机也到了底。所以在1962年10月取消了紧缩政策，景气开始缓慢回升。

1962年以后，日本经济进入了“转换时期”，这一流行语在“经济白皮书”中也沿用了。所谓“转换时期”是指，以猛烈增加的设备投资为主导的经济扩张时期已经告一段落，此后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将是个人消费和政府开支，这从景气循环上说是转折性的变化，故名之曰“转换时期”。对于今后的经济增长率是否降低，说法不一，但一般认为多少要有所降低。尽管如此，与美国和英国相比，日本经济仍然显示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但是，过去数年的高速增长如果持续下去，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危险，而且由于实行自由化、加入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以及美国保卫美元这些来自外部的影响，爆发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更大。不过，从

1962年以来到目前为止，日本经济的变化经历的时间毕竟还很短，要对其作出正确的考察和判断，我认为为时过早。因此，我的这本战后日本经济史，写到1961年秋经济危机发生，只好暂时打住。现在回过头来，再概括地补述一下战后十六年间的日本经济情况。

九、战后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和劳动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问题〔1〕

1. 战后重建和发展的基本原因

战后日本经济走过了前述道路，从战争结束后的悲惨状态发展到现在实行贸易和外汇自由化的地步。下面，让我们离开各个时期的具体变化，就整个战后时期的发展来谈几个重要问题。

整个战后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更正确地说，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重建和发展的基础不是别的，而是资本与劳动的基本关系及其发展。资本因战争的灾祸和失败而遭到惨重的打击。但是在战争结束后的时期，在基本的资本即生产手段中特别重要的部分民间设备资本，按现在的价格估计保留下来的约达四万五千亿日元，与此相反，工人在战争结束后的时期，经过大量解雇，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1946年时，勉强得到就业的只有一千万人。

在战争结束时的异常困难和混乱中，不得不从接近于停止的状态重新起步的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到1961年估计已拥有近十五万亿日元的民间设备资本，工人数目约达二千三百万人，十五年间民间设备资本估计增加近二倍半，工人数目增加了一点二倍（参看第15表、第17表）。

资本的如此扩大，应当说主要是日本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劳动的产物，而资本的扩大或资本积累，反过来又带来了工人数量的增加。但是，在较短期间使资本大幅度地扩大，工人数量增加，这里有各种因素和条件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和条件，主要有：战

前、战时特别是战败以来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低工资和恶劣的劳动条件，美国的武力支持和援助，特别是改变占领政策后进行的经济援助，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投资，扩大银行信贷，通货膨胀政策，实行贸易和外汇的管理政策，保护国内产业，引进外国资本和外国技术等等。此外，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与低工资的结合，外国的贷款特别是外汇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政府和民间的贷款，也是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因素。还有，战后日本的军费负担虽说也有一些，但没有成为发展经济的障碍。（军事费用在一般会计支出中所占的比率，1934—1936年平均为45.5%，1960年为9.5%，同年美国为59.6%，英国为32.3%。）

朝鲜战争时的美军特需，虽说是偶然的机遇，但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却发挥了最突出的作用。此外，战后以来特别是从1954年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回升，也加速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最近时期的收入倍增计划和自由化，对于经济发展无疑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但是另一方面，它在日本经济内部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极大的矛盾。

整个日本每年新创造出来的全部价值，可以根据经济企划厅的不准确的国民收入统计估算如下：

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即1946年的实际规模大体上相当于战前1934—1936年的三分之二。此后，特别是开展重点生产方式时期（1947、1948年）实际增长约30%，朝鲜战争时期（1950、1951、1952年）实际增长约40%，“神武景气”前后（1955、1956、1957年）实际增长约20%，“岩户景气”时期（1959、1960、1961年）实际增长约50%。结果是，现在（指1961年）的规模为1946年的三倍，超过战前1934—1936年的一倍半，按人口平均计算，大体上分别为两个

时期的二倍半和一倍。

2. 资本方面的发展

每年新创造的价值,要在资本、工人以及其他阶层之间进行分配。工人所得以外的部分都是剩余价值,其中在资本项下作为新资本追加的就是资本积累。以具体数字从日本战后的实际变化中反映这一过程,很不容易。但是,作为一种参考材料,我们可以从每年国民收入统计中举出有关法人收入总额、工人工资、其它阶层的薪俸(不包括重要经理人员的薪俸)的数字,来对比资本与工人在分配中所占的份额,观察其间发生的变化。(参看第14表)

第14表 工资、薪俸和法人收入的对比

年 度	工资、薪俸(a)	法人收入(b)	a/b
	百万日元(单位)	百万日元(单位)	倍
1934—1936年平均	5,283	1,254	3.2
	以下为十亿日元(单位)	以下为十亿日元(单位)	
1946年度	107	4	27.1
1948年度	304	51	5.0
1950年度	1,309	334	2.9
1951年度	1,714	494	2.6
1954年度	2,783	532	4.1
1956年度	3,326	939	2.6
1959年度	4,467	1,404	2.2
1960年度	5,122	1,953	1.6

(备考)根据经济企划厅《国民收入白皮书》。

战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从1950年度开始走上发展轨道后,到1960年度为止,名义工资和薪俸增加约四倍,法人收入增加约六倍,资本在分配中所占比例的增加率远远高于工人和其它阶层。除1954年紧缩时期外,法人收入与工资、薪俸相比逐年上升,特别是最近在经济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资本在分配中所占的比

例愈益扩大，而工人在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则明显地趋于缩小。即使与战前相比，工人在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也是大幅度降低，资本的收入大幅度增加。

其次，要了解资本积累的进展情况，可以看一下在资本中属于骨干部分的设备投资扩大的情况。据经济企划厅发表的实际国民支出统计，战后设备投资额实际上超过战前 1934—1936 年平均水平的是朝鲜战争中的 1951 年，从 1956 年以后才出现大幅度增加的倾向。关于战后民间设备投资扩大的情况，可参看第 15 表。

第 15 表 民间设备投资的累计额 (推算数)

年 度	民间设备投资累计额(亿日元)	指数	增长率(%)
1945年度	39,900	100	
1946年度	41,580	104	4
1947年度	43,610	109	
1948年度	46,160	116	6
1949年度	48,390	121	5
1950年度	51,100	127	5
1951年度	54,590	137	8
1952年度	58,380	146	7
1953年度	61,810	155	6
1954年度	64,110	160	4
1955年度	65,420	163	2
1956年度	71,390	178	9
1957年度	79,250	198	11
1958年度	83,390	208	5
1959年度	94,408	237	14
1960年度	111,268	282	19
1961年度	132,068	332	18

(备考) 按 1955 年国富调查时的实际价格计算。引自相原茂编《现代日本的资本积累》，第 38 页，唯 1959 年以后的增长率是作者自己计算、追加的。

表中数据是按 1955 年为基期的实际价格计算出来的。如按 1961 年的价格计算，则民间设备投资总额估计在 1945 年度为四

万五千亿日元,1961年度约达十五万亿日元。在这十六年中间,除1955年度外,不管哪一年民间设备投资都有一定的增长,1956年度“神武景气”以后急剧扩大,特别是1959、1960、1961年度的设备投资,连续三年大幅度增加。朝鲜战争时期的1951、1952年度设备投资虽然也显著扩大,但终究不能与最近三年的扩大相比。

这样猛烈地扩大设备投资,一方面确实说明资本迅速加强,并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参看第16表),但是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现在这样的资本过剩、设备能力过大。

此外,1960年工厂、企业统计调查的结果表明,相当于公司总数的0.1%、资本金在十亿日元以上的公司,它们的固定资产竟占全国公司固定资产总额的60%。大资本的设备投资所占比例之大,由此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战后日本垄断资本在道奇路线时期大致有所恢复,但走上发展轨道则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经历朝鲜景气的消失和占领的解除,卡特尔的改组和战后式的康采恩财阀及其金融系列体制的形成,日本垄断资本以1956年前后为起点,开始了战后的正式发展。从这时开始,从属于美国的日本资本主义,再次带有若干帝国主义的性质。

第16表 1955—1961年度的经济(实际)增长率

1955年度	10.3%	1959年度	17.9%
1956年度	9.0%	1960年度	13.2%
1957年度	7.9%	1961年度	14.0%
1958年度	3.2%		

(备考) 根据经济企划厅发表的数字制成。

3. 工人方面的变化

在垄断资本因日本战败和被占领而暂时陷入混乱并处于软弱

地位的时候，工人阶级相对地加强了。但是庞大的失业和半失业者仍继续存在，使垄断资本甚为不安。因进行重点生产而骤然开始增加的就业工人，由于推行道奇路线又被减少了。当朝鲜战争爆发，垄断资本又取得发展时，工人总数再次开始增加。从此以后，工人就业几乎每年都趋于增加。（参看第17表）从1951年开始到1961年，每年约增加一百万人以上，特别是1959年约增加二百万人，增幅达10%以上。

第17表 工人总数增加情况

	工人总数(万人)	指 数
1946年	1,050	100.0
1951年	1,370	130.5
1956年	1,741	165.8
1961年	2,323	221.2

（备考）根据总理府统计局《劳动力调查》的估计。

下面看一下工人中具有组织力量的工会会员，亦即有组织的工人的增减情况。战争刚结束时还没有工会，可是到1946年末，有组织的工人已达约五百万人，到1948年又有增加。但是从1949年以后，由于道奇路线制造了大量失业工人，而占领军当局及其追随者资本家对工会又进行残酷的压迫，以及工会内部出现混乱等原因，到1951年工人约减少一百万人。以后虽然又重新增加，可是从1950年、特别是1956年以来，工人总数增加的趋势已迅速减缓，有组织的工人从1949年到1961年的十二年间，只增加一百五十万人，增幅仅为四分之一；而没有组织的工人在这期间却增加了一千万人，约为原来的二倍。这样，当时有组织的工人为八百十五万人。此外，实际上还有约一千五百万属于中小企业和零散行业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

工人参加组织的比率，战后最高的1948年为55.7%，此后连

续降低,1960年为34.1%。由于中小企业增设了工会,1961年工人参加工会的比率增加到34.5%。随着大企业雇佣工人的急剧增加,大企业的工会会员数自然也大量增加。(参看第18表)

第18表 有组织工人数增减情况

	工会会员数(千人)	参加组织的比率(%)
1946年	4,930	46.8
1948年	6,677	54.3
1949年	6,655	55.7
1951年	5,687	42.6
1955年	6,169	39.1
1960年	7,516	34.1
1961年	8,154	34.5

(备考) 据劳动省调查。

从1951年起,大企业采取极力避免雇用新工人的方针,所以在工人总数中,大企业的常雇工人数几乎没有增加,有时还有所减少。在劳动力不足时,便加强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再不足时,便尽可能雇用临时工来弥补,或者是采取向承包厂增加订货的方法来解决。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958年。这期间主要是中小企业增加工人。但是1959年后,大企业的常雇工人数显著增加,这是因为大企业积极扩大生产,尤其是需要人力的机械工业、建筑业、商业等部门,雇佣规模显著扩大,甚至发生临时工人不足和雇佣困难的情况。在这时期,中小企业的工人也和大企业的工人同样增加。但是工人不满三十人的小企业或零散行业,工人增加的势头不大。

另外,青年工人所占比率最近有所增加,特别明显的是女工剧增。自1950年到1960年十年间,女工由三百五十万人增加到七百一十万人,几乎增加了一倍。这期间男工也增加了约六成,但女工的增加率比男工高得多。女工的增加数相当于全体工人增加数

的37%，女工总数已占全体工人的30%，这是因为女工工资比男工低。最近又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即第三次产业如商业、金融业等的就业率降低，而第二次产业如工业、建筑业等的就业率大幅度上升。工业部门女工的就业方向，由纺织工业逐渐向机械工业、特别是电机工业（尤其是电视、收音机、半导体等行业）转移。这种趋向的出现，是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也有弥补男子青年工人不足的原因。

战后日本工人数量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增加，不仅有上述结构变化的原因，而且还有其他必须研究的各种原因，必须逐一加以研究，否则就不能正确评价与资本相对抗的工人力量。

4. 产业结构的变化

资本的发展和扩大对工人有各种各样的影响，但在这里我们主要是研究它们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自1950年到1960年的十年间，各个产业部门国民收入的增加情况是（经济企划厅发表的估计额）：金融不动产业增加的比率最高（名义额），为七点三倍，其次建筑业为四倍，运输电讯及其他公益事业为三点七倍，制造业为三点四倍，批发零售业为二点五倍，服务业为二点二倍等，矿业是一倍，农业只有零点八倍。从各产业的增长率及其收入的规模看，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业、运输电讯及其他公益事业等是主要的发展产业，而矿业尤其是农业，则是相当停滞的部门。农业部门的实际收入十年间只增加了三到四成。实际国民收入总额，根据经济企划厅经济研究所发表的材料来看，自1946年到1961年十五年间增加约三点六倍，从1951年到1961年的十年间，增加约一点五倍。

如上所述，不同产业部门的收入增加额各有差异。用收入额来看产业构成，则1946年以后的变化如第19表所示。即农业或第

一次产业的地位显著下降，制造业及建筑业等第二次产业的地位则明显上升。第三次产业也有相当的上升，可以看出，其中金融业的地位是大幅度上升了。

第 19 表 各产业的国民收入构成比例的变化(%)

	第一次产业		第二次产业		第三次产业			合 计
	农业	小计	制造业	小计	批 发 零售业	金融不 动产业	小计	
1946年	31.1	38.8	16.4	26.3	10.7	2.5	34.9	100.0
1950年	21.2	26.0	24.8	31.8	16.6	3.2	42.3	100.0
1955年	17.9	22.8	23.3	30.3	15.9	5.5	47.3	100.0
1960年	10.9	15.1	30.1	37.6	16.3	7.6	47.8	100.0

(备考) 根据经济企划厅的调查。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农业发生了极其显著的变化，农业就业人数由 1950 年的一千六百一十万人减至 1960 年的一千三百二十二万人，减少二百八十八万人。从战后农业就业人数高峰时期到 1961 年，共减少了四百多万人，农村人口的外流现象极其严重。由于这种原因，前面已经谈到，专业农户的减少和兼业农户的增加趋势特别明显，1957 年时专业户占 55%、兼业户占 45%，此后情况逆转，特别是 1961 年，这一趋势急剧发展，专业户所占比例变为 27%，兼业户占 73% (1963 年度《经济白皮书》，第 358 页)，专业农户在这十四年间减少了一半。

下面谈一下以战前为基期的战后各工业部门生产指数的变化。(参看第 20 表)从 1955 年起到 1961 年的六年间，机械工业的生产约增加五倍，石油、煤炭(主要是石油)制品工业的生产增加约二倍多。

以战前(1934—1936 年平均)为基期来看这些部门，就可以知道，和战前相比，生产增加最显著的是机械工业，它很早就恢复到战前水平，最近增加的势头尤猛，在整个工业部门的发展中居领先

第 20 表 以战前为基期的工业生产指数

(1934—1936年平均为100)

	1946年	1951年	1955年	1961年	突破战前基期的时间
制造业(综合)	26	101	160	464	1951年
钢铁	22	160	227	627	1950年
机械	50	194	287	1,741	1949年
化学	26	120	211	483	1951年
石油煤炭制品	22	150	333	1,075	1951年
纤维	13	53	89	155	1956年
食品	31	74	133	194	1953年

(备考) 上述数字是著者根据通产省发表的以 1955 年为基期的生产指数换算的。综合是十四个部门的综合。

地位，成了整个产业发展的基轴。1955 年以后资本货物和耐用消费资料生产的急剧增加，正是机械工业大幅度增加的反映。一向处于落后地位的日本产业，要想得到发展，没有机械工业部门的扩大和加强是办不到的。继机械工业之后生产大发展的是石油煤炭制品工业(增产的大部分是石油冶炼业)，其次是钢铁业。相反，纺织工业的生产到 1956 年才勉强超过战前水平，此后的发展也是微弱的。食品工业的发展虽然不象纺织工业那样慢，但发展速度也很低。整个制造业 1961 年的生产与战前相比或者同 1951 年相比，都增加三点六倍，增幅很大。

为使工业这样迅速地发展，进行了巨额的设备投资。为此借入了庞大的设备资金，特别是 1961 年以后，这种借款的增长非常突出。全国银行的设备资金贷款总额，在 1955 年以后的六年间增加了三倍多，其中制造业的设备资金贷款增加五倍多。巨额的设备资金贷款以及萧条时期的呆货贷款和周转资金贷款，都是由日本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的，这笔信贷资金的数量 1956 年 4 月还是低水平的，仅有一百六十四亿日元，而此后特别是 1960 年以后则急剧增加，到 1961 年末竟达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七亿日元。

(进入 1962 年后,日本中央银行尽管压缩信贷资金,但是信贷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大大增加,不久,终于出现了超过货币发行额的惊人现象。)在战后初期进行重点生产时,垄断资本依靠国家信贷的资助重新组织并发展了生产,此后又反复地利用了信贷,这对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克服困难起了重要作用。在所谓的高速增长时期,国家的这一机能是被充分地利用了。

十、战后经济的周期和变化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问题〔2〕

1. 景气变动及其特征

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作为连续不断的过程来看，说到底不外是资本的积累。在前一章的前半部分，已经简单地叙述了战后日本资本扩大和发展的情况。

以垄断资本为主力的整个资本的扩大或资本积累的进展，必定要引起产业的周期和景气变动，而且资本本身也要被卷进这种变动。当然，国内的景气变动，也要受海外景气变动的影响。战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怎样的景气变动，在叙述各个时期的情况时已有不同程度的论列，这里再简单地归纳如下。

资本主义固有的景气周期变动，在资本主义经济尚未大体成熟、资本的态势尚未确立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的。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初期是如此，在战后陷入极度混乱的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恢复时期也是如此。从这个观点出发，在垄断资本态势整備时期的道奇路线以前，是没有考虑景气周期变动的余地的。道奇路线本来是以所谓“安定危机”而结束的，而不是以周期性的危机结束的。危机因朝鲜战争而中断，转变为“朝鲜景气”这种特殊的回升。也就是说，这次经济回升不是平常的景气变动，而是战争这种外来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总算使战后的日本经济在道奇路线及其后的朝鲜景气期间，再次回到了产业周期（景气变动）的轨道。

从这时开始到 1961 年前后十二年间的景气周期变动，必须与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的积累以及整个垄断资本在各个时期采取的行动的特征等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详见以下两个图表。关于这个时期的景气变动，不在这里一一说明，这两个图表多少可以代替一些文字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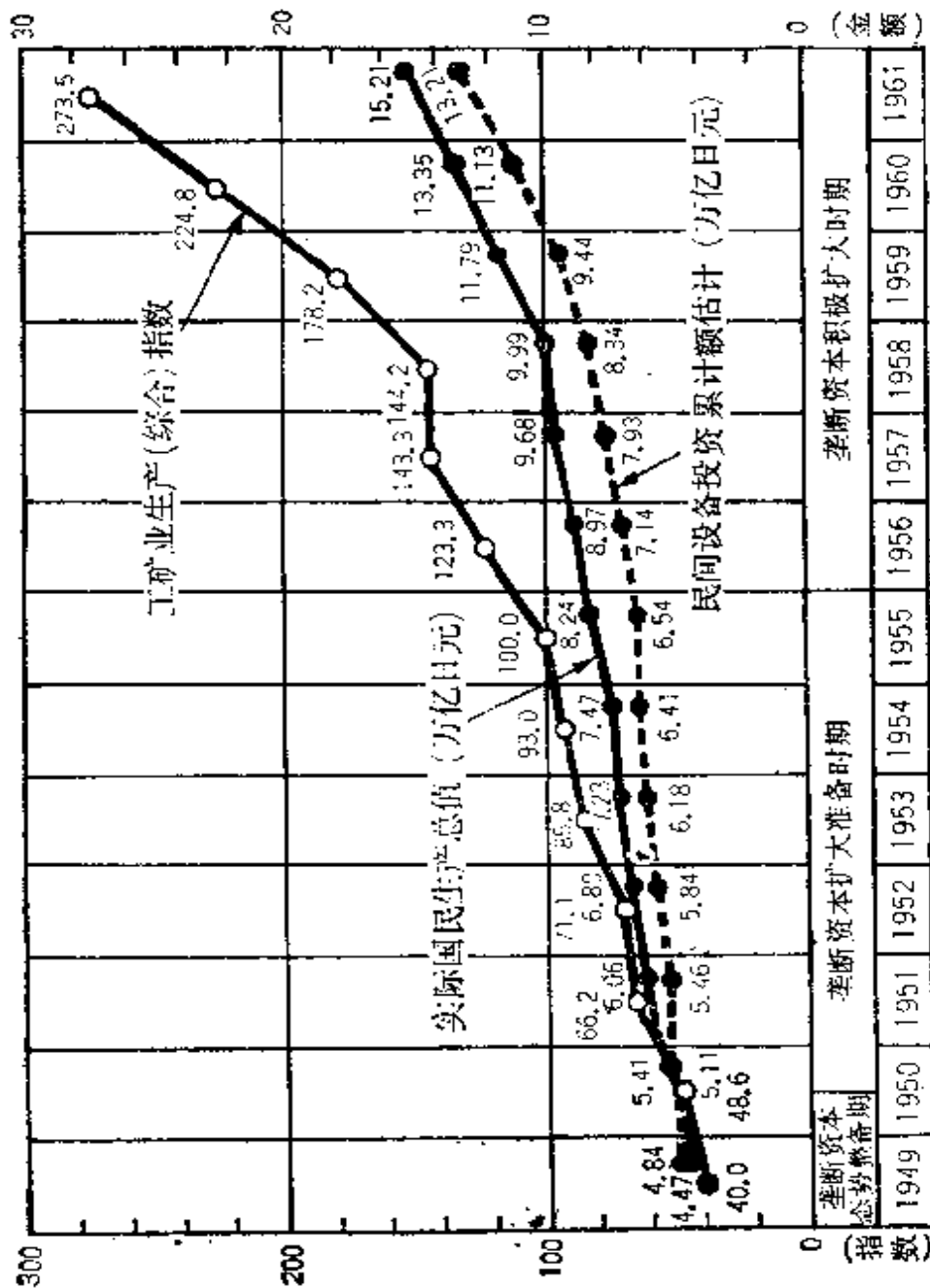
因朝鲜景气消失而开始恶化的日本经济，虽然依靠国家预算和财政投资扩大、银行信用扩大以及日本中央银行的支持，暂时仍呈活跃景象；但是由于进口增加、出口不振，在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的同时，面临外汇危机，根据美国的建议和指示，采取了紧缩政策，这些已在前面谈过。这种主要以扩大国内市场为目的并紧紧依靠国内市场的作法，很快便进一步导致进口增加和出口不振，从而外汇大量流失，产生外汇危机，不得不下决心加紧紧缩金融和压缩进口。由于实行紧缩政策，景气恶化，并出现危机，这种过程，以后又在 1957 年和 1961 年两次出现。——总之，到现在为止，战后日本出现的每次景气周期变动都呈现景气回升，恶化，然后又发生危机的形态。

在国内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从国外大量进口原材料和资本货物，大幅度扩大面向国内市场的商品生产，又接受银行的大规模信贷进一步扩大生产，总之，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进口，大幅度扩大国内市场，而出口又不能相应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危机是理所当然的。在经济增长率很高和高度依靠进口的情况下，出口如果不大幅度增加，就不可避免地要出问题。为了克服这种外汇危机，不得不于 1957 年和 1961 年求助于国外的外汇资金，从而勉强摆脱了破产的危险。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特需的作用。从下页的图表上可以看到，朝鲜战争结束后特需的规模虽然缩小，但采购还在继续，每年仍为日本带来五亿美元左右的外汇收入，它大大填补了外汇的亏空，有

资本积累、景气变动与垄断资本的动向

项目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特殊萧条	特殊萧条		萧条	萧条	萧条	萧条	危机	萧条	萧条	萧条	萧条	危机	萧条	萧条	萧条	萧条	萧条	危机	
设备投资增			●	●	●	●	●	●	●		●	●	●	●	●	●	●	●	●	●
库存投资增				●							●	●	●	●				●	●	●
建设投资增				●	●	●	●	●	●			●	●	●	●	●	●	●	●	●
财政支出增				●	●	●	●	●	●											●
银行贷款增	●		●	●	●	●	●	●	●											●
中央银行贷款增	●		●	●	●	●	●	●	●											●
输出增			●	●	●	●	●	●	●											●
输入增	●		●	●	●	●	●	●	●											●
特需			●	●	●	●	●	●	●											●
民间资金外资增				●	●	●	●	●	●											●
外国技术引进				●	●	●	●	●	●											●
美国政府援助	●		●	●	●	●	●	●	●											●
外汇储备			●	●	●	●	●	●	●											●
外汇用光							●													●
外资援助																				●



注：黑线格内中央的园点是日历年，右侧园点是会计年度。工矿业生产指数是通产省资料，1955年=100。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是经济企划厅资料，民间设备投资累计额（参老第15表）是1955年度价格。

助于日本渡过外汇危机。从广义上看，特需的外汇收入，到1961年度为止，总额已达到六十六亿美元这一惊人的金额。但是，稍有库存就用光，几乎没有储备，所以屡屡招来外汇危机。因此，如果没有长期的庞大的特需，则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将推迟很长时间。

在1954年的金融紧缩危机以后，景气的周期性变动正式发生。从此以后，危机、萧条（停滞及随后的回升）、复苏、繁荣、危机的局面便顺序出现，战后的日本也明显地出现了景气的周期变化。只是周期较短，例如“神武景气”约三年半便告结束，“岩户景气”也只经历四年多便消失了。而且在这一时期，即使景气恶化，从年平均数来看，多数商品的价格几乎没有出现真正的下跌。因此，有人根据这一点认为，这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危机，而是中间性的危机。

这几年来，当日本经济特别是工业迅速发展时，景气没有出现长时期的停滞。这是由于在金融方面，日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以提供信用或扩大信用的方法来维持景气，延缓了景气的恶化。这在今天实行管理通货制度的情况下，在某种程度上有这种可能。另外，从外国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借入外汇资金，也防止了外汇危机的悲惨结局和随之产生的危机的激化。将来的周期时间更长、景气的恶化更加严重的情况虽然不能说没有，但是从战后到现在的两个周期，应该看作是两个不同典型的周期。

2. 垄断资本的发展及其时期的划分

从战争结束时到现在这段期间，可以垄断资本为中心作如下的历史划分。

(1) 从战争结束到1947年年初的二·一总罢工。这是“垄断资本混乱时期”，垄断资本除受到战败的打击外，又遭受美国在某程度上实行削弱日本垄断资本的政策打击。

(2) 1947年和1948年。美国在这时期改变了占领政策,从削弱日本垄断资本和财阀的政策变为对它们进行扶植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强有力地进行了所谓“以煤炭为中心的重点生产方式”和以旧财阀银行为首的银行业的早期重建。如前所述,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垄断资本复活的积累时期”。

(3) 1949年初到朝鲜战争前。这是道奇路线的时期,是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赋与日本垄断资本以力量,使之重整旗鼓并接近于美国要求的时期。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垄断资本态势的整備时期”。美国出于同样的意图,对战斗的工人和工会组织进行了激烈的攻击。

(4) 从朝鲜战争爆发到1955年。这一时期发生的事件包括朝鲜战争的爆发、朝鲜景气、旧金山和约、解除占领、朝鲜停战、美日共同防卫协定、在美国的建议下执行紧缩政策等。这是日本垄断资本在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景气和特需中加速资本积累,正式开始进行设备投资和设备现代化的时期。总之,这一时期是“垄断资本扩大的准备时期”。朝鲜战争明显地加速了日本垄断资本的重建,奠定了此后发展的基础。

(5) 从1956年到1961年末。这个时期是由经济明显上升的“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等两个周期组成的。如前页图表所显示的那样,从垄断资本扩大准备时期进入这一时期后,工业生产急转弯地直线上升,从“神武”阶段过渡到“岩户”阶段,上升的幅度更大。工矿业生产(综合)指数从1949年到1955年这六年间增加了一点五倍,在其后的六年间又增加了一点七倍,超过前六年。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即所谓“经济增长率”来看,这段时间也比整个时期为高,特别是最后三年的“岩户”阶段更高。再看按固定价格计算的民间设备投资的积累额,这一时期的增长率也是很高的。工人就业的增长率也以这一时期为高。农业就业人数的减

少又增强了工人就业的势头。这一时期垄断资本的扩张活动极为活跃,资本积累急剧增强。这一时期正是“垄断资本积极扩大的时期”。

虽然是战后,但在1950年以前,亦即“垄断资本扩大的准备时期”以前的时期,日本经济中农业的比重仍是高的,其它产业的构成情况与战前的昭和初期(1930年左右)也有相似之处。就是在“垄断资本扩大的准备时期”,产业构成类似战争前夕或战时的情况也是有的。但是到了1961年以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降,而工业的地位却大幅度上升。在工业中纤维工业和食品工业等的地位显著下降,而金属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的地位则显著提高。这样,工业的发展强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工业本身的结构过渡到以机械、金属工业为中心的西欧型工业结构。

战后的垄断资本在“垄断资本扩大的准备时期”大体上确立了自己的态势之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便开始带有帝国主义的性质,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美国和西欧各国的激烈竞争。最近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了异乎寻常的扩张活动,如果这种扩张是为了对付贸易外汇自由化阶段的国际竞争而进行的,那末,自由化的正式到来对日本垄断资本的积极扩大将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可能是今后的重大问题。

3. 和战前对比

最后,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到今天的状况,与战前的情况作一简单对比。说到战前,战前也有战前的变化,到底取其中的哪一个时期,这是首先要碰到的问题。通常是以1935年来与战后对比的,有时也将对比的幅度扩展到财阀、垄断资本的统治态势加强的1930年左右。

首先,战后发生最大变化的是农业。战后的农地改革废除了

战前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这不仅给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而且对战后日本资本主义也发生了种种巨大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农地改革的基础上,加上近年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农业生产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从生产指数来看,农业生产在最近十年间增加了近五成。在这样短的期间取得大幅度增加,在战前未曾有过。与此同时,农户收入也相应地增加,比城市每户工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多15%左右(按人均收入计,农民的收入比工人多20%强)。据经济企划厅统计,1961年农村的消费水平为战前(1934—1936年平均)的174%(城市为144%)。由于农村消费水平的大幅度上升和农业的发展,农机具、肥料、农药等的使用量增加了,从而大大地扩大了工业的国内市场。

然而,如上所述,最近垄断资本的发展以及工业和建筑业的急剧扩大,已使农业人口大量流向非农业领域,农业的兼业化趋势大为加强。因而在整个产业的就业构成中,农业所占的比率明显下降,同战前对比,1930年为46.8%,1960年大幅度降为30.2%(参看第21表)。相反地,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人数所占的比重却大幅度上升,现在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已达到农业的72%,而在1930年则为农业的34%,1940年也不过是农业的51%,变化很大。从国民收入的估计来看,农业和工业的比率,1935年为一比

第21表 各个产业的就业结构(战前和战后对比)

	1930年	1960年
农 业	46.8 %	30.2 %
建 设 业	3.3 %	6.2 %
制 造 业	16.0 %	21.7 %
批发零售业	14.0 %	15.7 %
服 务 业	8.4 %	11.8 %
合计(含其他)	100.0 %	100.0 %

(备考) 根据国势调查。

一点五,而1960年则为一比三,工业的优势大大地发展了。

就工业来说,它的实际生产规模已经达到战前1935年时的三倍多,接近战时最高点的二倍。从各工业部门来看,纤维工业在1930年居压倒地位,占工业生产总值的近四成,战时和战后,地位一直下降,到1960年其产值只占工业生产总值的10%。与此相反,机械工业的比重显著上升。机械工业生产在战时也是上升的,战后曾一度下降,但最近却连续大幅度上升,超过了战争期间。今天,机械工业和金属工业占整个工业生产的近50% (1935年是20%),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参看第22表)。由于工业发达,据估计劳动生产率约为1935年的一倍。

第22表 工业部门生产的构成变化(%)

工业部门类别	1935年	1940年	1950年	1960年	1961年(概数)
金 属	17.4	20.6	16.4	19.8	19.4
机 械(含 造 船)	13.5	25.0	14.2	25.7	28.0
化学、石油、纸浆等	16.8	17.5	21.4	17.7	17.2
窑 业、土 石 业	2.6	2.5	3.3	3.5	3.4
纤 维	31.0	18.0	23.3	12.4	11.3
木 材、木 器、家 具	2.0	3.7	4.4	4.5	4.5
食 品	10.8	9.1	12.5	12.4	11.5
印 刷、出 版	2.1	1.2	3.2	2.5	2.5
其 他	3.8	2.4	1.3	2.5	2.2
合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备注) 根据《工厂统计表》(战前)、《工业统计表》(战后)制造品出厂交货额算出。

战前,比较落后的商业资本对中小企业或零散工业进行广泛的控制。所谓批发商工业指的就是这个。战时和战后,批发商的资本力量明显削弱。另一方面,由于产业在战后获得很大的发展,批发商工业即由批发商控制的工业衰落下去,由大资本、垄断资本直接控制的承包制工业以及系列企业则明显增加。这种广泛利用中小企业及其工人以吸取利润的形式,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

先例的，作为垄断资本加速资本积累的一个因素，是日本特有的。所谓“双重结构”这个用语的含义极不明确，可以在若干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里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

从垄断资本的态势来说，首先有财阀问题。战前的财阀，从财阀家族居于统治的顶点来说，多少带有旧式格局的康采恩性质，战争期间，由于股票公开，发生了某些变化，但仍是封闭性的组织。因占领军进行了所谓的“解散财阀”，财阀总公司解散，财阀家族失去了统治地位，持股公司也被消灭了，从而极端的封闭性也消失了。由于美国一度实行削弱财阀的政策，日本财阀的统治力量与战争期间相比相对地削弱，另一方面，在采取解散财阀措施期间，其他富有实力的资本却趁机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财阀的形态虽有变化，并正与欧美的金融集团和康采恩相接近，但在今天，它的统治力量和统治地位与战前相比，决没有显著削弱。而且，财阀经过重整组织，其潜力在最近又得到发挥。例如，从实付的资本金额来看，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系统各资本集团的实付资本总额，在全国公司实付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率，1960年为15.5%，这一比率比“解散财阀”前不久（1946年）的24.5%较低，但比战前和战争初期、中期都较高（1927年为10.4%，1941年为12.0%）。这些数字均引自1962年10月《经济学人》分册所载宫崎义一著《过度竞争的理论 and 现实》一书第125页）。而且上述比率自解散财阀以来是逐渐提高的。

看一下与日本一样战败的西德的情况。战前和战争期间西德企业的债务极少，并且在战后初期（1948年）通货改革时，企业充实了资本，企业对银行的债务也被果断地废除了（详情参阅三菱经济研究所著《企业的成长和收益》）。在日本，战前和战时，都是以财阀总公司为中心，主要通过持有的股份来组成财阀企业集团，对财阀以外的企业进行控制。战后由于“解散财阀”，财阀总公司被解散

了，同时，这种形式的组织和统治机构也大体上不存在了。另一方面，早从战前起，日本的银行——包括财阀系统的银行在内——同企业的关系主要不是持股关系，而是信贷关系。日本即使在战后初期进行新旧日元兑换的时候，也没有象西德那样充实企业资本和废除企业对银行的债务，而是把重点放在救济和重建陷入危机的银行上。即使在道奇路线及其后的时期，也持续地以银行为中心，主要采取通过银行提供资金的方式为产业筹措资金。由于一般银行本身的资金供应能力有限，银行又从中央银行接受巨额贷款。

日本经济进入迅速扩大时期以后，企业扩大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就是采用这种方式筹措的。因此，企业和银行一样，对来自外部的资金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与此同时，银行与产业之间的信贷关系也进一步加深。这和同样是战败国的西德在战后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同时，企业的庞大借款和对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的急剧提高，从资本内部的相互关系来看，日本和战前也有相当大的不同。

在工人方面，首先应注意的是，与战前相比，战后工人的数量急剧增加。1935年估计为一千一百多万人，而战后的1960年则倍增到约二千三百万人，增加一千一百多万人。于是工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从16%上升到25%，超过就业人口的一半。战前，在1935年，农民（农业就业者）约一千三百五十万人，比工人多25%。战后，在1960年，农民为一千三百多万人，而工人是二千三百多万人。由于农民减少而工人显著增加，不仅与战前相比比例关系逆转，而且工人数量已近于农民的二倍。

有组织的工人1935年时仅有约四十万人，到1961年已达约八百三十六万人。尽管当时工会有各种弱点，但工人总数及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的激增，特别是有组织工人的激增，肯定使工

人阶级的力量较之战前大为增强，奠定了非战前所能比拟的强大基础。而且，应当说工人阶级的基本队伍产业工人的比重大大提高了。日本的产业工人在1935年为二百六十万人，战争期间最高达近五百万人，战后远远超过了此数，增加到约八百万人。但是也必须指出，工人是急剧地增加了，而工人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率最近却比战前低了许多，这在前面已有说明。

由于战败，日本丧失了殖民地和海外势力范围，这对日本资本主义是极大的打击。它不仅失去了得自殖民地的庞大的超额利润，而且丧失了重要的原料资源和殖民地市场，失去了殖民地的低价大米和其他粮食以及工资低廉的工人对本国的供应，相应地缩小了本国的极度低米价、低工资的基础。然而，战争结束后产生的庞大过剩人口，及其流入、停留农村，是战争结束后生活水平显著降低和战后长时期保持低工资的重要原因。最近由于产业迅速扩大，需要庞大的劳动力，这一关系总算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随着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丧失而一下子崩溃的帝国主义，最近已在没有殖民地等等的情况下，渐渐变换姿态，开始复活。

另一方面，战后以美国为主的外国对日本的资本输出急剧增加，这和战前的情况大不一样。极其概略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外国的对日投资，按当时的美元价值计算不过是四亿五千万美元左右，而今天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加在一起，在1961年估计约为二十六亿美元，到1962年则进一步增加到三十亿美元。其中约八成是美国的投资。此外，在产业技术方面，日本特别明显地依赖外国，引进外国技术，战前不过二百三十一件，而战后截至1961年为止已达一千六百七十件（根据外资法批准的）。即使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美元实际价值较低的情况考虑在内，比较地说，现在日本经济规模的扩大，受外国投资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特别是美国对日投资的影响力，即使极粗略地估算，可以说至少也比战前增

加三至四倍。

在对外贸易上，进出口的市场结构有了很大变化（参看第23表）。与战前相比，美国在日本进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都大幅度上升，战前曾占日本进出口贸易半数的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所占的比重急剧地下降了。

按商品来看，金属（钢材等）、特别是机械（包括钢制船舶、汽车）在日本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纤维制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很多。在进口方面，金属矿砂（铁砂等）和废钢的进口明显增加，机械设备的进口也明显增加，引人注目。显然，这也是日本产业重工业化或者说机械金属工业的发展以及石油进口急剧增加等，在其对外贸易上的强烈的反映。

战后日本被置于美国的占领之下，日本是按照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日占领政策进行经济复兴和重建工作的，不仅在占领期间，即使在占领解除后，日本也由于直接间接的各种关系，在经济上接近美国，不仅在军事和外交上从属于美国，在经济上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和从属于美国。当然，在日本和美国之间也有经济上的对立，也有竞争，也有矛盾，但是，从根本上说，现在日本在经济上还从属于美国。战后日本经济与战前对比，这一点可算是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随着占领的解除和经济的发展，这种关系多少趋于缓和，但是，近年来，特别是从岸信介内阁在外汇危机严重时向美国政府提出修改安全保障条约时开始，随着自由化的发展，再次出现了在经济上从属于美国的强烈趋向。最近，与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的期望相反，美国加紧保卫美元，因而趋向又有所逆转，但不会有根本变化。

第 23 表 中本贸易市场和商品结构的变化

(1) 国别构成比(%)

地 区 别	出 口		进 口	
	1934—1936年 平 均	1961年	1934—1936年 平 均	1961年
亚 洲	64	37	53	26
其中中国本土	18	0.4	10	0.5
美 国	16	26	24	36
欧 洲	8	14	10	13
其 他	12	23	13	25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2) 商品构成比(%)

商品项目	出 口		商品项目	进 口	
	1934—1936年 平 均	1961年		1934—1936年 平 均	1961年
机 械 类	7.2	28.1	机 械 类	4.4	10.3
金 属 品	8.2	13.4	金属、矿砂	5.7	16.5
化 学 品	4.3	4.8	化 学 品	3.7	5.8
食 品	9.5	5.9	食 品	21.8	11.5
纤 维 品	52.0	27.3	纤维原料	31.4	16.4
有色金属矿物制品	2.9	4.0	矿物性燃料	6.8	16.0
其 它	15.9	16.5	其他原料	14.8	15.2
合 计	100.0	100.0	其 他	11.4	8.3
			合 计	100.0	100.0

(备考) 据大藏省资料算出。

十一、中文版补记

现趁本书中文版行将刊行之际，特将 1961 年后日本经济的变化情况，简单地补记如下，以供中国读者参考。

1. “岩户景气”的挫折及其对策

据日本政府计算，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的第一年即 1961 年，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实际增长率(亦称经济增长率)为 14.5%，比 1960 年 13.3% 的增长率更高了。正如白皮书中所说，这是私人设备投资在一年之内扩大 38% 所发生的巨大影响。但是，经济的急剧膨胀又迅速地成为爆发巨大矛盾的原因。这是因为景气过热势必导致进口激增(出口增长微弱)，于是国际收支恶化、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从而紧缩银根，造成了景气的恶化。按照这个公式，日本经济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在 1962 年降为 7.0%，很多产业部门陷入生产过剩，其中钢铁工业的困难最大。这是因为钢铁部门在当时过大地扩充规模，因而生产大量过剩。于是首先向美国、其次是向东南亚等地强行输出其大量过剩的产品，美国是世界上以钢铁为主的各种商品的巨大市场。此后，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攻势从未减弱。尤其是当日本国内发生经济危机时，这种情况更为突出。不仅如此，为了使钢铁工业摆脱困境，日本中央银行还通过商业银行特为这个部门的各主要公司提供巨额的救济贷款。

由于景气恶化、生产过剩，日本在 1962 年便减少进口，急剧增加出口(包括“亏本出口”)，于是国际收支好转，外汇储备也转而增加。但是景气依然停滞，许多部门持续处于生产过剩和商品价格

下跌的状态。一度呈现繁荣景象的股票市场，也爆发了过剩的危机，因而股价暴跌，证券部门的景气恶化特别深刻。

府政为使景气回升，实行了低利率政策和扩大信贷的方针，从1962年9月起连续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并且大幅度增加财政投资。1964年，乘东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机，日本中央及有关地方政府，都积极增加公共事业投资、建设东海道新干线、名神高速公路（名古屋到神户间）、首都高速公路、奥林匹克比赛设施以及与奥林匹克有关的公路建筑等。所有这些，都是摆脱危机的对策。

2. 经济危机的到来

上述各种对策，虽然使经济暂时恢复或维持下来，但回升并未真正到来，而且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后，景气反而加速地走向恶化。故从1964年3月开始，又重新采取紧缩银根的政策，到这年年中，企业破产和合并的现象又急剧增加，从1964年末到1965年初，甚至发生大型企业连续破产的问题。

股票市场价格暴跌，在1964年更加激化。政府以及金融机关虽然采取了种种对策，但是并无效果。1965年5月，东京和大阪各有一家有力量的证券公司陷入破产的边缘。如果对此置之不理，则其它许多证券公司也将被卷进来，破产的范围一定要扩大，而且一定要波及金融机关，这就势必要面临一场深刻的金融危机。为了回避这场危机，大藏省与日本中央银行遂紧急决定，由中央银行通过商业银行对上述两家证券公司提供无担保救济贷款。这样，这两家公司才免于破产，而金融和信贷危机也未爆发。

当这场危机快接近尾声时，1965年7月新上任的福田藏相采取了一系列摆脱危机的对策，其要点是：（1）发行赤字公债（1949年道奇路线以来，十六年没有发行公债）；（2）减税（主要对企业减税）；（3）增加财政投资贷款，等。这些对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使

危机很快到底，然后从当年的下半年开始，经济恢复稳定，景气逐渐回升。

从1961年到1965年间，值得注意的其他几个事件是：1961年制订了农业基本法，1964年又仿照该法制订了中小企业基本法。1964年也是日本由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十四条国变为第八条国的一年。从这年开始，如果没有IMF的承认，日本不得限制对外支付以及同外国之间的资金移动。也是在1964年里，日本加入了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叫做“发达国家俱乐部”），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员。

3. 景气再次回升与经济高速增长的重现

六十年代前半期，当经济的高速增长出现暂时的挫折时，在日本出现了一种“转变论”的主张。这种主张认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结束，从此以后要降低增长速度，同时，在经济增长中一直充当主力的设备投资，也要由私人消费和政府开支来替代了，并且认为这种“转变”乃是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必然趋势。围绕这一主张，掀起了一场争论。尽管议论很多，但从后来数年间的实际经过来看，所谓的“转变论”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

也许是福田藏相的危机对策发生了效果，到1965年底，景气出现回升的兆头，从1966年末开始，景气已明显地趋于好转，进入1968年时，真正的繁荣状态已经出现。从1966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连续五年都是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其中以1968年为最高，达14%，这个增长率与高速增长初期最繁荣阶段的1961年相同。1961年以来的七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实际翻了一番。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几乎是谁也预料不到的。

这种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直接的原因可以说主要是私人设备投资和出口贸易大量增加的结果。以私人设备投资来说，在

1965年危机时虽然比上一年下降了6%，但从第二年开始转入增加以后，连续三年（1967、1968、1969年）分别以27%、27%和22%的高速增长。这三年私人企业设备投资的实际总额为“岩户景气”三年（1960—1962年）实际总额的一倍半。

与此同时，出口贸易在1968年增长了24%后，也连续三年以21—24%的高速增长。在这以前，不论是“神武景气”（1956—1957年）还是“岩户景气”时期，都是经济繁荣时国内需求大幅度增加，而出口则反而不振；在危机和萧条时期则是国内需求不振和出口增加，出现向国外大量抛售过剩产品的情况。但是从六十年代的后半期开始，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不论经济好坏，出口都不断扩大。只有1975年和1979年这两年例外，其余年份的出口贸易大致每年都是以20%的速度持续增长（1974年的增长率是更为罕见的50%）。这是因为日本积极地发展工业，国内市场大部分已经难以继续依赖，因而不得不扩大国外市场的结果。日本的主要工业公司几乎都是从这时开始致力于出口贸易的。日本在1964年加入OECD时，便大力提倡经济“国际化”的主张，而“国际化”的真正实现则是在六十年代的末期。不仅是扩大商品出口，连资本输出或者企业本身向海外迁移，也是在六十年代后半期特别是从1968年起出现了急剧增加的趋势。进入七十年代后，这种攻势更加凌厉。资本输出虽然是对着世界的许多地区，但主要是面向东南亚各国和美国的。对于美国来说，为了避免其失业人口的增加，多数意见认为，如其让日本的商品进来，还不如让它的资本进来。但是东南亚地区，却把日本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视为“经济侵略”而加以警惕。正是因为这个缘故，1974年1月，日本的田中首相在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的首都访问时，有过亲自领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大示威的痛苦经历。

无论如何，日本在六十年代后半期，毕竟取得了远远超过其它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西德，仅次于美国而居“自由各国”的第二位。1966年以后的五年期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为12.1%，美国、西德、法国和英国则仅仅分别为3.1%、4.7%、5.8%和2.2%。

大体到六十年代后半期，随着垄断资本的急剧发展，日本经济出现了若干值得特别注意的事态。其一是大公司之间的合并现象相继出现。例如三菱重工(1964年)和新日本制铁(1970年)的成立，以及日产汽车公司与王子汽车公司的合并(1967年)等等，都是美国占领时期已经被解散的公司的复活与合并。

其二是资本的自由化问题。日本为保护国内工业，防止外国企业的竞争，对外国企业的迁入国内从来是严加限制的。尽管外国特别是美国对此表示反对，但日本政府对它们的要求多半不予批准或者长期予以搁置。然而后来，由于垄断资本的力量急剧增强，感到对于外国有力企业的迁入已不必那样恐惧，故从1967年起，逐渐采取缓和或撤消限制外资的方针。

第三是工人运动问题。垄断资本的迅速增强，对日本工人运动和工会有着强烈的影响。如下一点是资佐证。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在日本的工人运动中从来都居于主导地位，是全国性工会联合体“政府机关与公共团体工会”的主要支柱，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在主要工业部门里却增加了不属于“总评”的工会组织。1964年设立了国际五金工人联合会日本协议会(简称IMFJC，属于自由国际工人联盟系统)，日本电子机械、汽车、钢铁、造船以及其它有力部门的工会联合体都大举加入了这个组织。IMFJC是排斥政治和阶级斗争，主张劳资调和的组织，因而这个组织受到日本垄断资本的大力支持。从1967年起，可以说日本工人运动的主导力量已由“总评”转移到IMFJC了。与欧美工会组织不同，按不同企业组织起来的日本工会与资本对抗的力量本来就比较

软弱,这样一来,工会对资本的妥协立场更进一步发展了。

第四是农业问题。日本农业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遭受的打击最大的部门。在高速增长初期,日本农业便已受到种种影响,从六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它所受的打击更加深刻了。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农户数量的变化上。日本农户总数从1950年起便逐渐减少,其中专业农户数量的变化最大。1950年日本专业农户只占农户总数六百万户的50%,到1965年又减少了60%,仅占农户总数的22%。也就是说,到六十年代后半期,专业农户约为1965年农户总数的三分之二,而五年之后,即到1975年,又减为1965年的二分之一左右,在约五百万户的农民中专业农户只占12%。而且从1968年以来,尽管物价不断上升,政府收购大米的价格仍固定不变,从七十年代的前半叶开始又采取了限制大米生产的政策。由于农村的劳动力大部被工业和其它产业所吸收,为弥补人力不足,农业的机械化在这一期间也有了发展。无论如何,由于专业农户急剧减少和非专业农户在农村中所占的比例迅速增加,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同时又必须限制最主要的粮食即大米的生产。这都说明日本的农业生产实际上已处于崩溃的境地。

关于六十年代后半期日本的出口贸易以及整个经济规模得到极大发展的重要原因,还应特别指出美国在印度支那发动的战争。由于这场战争的深化和失败,美国通货膨胀急剧发展,国际收支恶化,美元危机深化,从而其经济发展停滞,出口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减弱,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下降了。与此相反,日本却由于进行了巨额的设备投资以及生产合理化和劳动强度加强等等,提高了国际竞争力,从而对美国的出口急剧地增加。特别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大量地散发了用作战费和军需的美元,日本立即瞄准这一目标,又向这个地区出口了大量的商品。日本就是这样利用美国的失策而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一时期日美两国劳动生

产率的增长悬殊很大，1965—1970年间日本平均为14.6%，而美国仅有1.7%的极低的增长。这是日本把自己置于优势地位的有力依据。

4. 高速增长的结果及向低速增长的过渡

在上述状况下，美国政府和垄断资本认为，用一美元兑换三百六十日元的固定汇率，是对日元的实际对外价值评价过低的表现，因而强烈要求日元升值。应当承认，日元汇价在某种程度上偏低，在日美贸易中是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美国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急剧增长和发展远远超过了垄断资本自己的预想。正是因为如此，日本的政府首脑和垄断资本的领导人，对日本经济增强的实力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充分的信心，因而评价较低。因此日本一直拒绝美国提出的日元升值的要求，担心日元升值将使日本降低国际竞争能力，以致减少出口和增加进口。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新经济政策”，作为美国摆脱困境的措施，其中包括完全废止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止状态的美元对黄金的兑换，实行进口征税和紧急限制进口等政策，要求其它各国改变汇率以对美元升值。此即所谓的美元冲击或尼克松冲击。因为日本政府与日本中央银行同其它各国不一样，它们一直是要求维持日元原来的汇率的，因而感到更加突然。所以日本在此次冲击中所受损害格外严重，一度陷入极其混乱的状态，以致外资大量流入（其中投机的成分很多），出口呈现停顿。在日本国内，由于流入的外资要兑换成巨额日元资金，再加上为缓和美元冲击而扩大信贷，突然间使国内的日元资金大量增加，形成了庞大的过剩游资。与此同时，田中角荣首相又提出了“列岛改造论”，采取了以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政策。于是以土地、股票以及各种商品为对象的投机活动异常猖獗，通货膨胀猛烈

发展,物价上涨的幅度急剧扩大。

然而,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到1971年下半年的美元冲击以及美国提出停止越南战争并提出预示完全失败的撤退方案为止,已经基本告终。此后的大约二年间是下一个低速增长时期到来前的中间时期。在这时期,日本经济尽管遭到上述各种内外因素的干扰,从表面上看增长率还是比较高的。

5. 石油危机与低速增长的正式到来

在1973年10月爆发第四次中东战争之际,阿拉伯石油输出国采取了大幅度限制石油供应和提高油价的“石油战略”,对多数国家是一次很大的冲击。

日本是极端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所需能源总量的90%依靠进口,其中75%是石油进口,而中东石油又占进口石油的60%。由于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极大,“石油战略”对日本的打击较其它国家为大,故称之为“石油冲击”。当时日本各种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囤积居奇的现象盛行,加上“美元冲击”以来的过剩资金仍然存在,所以尽管政府采取了紧急对策,而物价仍然疯狂地上涨,这在日本被称为“狂乱物价”。1974年批发物价指数上升31.3%,零售物价指数上升24.3%,每小时的工资指数上升31.6%,月工资额平均增长26.2%,各种指数都大幅度地上升了,特别是物价和工资的上漲率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是最高的。

因此,在“石油冲击”的袭击下,日本一度陷入极大的混乱。对于这种经济混乱和通货膨胀猛烈发展的局面,日本政府除按不同物资采取紧急措施外,还从财政和金融方面采取了被称为“抑制总需求”的政策,对私人设备投资和建筑投资采取了压缩的措施。于是暴涨的物价逐渐有所缓和,过去一度急剧增加的进口贸易也

从1974年年中开始转变为大幅度增加出口,因而国际收支也趋于改善。经济状况如此混乱,银根稍加收缩,其危机势必深化。正是由于经济混乱和相继而来的深刻危机,1974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1.3%,后来政府修改为下降0.5%。不论怎样,在这一年,日本经济出现了战败以来第一次而且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负数增长。

为摆脱这场深刻的危机,日本政府连续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如增加公共投资的财政开支和财政贷款,减税,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等财政、金融以及其它种种“危机对策”。在垄断资本方面,除进行企业的生产合理化外,还采取了裁减工人、临时解雇、加强劳动强度以及废除经营成绩不好和效率不高的部门等新的调整经营的对策,这在日本被称为“减量经营”。这种“减量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所以进入1976年后,出口贸易便由上年的停滞状态转为大幅度地增加(从这年开始到1980年为止,不包括1979年,每年都是以20%至27%的速度增长),一度下降的私人消费也有所恢复。因而景气回升,1976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5%。

在石油方面,也不是石油危机初期所畏惧的那样供应不足。实际上,在日本几乎没有发生石油不足的问题。相反地,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发生,石油与其它许多初级产品和原料一样,一时都陷于过剩状态。因此,极其缺乏石油等资源的日本才不致陷入深刻的困境和危机当中。

在爆发石油危机的当时,多数人认为此次日本要遭到最大的打击从而陷入深刻的困境。但实际上日本却较早地从石油冲击的混乱中恢复过来,并度过了所谓的第一次石油危机。

进入1978年前后,原油价格又有提高,特别是1978年12月伊朗事变以后,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的石油价格一再提高。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油价涨幅约为1980年初期的

一倍。此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的影响虽说也很大，但日本并未因此而发生混乱，没有遭受多大的打击。在这期间，日本经济的增长率持续为5%，仅有极小的变化。但是，从1980年下半年起，经济的增长略有疲弱的倾向。

不管怎么说，当前日本经济确实是降低了增长的速度。日本经济于1975年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混乱中恢复过来以后，历年的增长率确实都多少高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其增长的幅度也仅止于5—6%而已，与“美元冲击”前的高速增长时期相比下降了一半以上。毫无疑问，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低速增长时期。

日本经济虽然度过了石油危机，但是日本政府为弥补度过此次危机所增加的财政开支和补充税收的不足，连续发行了大量的国债。结果是财政开支的三分之一以上要用国债来弥补，这是一种多么不健全的状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物价必将猛烈上涨，因而改革赤字财政，使国家的财政恢复正常，成为当前的重大问题。

此外，大幅度增加出口，是近年来经济增长赖以维持的重要支柱，但是最近时期，增加出口已经成为与对方国家不断发生纠纷——所谓多发性的“贸易磨擦”——的原因。这也是最大的后遗症之一。

6. 日本经济地位的上升与贸易磨擦

日本经济变为低速增长已如上述。但是日本经济不论在高速增长时期还是在低速增长时期，它的增长率都高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也是事实。日本经济从刚刚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的1960年到进入低速增长时期的1979年的十九年间，国民生产总值（表示一国经济规模的指标）增长了三点六倍，仅次于日本的法国增长了一点三四倍；以下是西德增长了一点零五倍，美国增长零点

九六倍,英国增长零点五七倍。故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最快,从1960年到1980年的二十年间,日本经济增长了三点八六倍,接近于四倍,年平均增长率为8.2%,其它主要各国都在5%以下。

其结果是日本在所谓自由各国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在1960年约为3%,到1970年则为8%,而1979年又进一步上升到约占10%。以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美国相比,在1960年约为美国的9%,1970年约为20%,而1979年则约为43%,两者的差距已大大缩小。随着这个变化的发生,人均国民收入的差距也大为缩小,例如1978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美国的78%,占美国的四分之三。这些数字表明,在近二十年间,日本经济在国际间的地位显著上升,日美两国经济规模的差距也明显地缩小。日本经济除增长率较高以外,在失业率方面也较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低(1980年日本平均失业率为2%,西德为3.8%,美国为7.1%)。

日本经济在此期间取得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首先应该举出的是发生在近邻的越南战争,它与高速增长时期前夜的朝鲜战争一样,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时美国不惜一切地向越南派遣大军,结果是一败涂地。这场战争使美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使其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都相对地下降了。而日本却在此时利用战争和美国的过错,赚了一笔大钱,从而得以实现大幅度的经济增长和经济上相对地位的显著提高。

当然,日本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除偶然的国外原因外,还有其他若干主要原因,这就是日本的劳资关系对垄断资本极其有利。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在日本不仅劳动条件对资本家有利,工资水平特别与美国相比也差距很大。垄断资本还广泛地利用中小企业承受种种形式的负担,利用农业为扩大生产和

流通部门提供庞大的劳动力来源。从经济增长和无限制地扩大利润的需要看,日本的国内市场显得比较狭窄,于是广泛地打入国外市场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了。垄断资本之间在国内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在国际市场上,这种竞争更为激烈。因此,为加强国际竞争力,垄断资本便在生产和经营上严格实行合理化,努力降低成本,竞相采用新技术和进行技术改良,以致日本引进外国技术之多在世界上居于首位。此外,与经济力量相比,日本的军费负担也较其它主要国家为轻。所有这些,都对日本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从日本经济增长的最大支柱之一的扩大出口来看,在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的1960年,日本的出口贸易在所谓自由各国的出口总额中只占3.6%,受美元冲击的1971年约占7.6%,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的1975年降为7%,到1978年重新上升为8.2%。

由于日本在世界出口中所占比率的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与各国之间便发生了“贸易磨擦”,特别是与美国之间的磨擦最为严重。

战后初期,随着美国对日占领的结束,日本与美国缔结了安全保障条约,这个条约使日本在军事上迄今一直从属于美国。与此相联系的是,日本在外交和政治上也采取了从属美国的立场。从经济上说,除接受上述各种影响之外,在资本关系、出口市场关系、重要物资的进口依赖关系、国际金融关系等经济方面的关系上,也都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从属美国的地位。但是由于日本经济力量的显著增长,其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从属性,不用说与五十年代相比,即与六十年代的前半期相比,也已大大减弱。在其它方面多少也还能够看到日本对美国的从属性影响。可是,不论这种影响还剩有多少,由于日本经济地位的相对上升和日本商品对美国出口的激增,两国之间的贸易磨擦和经济矛盾还是不可避免的。

在日美两国间,实际上从日本高速增长初期(1960年)开始,

便已发生日本限制从美国进口、美国限制从日本进口的以限制和反限制为中心的斗争。日本政府为保护和扶植国内工业生产，比贸易自由化更重视推迟资本的自由化，对一部分美国大企业进入国内坚决采取阻止或推迟的政策，于是引起了两国间的激烈对立。越南战争时期，日美经济矛盾激化的一个例子，便是1970年日本化纤制品对美国出口激增所引起的“日美纺织品战”。两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曾一度陷于破裂，到1972年，由于日本方面的让步，谈判才终于达成妥协。同一时期，日本对美国的钢铁出口也受到了限制。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两国间的贸易磨擦进一步扩大，经济矛盾不断深化，例如1977年美国限制日本彩色电视机进口和1978年限制钢铁进口等，就是明证。

但是，日美间的最大贸易磨擦还是日本汽车的对美国出口问题。日本汽车的出口数量从1974年开始已居于世界首位。1980年日本汽车的生产数量为一千一百零四万辆，其中出口占54%，为五百九十六万辆，而对美国出口为二百四十万辆。在美国市场上，日本汽车占汽车销售总数的21%。汽车工业被视为“战略工业”，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特别是美国现在与汽车有关的生产部门的失业人数达八十万或者在此数以上；另一方面，日本汽车工业占制造业生产总额的10%以上，而在出口总额中占21%。正是因为这样，双方对立极其严峻，但结局还是以日本作出一定让步而取得妥协。

可以预计，日美间今后的贸易磨擦还要加剧，此外，日本与欧洲共同体各国间的贸易磨擦也要不断激化。由于最近日本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靠增加出口，因而如此激化的贸易磨擦以及各国扩大对日本的进口限制，对日本经济来说是极其重大的问题。

附 录

统 计 表

(附有 * 记号的准确程度稍低)

- | | |
|--------------------------|--------------------------|
| 1. 工业生产 | 9. 国民收入估计 |
| (1) 工业统计 | (1) 名义收入* |
| (2) 生产指数* | (2) 实际收入指数* |
| 2. 农业生产 | (3) 实际收入与上年的比较* |
| (1) 大米估计实收量 | 10. 设备投资额估计* |
| (2) 纯农业生产指数* | 11. 工资(名义,制造业)* |
| (3) 农家总户数 | 12. 就业人数及按产业的构成 |
| 3. 对外贸易 | 13. 工人数及有组织的工人数 |
| (1) 对外贸易额 | (1) 工人数* |
| (2) 贸易数量指数* | (2) 有组织的工人数 |
| 4. 外汇储备额 | (3) 估计组织率 |
| 5. 财政规模 | 14. 占领期间美国对日援助进口
实绩* |
| 6. 全国银行的存款、贷款额 | 15. 特需 |
| 7. 中央银行券发行量和中央
银行的贷款额 | (1) 特需合同额 |
| 8. 物价指数 | (2) 广义特需的外汇收入 |
| (1) 批发物价指数 | (3) 广义特需外汇收入占外
汇总额的比率 |
| (2) 消费者物价指数(东京) | 16. 引进外资的批准状况 |

1. 工业生产

单 位 或 基 期	(1) 工业统计			(2) 生产指数			
	工厂、 企业数	从业 人员	制造品出厂 交货额等	产业	综 合	制造业	综 合
		1,000人	百万日元	1960年 平均 基准	1934—1936 年平均 基 准	1960年 平均 基准	1934—1936 年平均 基 准
1934—1936 年平均	84,305	2,625	10,897	29.0	100.0	28.6	100.0
1945年	57,380	2,210	43,966	20.5	70.7	19.6	68.5
1946年	84,393	3,321	84,266	9.1	31.4	7.4	25.9
1947年	108,340	3,583	288,108	11.8	40.7	9.2	32.2
1948年	100,286	3,677	825,072	14.7	50.7	12.3	43.0
1949年	108,731	3,365	1,442,329	19.0	65.5	16.3	57.0
1950年	156,173	3,860	2,294,109	23.0	79.3	20.4	71.3
1951年	166,347	4,237	4,027,909	31.4	108.3	28.8	100.7
1952年	168,059	4,365	4,616,107	33.7	116.2	31.1	108.7
1953年	172,561	4,638	5,708,235	40.7	140.2	38.5	134.6
1954年	184,432	4,737	6,053,989	44.1	152.1	42.2	147.6
1955年	187,101	4,938	6,561,887	47.4	163.5	45.7	159.8
1956年	195,566	5,566	8,473,910	58.4	201.4	56.4	197.2
1957年	215,015	6,042	10,226,378	67.9	234.1	66.9	233.9
1958年	212,725	6,112	9,880,928	67.0	231.0	65.7	229.7
1959年	216,417	6,750	11,888,785	80.3	276.9	79.6	278.3
1960年	238,320	7,662	15,293,704	100.0	344.8	100.0	349.7
1961年	*244,648	*8,193	*18,732,923	119.3	411.4	119.9	419.2
1962年	不详	不详	不详	129.1	445.2	130.1	454.9

资料来源：(1) 工业统计，战争期间根据“工厂统计表”，战后根据“工业统计表”。

(2) 生产指数是链指数，根据通产省“通产统计”。

注：工业统计1947年以前是按有职工五人以上的工厂计算的，1948年以后是按有从业人员四人以上的工厂、企业计算的。

带有*记号的1961年数字，是根据发表的概数。生产指数1934—1936年的平均部分是依据以1940年为基期的指数由著者简单换算的。

2. 农业生产

单位或基期	(1) 大米估算实收量	(2) 纯农业生产指数		(3) 农业总户数
	千 石	1950—1952 年平均	1933—1935 年平均	千 户
1933—1935 年平均	60,042		100.0	5,603
1945年	39,149		59.7	5,830
1946年	61,386		77.3	5,698
1947年	58,652		74.7	5,909
1948年	66,439		86.0	—
1949年	62,553		92.5	6,247
1950年	64,339	94.7	98.9	6,176
1951年	60,278	97.5	99.2	6,099
1952年	66,152	107.8	112.2	—
1953年	54,942	93.4	97.6	6,142
1954年	60,756	102.9		6,105
1955年	82,565	124.5		6,043
1956年	72,658	117.4		—
1957年	76,418	122.1		—
1958年	82,461	127.2		—
1959年	83,340	130.6		—
1960年	85,720	133.3		6,057
1961年	82,774	134.6		—
1962年	86,727	137.2		(5,875)

资料来源：“农林省统计表”。

注：农户总数1962年的()内数字是根据“1962年农业调查”的数字。

3. 对外贸易

单 位 或 基 期	(1)对外贸易额		(2)贸易数量指数	
	出 口	进 口	出 口	进 口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1934—1936年平均	1934—1936年平均
1934—1936年平均	715	710	100.0	100.0
1945年	91	224	—	—
1946年	103	306	—	—
1947年	174	526	—	—
1948年	258	684	7.5	17.8
1949年	510	905	16.1	28.0
1950年	820	974	32.1	37.0
1951年	1,355	1,995	35.8	55.3
1952年	1,273	2,028	38.0	60.9
1953年	1,275	2,410	41.2	82.7
1954年	1,275	2,309	54.9	85.7
1955年	2,011	2,471	71.6	90.1
1956年	2,501	3,230	85.6	114.4
1957年	2,858	4,284	95.3	142.6
1958年	2,877	3,033	98.7	117.3
1959年	3,456	3,599	117.2	148.0
1960年	4,055	4,491	133.4	186.4
1961年	4,236	5,810	143.4	243.5
1962年	4,916	5,637	170.6	240.5

资料来源：大藏省关税局“对外贸易概况”。

4. 外汇储备额 (单位百万美元)

黄金和外汇		黄金和外汇	
1937年	*387	1955年	738
1945年	(119)	1956年	941
1946年	(1)	1957年	527
1947年	(2)	1958年	861
1948年	(3)	1959年	1,322
1949年	*225	1960年	1,824
1950年	*564	1961年	1,486
1951年	*924	1962年	1,841
1952年	930		
1953年	913		
1954年	637		

资料来源：根据大藏省调查。

注：有 * 记号者和 1952 年以后的计算方法不同。

() 内只是黄金储备额，但不包括美军接收的黄金。

5. 财政规模

单 位	岁 入			岁 出		
	一般会计	其中租税、 印花税收入及其比率		一般会计	其中军费及其比率	
	亿日元	亿日元	%	亿日元	亿日元	%
1934—1936 年平均	23	10	43.4	22	10	45.4
1945年	235	103	44.7	215	—	—
1946年	1,189	301	25.3	1,152	—	—
1947年	2,145	1,473	68.8	2,058	—	—
1948年	5,030	3,458	68.1	4,520	—	—
1949年	7,586	5,182	68.3	6,991	—	—
1950年	7,168	4,564	63.7	6,333	132	2.1
1951年	8,955	6,040	67.4	7,498	214	2.9
1952年	10,788	7,085	65.7	8,739	1,017	11.6

续表

单 位	岁 入			岁 出		
	一般会计	其中租税、 印花税收及其比率		一般会计	其中军费及其比率	
	亿日元	亿日元	%	亿日元	亿日元	%
1953年	12,190	7,828	64.2	10,172	1,551	15.2
1954年	11,851	7,984	67.4	10,408	1,547	14.9
1955年	11,264	7,960	70.7	10,182	1,360	13.4
1956年	12,325	9,502	77.1	10,692	1,345	12.9
1957年	13,999	10,499	75.0	11,877	1,530	12.6
1958年	14,537	10,318	71.0	13,316	1,515	11.4
1959年	15,972	12,134	76.0	14,950	1,571	10.5
1960年	19,610	16,183	82.5	17,431	1,635	9.4
1961年	25,159	20,963	83.3	20,635	1,791	8.7
1962年	29,099	21,976	75.5	25,292	2,110	8.3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本国经济统计”，东洋经济“经济统计年鉴”。

注：金额系根据决算额，1962年为决算估计额，百分比由著者算出。

6. 全国银行的存款和贷款 (单位亿日元)

	(1) 存 款 (各年末)	(2) 贷 款 (各年末)
1945年	1,198	976
1946年	1,448	1,464
1947年	2,343	1,632
1948年	5,053	3,813
1949年	7,920	6,790
1950年	10,435	9,947
1951年	15,063	13,178
1952年	22,238	21,280
1953年	27,076	26,712
1954年	30,366	29,119
1955年	37,243	31,958
1956年	47,642	40,661

续表

	(1)存款 (各年末)	(2)贷款 (各年末)
1957年	55,048	50,244
1958年	64,840	58,129
1959年	74,136	68,028
1960年	88,722	81,826
1961年	103,324	97,704
1962年	121,187	114,946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经济统计月报”。

7. 日本银行券发行额和该行贷款额 (单位亿日元)

	(1)日本银行券 平均发行额	(2)日本银行贷出 款项年末余额	(3)其中,贷款 年末余额
1934—1936 年平均	12	8	0
1945年	301	378	不详
1946年	515	504	不详
1947年	1,375	323	不详
1948年	2,415	519	不详
1949年	3,060	886	662
1950年	3,218	1,145	665
1951年	4,053	2,230	1,586
1952年	4,532	2,232	442
1953年	5,082	2,987	1,203
1954年	5,196	2,433	1,898
1955年	5,245	319	178
1956年	5,697	1,399	1,145
1957年	6,359	5,519	4,949
1958年	6,602	3,793	3,290
1959年	7,387	3,379	2,752
1960年	8,592	5,002	4,261
1961年	10,557	12,845	11,658
1962年	12,285	12,851	11,687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经济统计月报”及该行“本国经济统计”。

8. 物价指数

基 期	(1) 批发物价 1934—1936年平均=1	(2) 零售物价(东京) 1934—1936年平均=1
1945年	3.5	—
1946年	16.3	50.6
1947年	48.2	109.1
1948年	127.9	189.0
1949年	208.8	236.9
1950年	246.8	219.9
1951年	342.5	255.5
1952年	349.2	266.1
1953年	351.6	286.2
1954年	349.2	301.8
1955年	343.0	297.4
1956年	358.0	300.2
1957年	368.8	308.9
1958年	344.8	312.1
1959年	348.3	316.2
1960年	352.1	328.0
1961年	355.7	345.0
1962年	349.7	368.0

资料来源：(1)根据日本银行调查。

(2)根据总理府统计局调查。

9. 国民收入估计

单位或基期	(1) 名义收入 亿日元	(2) 实际收入指数 1934—1936年平均=100	(3) 实际收入与上年比 %
1945年度	—	—	—
1946年度	3,609	56.9	—
1947年度	9,680	60.4	106.1
1948年度	19,616	70.8	117.2
1949年度	27,373	81.9	115.7
1950年度	33,815	97.2	118.6
1951年度	45,252	106.9	110.0
1952年度	50,489	117.4	109.7

续表

单位或基期	(1)名义收入 亿日元	(2)实际收入指数 1934—1936年平均=100	(3)实际收入与上年比 %
1953年度	57,477	124.3	105.9
1954年度	60,224	127.8	102.8
1955年度	67,189	142.4	111.4
1956年度	76,276	156.3	109.8
1957年度	82,859	167.4	107.1
1958年度	85,190	175.7	105.0
1959年度	100,373	204.2	116.2
1960年度	119,037	236.1	115.6
1961年度	141,177	263.9	111.8
1962年度	154,316	不详	不详

资料来源：经济企划厅经济研究所。

10. 设备投资额估计 (单位亿日元)

	对耐久生产设施 的支出	其 中	
		法人企业	个人企业
1934—1936年平均	16.52	13.13	3.39
1943年度	372	203	169
1947年度	943	490	455
1948年度	2,115	1,310	805
1949年度	2,885	1,898	988
1950年度	3,899	2,848	1,051
1951年度	6,099	4,769	1,330
1952年度	7,126	5,439	1,687
1953年度	8,007	6,170	1,837
1954年度	7,601	5,698	1,903
1955年度	7,774	6,045	1,729
1956年度	13,726	11,692	2,034
1957年度	16,932	14,183	2,749
1958年度	16,196	14,281	2,215
1959年度	21,792	19,017	2,685
1960年度	30,695	27,558	3,137
1961年度	40,594	37,185	3,319

资料来源：经济企划厅经济研究所。

11. 工资 (单位: 日元)

制造业月工资额		制造业月工资额	
1946年	—	1955年	16,717
1947年	1,756	1956年	18,348
1948年	4,869	1957年	19,259
1949年	8,416	1958年	19,180
		1959年	20,792
1950年	9,133		
1951年	11,708	1960年	22,630
1952年	13,516	1961年	24,786
1953年	15,322	1962年	28,297
1954年	16,308		

资料来源: 劳动省“每月劳动统计调查”及与它同类的调查。

注: 规模在三十人以上的工厂男女常用工人现金支付额, 在1949年以前和1950年以后, 调查对象有所不同。

12. 就业人数及其在产业部门的构成

	实 数(千 人)				构 成 比(%)			
	1940年	1950年	1955年	1960年	1940年	1950年	1955年	1960年
全部产业	32,231	35,626	39,261	43,691	100.0	100.0	100.0	100.0
第一次产业	14,193	17,208	16,111	14,346	44.1	48.3	41.0	32.8
农 业	13,363	16,102	14,890	13,216	41.5	45.2	37.9	30.2
林业、狩猎业	292	424	519	454	0.9	1.2	1.3	1.0
渔业、水产养殖业	538	682	702	676	1.7	1.9	1.8	1.5
第二次产业	8,419	7,812	9,220	12,731	26.0	21.9	23.5	29.1
矿 业	596	591	535	533	1.8	1.6	1.4	1.2
建 设 业	978	1,531	1,783	2,703	3.0	4.3	4.5	6.2
制 造 业	6,845	5,690	6,902	9,495	21.2	16.0	17.6	21.7
第三次产业	9,402	10,605	13,923	16,604	29.2	29.7	35.5	38.0
批发零售业	4,083	3,963	5,473	6,870	12.7	11.1	13.9	15.7
金融、保险、房地产业	298	362	623	796	0.9	1.0	1.6	1.8
运输、通讯、公益事业	1,516	1,811	2,049	2,436	4.7	5.1	5.2	5.5
服 务 业	2,887	3,056	4,423	5,171	9.0	9.2	11.3	11.8
公 务	618	1,376	1,361	1,332	1.9	3.3	3.5	3.0
不能分类的产业	217	37	2	10	0.7	—	—	—

资料来源：国势调查。

注：1940年是十岁以上的就业人口，1950年是十四岁以上的就业人口，1955年和1960年是十五岁以上的就业人口。

13. 工人数和有组织的工人数

	(1)工人数	(2)有组织的工人数	(3)估定的组织率
	万人	千人	%
1934—1936年平均	(1940年 1,355)	(约) 400	(约) 7
1945年(年末)	...	(约) 380	4.1
1946年	(1,050)	(约) 4,930	46.8
1947年	(下期) 1,243	5,692	45.3
1948年	1,274	6,677	53.0
1949年	1,242	6,655	55.8
1950年	1,265	5,774	46.2
1951年	1,370	5,687	42.6
1952年	1,422	5,720	40.3
1953年	1,498	5,843	40.2
1954年	1,547	5,986	38.8
1955年	1,617	6,169	39.1
1956年	1,741	6,350	36.5
1957年	1,877	6,606	36.1
1958年	1,973	6,882	35.2
1959年	2,061	7,078	34.5
1960年	2,191	7,516	34.1
1961年	2,323	8,154	34.5

资料来源：(1)工人数根据总理府统计局的“劳动力调查”。

(2)工人数主要根据劳动省“工会基本调查”。

(3)估定的组织率根据“劳动白皮书”。

注：包括办事员、职员、技术人员等全部雇用者的各栏数字，由于原始资料不同，所以(3)与(2)/(1)有不一致之处。

1946年是根据试验性的估计，1947年下半年起是正式的估计。()内是参考数字，准确度低。

14. 美国占领时对日援助的进口实绩(单位:百万美元)

年 月	援助性的进口 (%)	一般商业性的进口 (%)	进口总额 (%)
1945年9月— 1946年12月	192.9 (63.1)	112.7 (36.9)	305.6 (100.0)
1947年	404.4 (77.2)	119.1 (32.8)	523.5 (100.0)
1948年	461.0 (67.4)	223.2 (32.6)	684.2 (100.0)
1949年	534.8 (59.1)	370.1 (40.9)	904.9 (100.0)
1950年	360.8 (37.2)	609.2 (62.8)	970.0 (100.0)
1951年	156.7 (7.7)	1,890.1 (92.3)	2,046.8 (100.0)
1952年1—6月	5.4 (0.6)	987.4 (99.4)	992.8 (100.0)
1952年7—12月	0 (0)	1,035.4 (100.0)	1,035.4 (100.0)
合 计	2,116.0 (28.4)	5,347.2 (71.6)	7,463.2 (100.0)

资料来源:根据美军总司令部经济科学局统计。

注:一般商业性的进口是指除援助性进口以外的平常贸易。

15. 特 需

	(1) 特需合同额 千 美 元	(2) 广义的特需收入 千 美 元	(3) 广义的特需收入 外汇收入总额 %
1950年	191,356	148,889	14.8
1951年	363,640	591,677	26.4
1952年	306,623	824,168	36.8
1953年	451,470	809,479	38.2
1954年	237,420	596,164	25.8
1955年	172,518	556,604	20.9
1956年	164,500	595,362	18.5
1957年	229,603	549,269	15.1
1958年	143,512	481,562	13.7
1959年	156,235	470,823	11.6
1960年	157,162	542,128	11.8
1961年	147,091	445,723	9.3
累 计	2,711,131	6,611,848	

资料来源：1953年9月以前根据美国大使馆的调查。从此以后根据日本银行的调查。

特需的外汇收入根据日本银行的调查。

16. 引进外资批准情况(金额单位: 千美元)

年 度	技术援助 合同 (件数)	股 票	证 券 (其中参加经营)	投 资 受益证券	公 司 债	小 计	贷 款 投 资	外 汇 债	合 计
1950年度	27	3,150	2,572						3,150
1951年度	101	13,326	11,646				4,026		17,352
1952年度	133	10,123	7,166	146	25		24,457		44,751
1953年度	103	5,002	2,687	562			49,362		54,926
1954年度	82	3,970	2,467	58		4,028	15,279		19,307
1955年度	72	5,101	2,309	52	7	5,153	47,054		52,214
1956年度	144	9,520	5,360	115	15	9,635	93,652		103,302
1957年度	118	11,490	7,282	128		11,618	123,979		135,597
1958年度	90	11,350	3,698	116	28	11,466	231,473	30,000	272,967
1959年度	153	27,031	14,561	214	30	27,245	127,615		154,890
1960年度	327	74,151	31,593	555	20	74,706	127,132	9,800	211,658
1961年度	320	116,142	40,170	1,280	77	117,422	387,605	74,425	577,529
1962年度	328	164,668	22,618	650	86	165,404	385,419	155,000	678,823
累 计	1,998	455,024	154,130*	3,876	298	1,600,053	267,225		2,328,466

资料来源: 大藏省外汇局外资课。

* 根据外资法批准的合同件数。

战后日本经济年表

(主要摘录与本书有关事项)

1945年8月(铃木内阁)

2日,波茨坦公告。

6日,美机在广岛投下原子弹。

9日,苏联对日宣战。

14日,秘密指令隐匿和分配军需品、军用器材。

15日,广播天皇“结束战争诏书”录音,国民开始知道投降。

28日,美国第一批占领军到达日本。

9月

2日,日本政府代表签署投降书。

2日,占领军司令部命令解散陆海军和停止军需工业生产。

8日,麦克阿瑟元帅发表管理日本的方针。

18日,内阁会议决定撤消对蔬菜鲜果的统制(司令部于11月20日发布了同样的指令)。

22日,美国政府发表“日本投降后初期的对日方针”。

10月(幣原内阁)

4日,司令部发布废除治安维持法等和立即释放政治犯的指令。

8日,夕张煤矿朝鲜工人罢工。

11日,司令部下令实行五大改革:实行经济民主、赋与工人团结权、解放妇女、实行教育自由、取消专制政治。

26日,内阁会议决定煤炭生产紧急对策。

11月

2日,日本社会党举行成立大会。

2日,司令部发布冻结财阀资产的指令。

8日,共产党全国协议会成立。

22日,内阁会议决定第一次农地改革方案。

28日,因煤炭不足将旅客列车削减50%。

12月

6日,(第一次)发表鲍莱大使关于中间赔偿的报告。

9日,司令部下令解放农民并提出农地改革计划。

11日,司令部下令限制财阀系统三百三十六家公司的资产及活动。

16日,司令部指令实行预算编制、执行、修改的批准制。

27日,在美国布雷顿森林签订国际货币基金协定。

1946年2月

1日,实行第一次农地改革。

16日,公布金融紧急措施令(冻结旧日元,发行新日元等)。

26日,远东委员会成立。

3月

1日,工会法开始施行。

3日,旧日元停止使用。

4月

5日,召开第一次盟国对日委员会。

20日,公布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令。

5月(吉田内阁)

1日,间隔十一年后,重新纪念“五一”劳动节。

12日,东京居民举行“给我大米”大会,向皇城示威游行。

19日,群众举行粮食斗争日。

19日,司令部批准发放面粉。

22日,吉田内阁成立。

28日,内阁会议否认工人管理生产。

29日,盟国对日委员会苏联代表提出农地改革方案。

6月

12日,公布英国代表提出的农地改革方案。

7月

12日,《读卖新闻》社职工罢工。

24日,国营铁道通告解雇大批工人,劳资斗争开始。

8月

- 1日,日本工会总同盟举行第一次大会。
- 3日,司令部命令全部解散统制会。
- 11日,政府公布停止战时补偿。
- 16日,经济团体联合会成立。
- 19日,全日本各产业工会会议(简称“产别”)成立。

9月

- 16日,新日元发行额达六百十八亿日元,突破同年2月18日旧日元的最高发行额。
- 18日,司令部公布进口粮食发放量为六十万八千吨。
- 28日,南朝鲜总罢工。
- 30日,司令部命令解散三井总公司、三菱总公司、安田保善公司。

10月

- 13日,施行劳工关系调整法。
- 19日,电力产业工会开始停电罢工。
- 21日,公布第二次农地改革各项法令。

11月

- 3日,公布日本国宪法。
- 19日,公布企业重新整顿法和金融机构重新整顿法。
- 20日,施行财产税法。

12月

- 24日,政府决定煤炭生产目标为三千万吨的重点方针。

1947年1月

- 9日,全国官厅工会决定举行二·一罢工。
- 25日,复兴金融金库成立。
- 31日,司令部命令停止二·一总罢工。

3月

- 12日,美国发表杜鲁门主义(遏制共产主义的方针)。

4月

- 3日,司令部命令立即实行中间赔偿30%。
- 14日,公布禁止垄断法。
- 22日,举行众议院选举,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

29日,日本经营者联盟成立。

5月

3日,日本施行新宪法。

8日,美国国务卿同四国协商,迫不及待地声明承担日、德两国的复兴工作。

6月(片山内阁)

1日,片山内阁成立。

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发表对欧援助计划(马歇尔计划)。

11日,政府发表经济紧急对策纲要(规定基本工资为一千八百日元)。

7月

3日,司令部下令解散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两家公司。

8月

15日,司令部批准恢复有限的民间贸易。

9月

1日,部分施行劳动基本法。

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对蒋介石军队进行总反攻。

10月

5日,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成立。

12月

18日,施行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

20日,公布煤矿国家管理法。

1948年1月

1日,实行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

6日,美国陆军部长发表将日本作为防御共产主义堡垒的演说。

2月

13日,成立“产别”民主化同盟。

3月(芦田内阁)

2日,美国向远东委员会提出斯特莱克报告(赔偿调查报告)。

10日,芦田内阁成立。

19日,全国邮政工会宣布罢工。

20日,美国陆军部副部长率领日本、朝鲜调查团抵达日本。
29日,司令部提出全国邮政工会停止罢工的备忘录。

4月

1日,苏联封锁柏林。
16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条约签订。

5月

4日,为审查排除经济力量的集中问题,美国“五人委员会”来日。
17日,政府发表经济复兴五年计划第一次草案概要。
18日,美国陆军部发表杜莱巴报告,表明美国积极支援日本经济的方针。

7月

20日,政府发表“稳定经济”十项原则。
22日,麦克阿瑟元帅向芦田首相要求修订国家公务员法,包括禁止公务员参加工会斗争(所谓麦克阿瑟书简)。

8月

1日,中小企业厅成立。
15日,南朝鲜发表立国宣言。

9月

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11日,占领军司令部发表大幅度放宽排除经济集中的四项原则。
23日,苏联向远东委员会建议日本可无限制扩大和平产业。
30日,经济安定本部长官栗栖因昭和电工行贿案被捕。

10月(吉田内阁)

1日,银行结束整顿,重新营业。
7日,由于昭和电工公司行贿案件,芦田内阁总辞职。
19日,(第二次)吉田内阁成立。

11月

11日,司令部发表企业(工资)三项原则。

12月

3日,公布修改的国家公务员法。

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入北京城。

18日,司令部发表美国政府关于“稳定经济九项原则”的指令。

20日,司令部劳动科长警告年末正在发生纠纷的各产业工会停止罢工。

1949年1月

23日,大选,民主自由党超过半数,社会党大减,共产党当选三十五名。

2月

1日,道奇公使来日到任。

3月

7日,道奇就新年度预算、通货膨胀对策、外汇兑换率等发表声明。

4月

1日,司令部下令日本银行设立美国对日援助物资回头资金特别会计账户。

4日,公布团体活动限制令。

4日,西欧十二国(NATO)签订北大西洋公约。

6日,开始废除生产资料的统制。

23日,司令部下令规定一美元等于三百六十日元的单一汇率制(25日起实施)。

24日,(第一次)修改的禁止垄断法成立。

5月

3日,煤矿工会进入罢工。

3日,蒋介石由上海乘飞机逃往台湾。

9日,复兴金融金库理事长表明该金库今后的运营方针主要是管理和回收货币。

12日,美国政府命令麦克阿瑟元帅停止索求中间赔偿。

12日,司令部批准证券交易所重新开业(5月16日)。

12日,解除对柏林的封锁。

6月

1日,日本成立国有铁道、专卖公社、国税厅。

9日,为反对行政裁减和新的轮班制,国营电车工人举行罢工。

17日,日本银行成立政策委员会。

30日,(福岛县)发生平事件。

7月

4日,国营铁道公布第一次裁减人员三万七千名。

5日,东芝公司公布裁减人员四千五百名。

5日,下山(国营铁道总裁)事件。

13日,国营铁道公布第二次裁减人员六万二千名。

15日,三鹰事件。

23日,撤消对水泥、人造丝等的统制。

27日,民主自由党决定废除国家管理煤矿的方针。

27日,东芝公司工会联合会举行罢工。

8月

3日,麦克阿瑟宣布排除经济集中审查委员会的任务结束。

17日,松川事件。

26日,公布夏伍普第一次税制改革建议草案。

9月

7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

18日,英镑贬值18%。

21日,中国人民政协会议开幕。

24日,苏联正式发表拥有原子弹。

26日,司令部决定第一次回头资金的贷款额度。

10月

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

28日,全日本汽车产业工会举行罢工。

11月

10日,全国各产业工会会议(新产别)举行成立大会。

28日,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

12月

1日,公布外汇和对外贸易管理法。

1日,将出口贸易转为民间经营。

6日,司令部准许太平洋沿岸炼油厂重新开业。

14日,东京股票市场行情暴跌。

20日,司令部下令大幅度撤消对重要物资的统制。

1950年1月

1日,将进口贸易转为民间经营。

31日,电气企业改组委员会就电气企业分割为九家(电气公司)作出说明。

31日,美国三军首脑来日,宣布要加强日本和冲绳军事基地。

3月

1日,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的英国代表指出“日本八大银行有形成新财阀的嫌疑”。

4月

8日,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决定紧缩金融的方针。

12日,东京股票行情暴跌。

15日,公布实施资产重新估价法。

5月

8日,日立制作所公布裁减五千五百五十五名职工。

10日,外资委员会公布关于引进外资的法律(外资法)。

12日,日立工会总联合会下令罢工。

6月

3日,金属产业总罢工。

6日,麦克阿瑟元帅指令从政府中开除二十四名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

16日,政府禁止全国性的集会游行。

25日,朝鲜战争爆发。

27日,美国总统命令海空军向朝鲜出动。

28日,朝鲜人民军进入汉城。

30日,股票价格跌至证券市场重新开放以来的最低点。

30日,政府对生铁生产的补助金削减50%,完全取消对钢材生产的补助金。

7月

8日,麦克阿瑟元帅下令建立警察预备队。

11日,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举行成立大会。

12日,股票行情暴涨。

8月

1日,内阁会议决定建立粮食自给体制的方针,否定恢复经济统制。

1日,政府取消对化学肥料的补助金,撤消肥料配额制度。

12日,司令部非正式下令,在电力事业重新改组前,不许使用回头资金对电源开发公司进行贷款。

15日,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成立。

18日,政府决定对钢铁、煤炭工业实行合理化的政策措施纲要(即钢铁第一个合理化计划,1951年开始实施)。

18日,南朝鲜政府从大丘撤到釜山。

24日,内阁会议决定取缔暴利对策纲要。

25日,美国远东军在日本设立兵站司令部,正式开始经办特需。

25日,通产省公布日本商社在国外开设分公司得到司令部原则上的谅解。

28日,根据司令部的指示,从新闻、通讯、广播部门清洗共产党。

9月

1日,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清洗共产党的方针。

14日,美国总统指令国务院开始准备缔结对日和约。

15日,联合国军在仁川、群山登陆。

19日,政府决定完全取消对钢铁的补助金。

20日,废除衣料票证制。

21日,夏伍普发表第二次税制建议。

10月

7日,道奇来到日本,声明坚持道奇路线。

13日,司令部恢复对一万名被革职的公务人员的公职。

25日,向朝鲜战场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

11月

10日,第一次取消对旧职业军人的清洗。

21日,甲级战犯假释出狱。

24日,政府根据麦克阿瑟信件,公布电力企业改组。

25日,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总反攻。

12月

6日,政府决定全面停止可向中国出口的商品的出口。

16日,美国总统宣布美国面临严重局面。

1951年1月

20日,经济独立审议会就经济独立三年计划进行答辩。

25日,杜勒斯特使来日,就对日媾和和日本经济合作的设想发表声明。

2月

11日,杜勒斯表示要把日本建成反共的堡垒。

16日,麦克阿瑟元帅指示吉田首相就建立日美经济合作体制进行研究。

28日,成立日本输出银行(即现在的日本输出入银行)。

29日,政府决定于3月末全部废除公团。

3月

20日,日本开发银行成立。

4月

11日,“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被罢官。

5月

1日,重新改组电力企业,成立九家新的电力公司。

14日,司令部宣布将在6月末停止对日援助的精神。

6月

1日,(新)总同盟成立。

19日,反对改坏劳动法规斗争委员会成立。

20日,第一次发表解除对六万八千九百六十名人员的清洗。

21日,国际劳动组织承认日本重新加入国际组织。

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关于朝鲜停战的建议。

7月

2日,由于朝鲜停战谈判的进展,东京股票行情暴跌。

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

9月

8日,在旧金山签订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10月

3日,政府宣布于翌年1月1日撤消对大米的统制。

15日,反对撤消米麦统制的全国农民大会开幕。

11月

1日,政府决定赔偿谈判的基本方针。

6日,道奇向池田财政大臣写信声明反对废除主食统制。

6日,政府声明停止撤消主食统制。

9日,道奇透露要紧缩金融。

24日,道奇批评政府的经济政策,强调对物资进行统制的必要。

31日,根据修改的租税特别措施法,采取固定资产特别折旧制度。

12月

16日,司令部通告日本政府,承认经过修改的禁止垄断法。

1952年1月

16日,解散复兴金融金库。

19日,南朝鲜宣布李承晚路线。

2月

1日,经济合作最高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谈(商讨日美经济合作)。

28日,美国访日机械调查团对日本的工业和机械工业表示失望。

28日,签订日美行政协定。

3月

3日,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开幕。

8日,司令部下令批准制造武器。

14日,公布企业合理化促进法。

4月

12日,为反对改坏劳动法,掀起第一次全国罢工。

26日,司令部将原来指定作为赔偿拆迁的八百五十个军需工厂,发还给日本政府。

28日,和约生效,解除占领,占领军总司令部撤消,日本和台湾蒋介石签订和平条约。

5月

1日,“五一”节游行队伍在皇宫前与警察队伍发生冲突(即“五一”节事件)。

6月

1日,废除小麦统制。

1日,三位民间人士(社会党议员——译注)在北京签署日中贸易(第一次)协定。

7月

21日,公布施行防止破坏活动法。

31日,公布电源开发促进法。

31日,劳动三法修改法成立。

8月

1日,日本电信电话公社成立。

1日,公布关于稳定特定中小企业的临时措施法(1953年8月修改为中小企业稳定法)。

5日,公布输出交易法(9月1日施行,1953年9月起改称输出入交易法)。

14日,日本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

9月

11日,通产省决定处理旧军工厂的方针。

11日,通产省指定武器制造业为重要产业。

16日,电源开发公司成立。

18日,苏联使用否决权,否决日本加入联合国。

10月

23日,发表粮食增产第一个五年计划。

12月

1日,根据长期信用银行法,日本兴业银行改为长期信用银行。

5日,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开业。

9日,经济审议厅发表电源开发五年计划。

15日,政府对煤矿罢工使用紧急调整权。

16日,指令煤矿工会停止罢工。

1953年1月

5日,公布施行造船利息补助法。
20日,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
30日,通产省开始对中国解除一部分禁运。

2月

10日,欧洲煤炭钢铁联营成立。

3月

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逝世。斯大林逝世引起股票大暴跌。
9日,通产省决定扶植合成纤维工业的五年计划。
30日,因朝鲜停战会议重新开始,股票、纤维、橡胶行情迅速下跌。

4月

2日,日美签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6月

13日,石川县内滩村村民为反对美军建筑发射试验场,开始在滨小屋静坐示威。
16日,东柏林爆发暴动。

7月

4日,参加总评的各产业工会掀起反对罢工限制法的第一个斗争高潮(7月11日掀起第二个高潮)。
9日,通产省发表硫酸工业合理化五年计划。
13日,日本银行公布上半年外汇收支恶化情况。
15日,日美间开始共同安全保障条约的谈判。
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
31日,美国废除对日援助物资回头资金特别账户。

8月

1日,公布施行产业投资特别会计法(即日设立账户)。
5日,罢工限制法成立。
5日,日产汽车公司三个工厂发生劳资纠纷。
7日,三井矿山公布裁减职工约六千七百名。
17日,三井矿山工会联合会宣布加强反对裁减人员的斗争。
30日,日产汽车公司第二工会举行成立大会。

9月

1日,(第二次)公布施行部分修改的禁止垄断法。

11日,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开业。

21日,池田、罗伯逊会谈结束,就逐渐增强日本自卫力量取得一致意见。

10月

1日,日本银行采取高利率,推进金融紧缩政策。

5日,日本银行(第一次)紧缩进口金融。

15日,世界银行签约对日本火力发电贷款四千零二十万美元。

29日,第二次日中贸易协定签订。

11月

12日,世界银行访日调查团向日本政府提出意见书。

27日,三井矿山撤消指名解雇,经过一百三十天的斗争,工会方面取得胜利。

12月

9日,三菱商事公司复活(三菱系统四大商社合并,于1954年1月正式签署成立公司)。

19日,吉田首相指示内阁各部将1954年度预算草案削减一成。

22日,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决定再次加强金融紧缩方针。

28日,股票行情大暴跌。

1954年1月

4日,日本银行再次加强金融紧缩。

8日,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决定紧缩进口金融。

22日,决定总额在一万亿日元以内的紧缩预算案大纲。

3月

8日,根据美国共同安全保障法,日美就购入(剩余)农产品签订协定。

8日,日美签订共同防卫援助协定(5月1日生效)。

10日,日本银行实行进口金融紧缩。

19日,设立日美生产率增强委员会(6月19日改称为日美生产率协议会)。

4月

- 1日,日本银行实行进口金融紧缩。
- 14日,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因造船行贿案件受到传讯。
- 18日,纳赛尔任埃及总理。
- 21日,犬养毅相动用指挥权阻止逮捕佐藤荣作干事长。
- 22日,全日本工会会议成立大会。
- 30日,通产省正式决定第二个钢铁合理化计划。

5月

- 7日,因胡志明军队进攻,法军据点奠边府被解放。
- 31日,决定将共同安全保障法下的剩余小麦援助赠款资金,分配给武器企业及其有关的产业等。

6月

- 1日,为充实资本,公布重新估价资产等特别措施法(资本充实法)。
- 3日,近江绢丝工会提出“人权要求”,举行无限期罢工。
- 10日,公布硫铵工业合理化等硫铵三法。
- 15日,突破中小纤维工业危机全国大会开幕。
- 17日,日本制钢室兰厂工会,因裁减人员20%而举行罢工。
- 24日,日本正式加入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

7月

- 21日,印度支那停战协定(日内瓦协定)签订。

8月

- 3日,日本银行实行进口金融紧缩。
- 16日,政府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一起,放宽对苏联的禁运。

9月

- 8日,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会议开幕。
- 16日,近江绢丝劳资纠纷延续至今天(达一百零六天)才解决。
- 23日,日本制钢室兰厂因劳资纠纷组成第二工会。

11月

- 5日,日本和缅甸签订和平条约、赔偿和经济合作协定。
- 13日,根据美国剩余农产品处理法购进剩余农产品(第一次)谈判达成协议并签字(一亿美元)。

12月(鸠山内阁)

1日,美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共同安全保障条约。

1日,决定解散全国汽车工会。

10日,鸠山内阁成立。

24日,三家钢铁公司决定对菲律宾拉勒布矿山投资一百八十万美元。

26日,日本制钢室兰厂工会罢工延续到今天(达一百九十三天)才接受调停。

1955年1月

6日,农林省编制粮食增产六年规划。

11日,鸠山首相表明对与中苏恢复邦交抱有积极的愿望。

14日,日本银行公布1954年度外汇收支显著好转(顺差一亿美元)。

15日,日本中小企业工会联合会成立。

2月

10日,总评拒绝加入日本生产率总部。

14日,日本生产率总部成立。

4月

6日,日美签订生产率协定。

15日,在北京签订日中(民间)渔业协定。

18日,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日本政府代表高崎达之助参加。

5月

4日,在东京签订第三次日中贸易协定。

7月

13日,通产省决定扶植石油化学工业对策。

20日,经济企划厅成立。

25日,公布法律废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

25日,全国工会联络协议会成立。

28日,共产党举行第六次全国协议会。

8月

10日,公布煤矿业合理化临时措施法。

10日,公布限制安装柴油锅炉临时措施法。

12日,外务省公布正式加入关税贸易总协定的决定(9月10日)

生效)。

9月

1日,重光外相与美国杜勒斯国务卿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发表联合声明。

8日,总评决定中小企业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14日,反对砂川基地的斗争,与警察发生冲突。

16日,总同盟决定正式加入生产率总部。

10月

13日,社会党两派统一。

24日,全日本海员工会决定加入生产率总部。

11月

15日,保守派联合,自由民主党正式成立。

25日,正式通告第二次向世界银行借款(钢铁、机械八百万美元)。

12月

13日,苏联再次行使否决权,否决日本加入联合国。

23日,内阁会议决定经济独立五年计划方案。

24日,农林省公布本年度大米估计实收七千九百零三万石(1950—1954年平均每年约六千万石),收获量大增。

1956年1月

7日,来到日本的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指出,日本的防卫计划不充分。

25日,阿拉斯加纸浆公司获得阿拉斯加国有森林的采伐和运出权。

2月

10日,日美间签订第二次购进剩余农产品协定(七千七百万美元)。

3月

1日,成立原子能产业会议。

14日,公布日本道路公团法和道路整备特别措施法。

22日,(适应军事生产需要)日美签订技术情报交换协定。

4月

6日,开发马来铁矿合同草签。

11日,中小企业政治联盟成立。

26日,公布首都圈整备法。

5月

9日,日本菲律宾赔偿协定在马尼拉签署。

17日,通产省决定稳定钢铁的紧急对策,以缓和供求关系。

22日,公布百货店法。

6月

1日,公布防止拖延支付承包加工货款法。

5日,公布纺织工业设备临时措施法。

8日,经济团体联合会决定海外投资方针。

15日,公布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

15日,政府签字加入国际金融公社(IFC)。

21日,纳赛尔就任埃及总统。

28日,波兰爆发反苏暴动。

7月

26日,纳赛尔总统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

10月

19日,日苏恢复邦交联合声明和通商航海议定书在莫斯科签订。

23日,匈牙利爆发暴动(24日苏联出兵)。

31日,英法联军开始攻击埃及军队。

11月

1日,苏伊士运河停止通航。

2日,因中东形势恶化,股票行情暴涨。

7日,英法命令联军在苏伊土地带停战。

19日,钢铁业界与印度签订铁砂进口长期协议。

12月(石桥内阁)

3日,联合国通告英法从苏伊士撤出军队。

8日,限制罢工持续法成立。

12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定日本加入联合国。

23日,石桥内阁成立。

1957年1月

31日,因石桥首相患病,由岸信介外相代理首相职务。

2月(岸内阁)

18日,内阁会议决定婉拒接受第三次剩余农产品。

22日,世界银行第三次贷款事达成协议并签字。

25日,岸信介内阁成立。

3月

20日,日本银行提高公定利率。

22日,总评为确立最低工资制而举行罢工,劳动相视之为政治罢工,因而下令停止。

23日,国营铁路工会突然举行现场大会,国营铁路发生混乱。

25日,在罗马签订欧洲共同市场条约。

26日,总评系统的工会要求确立最低工资制,举行现场大会(停止罢工)。

31日,1957年度“一千亿(日元)减税,一千亿(日元)政策措施”的预算成立。

4月

9日,苏伊士运河完全重新开放。

15日,指示日本银行对东京九大银行限制贷款。

5月

8日,由于日本银行提高公定利率,紧缩金融,股票价格暴跌。

17日,各地纤维行情暴跌。

18日,股票行情出现战后最大的暴跌。

20日,岸首相出访东南亚六国。

30日,英外交大臣发表声明大幅度放宽对中国的禁运,美国务院向英国提出抗议。

6月

4日,巴西乌奇米纳斯钢铁厂建设合同签字。

4日,大藏省执行进口紧缩政策。

7日,通产省决定在外汇分配方面限制进口的措施。

11日,公布振兴电子工业临时措施法。

14日,内阁会议决定应付国际收支恶化的综合政策。

15日,岸首相动身访美。

21日,日美首脑会谈结束,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撤出驻日美军地面部队。

25日,全国纤维职工同盟审议缩短工时斗争日程表。

25日,国际货币基金贷款谈判达成协议(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

7月

13日,全国纤维职工同盟决定罢工。这个工会系统下的纺织工会对缩短工时的斗争表示妥协。

8月

16日,同华盛顿进出口银行签署农产品进口贷款合同(一亿一千五百万美元)。

10月

4日,苏联发射世界第一个人造卫星成功。

23日,全日本海员工会号召全部船舶举行停船四十八小时罢工。

11月

2日,海员罢工结束。

18日,岸首相出访东南亚九国。

12月

6日,日苏签订通商条约。

10日,日本阿拉伯石油公司同沙特阿拉伯签订石油利权协定。

17日,内阁会议决定新长期计划。

25日,公布中小企业团体组织法。

1958年1月

20日,日本和印尼签订和平条约和赔偿协定。

23日,日本和印度会谈,决定由日本政府向印度提供一百八十亿日元的日元贷款。

2月

15日,全日本各产业工会会议解散。

26日,日本和中国达成钢铁贸易协议。

3月

5日,签订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

14日,台湾国民党当局抗议日中贸易协定,停止日台通商会议。

21日,煤矿工会在十五个矿山举行无限期重点罢工。

27日,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就任部长会议主席。

4月

10日,台湾国民党当局解除与日本通商的禁令。

5月

2日,长崎发生侮辱中国国旗事件(日中关系因此而进一步恶化)。

10日,中国发表声明全面停止中日贸易,取消一切已经签订的合同和正在商谈的交易。

6月

5日,大藏省公布到5月末的外汇储备额恢复到七亿美元。

17日,钢铁联盟决定自7月起实施钢铁公开销售制。

18日,日本银行降低公定利率。

7月

5日,日本阿拉伯石油公司与科威特政府签订石油利权协定。

14日,伊拉克爆发革命。

15日,美国海军部队在黎巴嫩登陆。

18日,王子造纸公司发生劳资纠纷,工人举行无限期罢工。

20日,伊拉克退出巴格达条约。

8月

21日,东京证券市场股票价格平均指数达到开业以来的最高点。

9月

4日,钟纺公司三个工厂停产,并向工会提出降低工资等对付萧条的措施。

11日,藤山爱一郎、杜勒斯会谈,就举行修改安全保障条约的谈判取得一致意见。

16日,全国银行协会降低民间银行利率。

10月

4日,日美修改安全保障条约谈判开始。

15日,日本、老挝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24日,美军全部撤出黎巴嫩。

11月

5日,举行反对改坏警职法的统一行动。

12月

9日,王子造纸公司劳资纠纷历时一百四十五天达成协议。

27日,欧洲各国公布恢复本国货币的可兑换性。

1959年1月

1日,欧洲共同市场(EEC)成立。

2月

15日,恢复三井物产公司(由第一物产与三井物产合并而成)。

16日,卡斯特罗就任古巴总理。

19日,日本银行降低公定利率。

3月

2日,日本和柬埔寨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24日,伊拉克退出中东条约组织。

28日,阻止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国民会议成立。

4月

2日,西藏叛乱失败,达赖喇嘛逃往印度。

8日,农林省公布从1959年起以成本加补贴费来计算大米价格的新方针。

15日,举行第一次统一行动,阻止修改安保条约(到1960年6月22日共举行十九次)。

15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辞职(5月24日死亡)。

27日,刘少奇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5月

2日,通过中小企业退职金共济法。

13日,政府和南越签订赔偿协定、贷款协定,并就经济合作换文。

7月

21日,决定成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

9月

- 4日,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决定实施存款储备制度。
- 2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美,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会谈。
- 26日,伊势湾台风使三重、爱知、岐阜三县遭受巨大灾害。

10月

- 7日,恢复三井矿山与三矿联合的团体谈判破裂。
- 12日,在东京召开第十五次关税贸易总协定大会。
- 29日,政府就收入倍增计划向经济审议会提出咨询。

11月

- 11日,政府发表对美元地区有差别待遇的十项商品大幅度放宽进口限制。

12月

- 2日,日本银行提高公定利率。
- 11日,三井矿山公司的三池煤矿指名解雇一千二百七十七名职工。
- 18日,公布煤矿离职者临时措施法。
- 19日,煤矿业审议会就煤炭合理化的基本方针(包括至1963年每吨煤价降低一千二百日元)进行答辩。
- 30日,政府决定发行三千万美元外汇债券。

1960年1月

- 12日,政府决定贸易外汇自由化的方针和具体措施。(四百项进口商品自由化,建立非居民自由日元。)
- 15日,全学联学生反对岸首相访美,在羽田机场静坐示威,与警察发生冲突。
- 16日,岸首相等新安全保障条约谈判代表团动身前往美国。
- 19日,岸首相全权代表团在华盛顿签署新安全保障条约。
- 24日,民主社会党举行成立大会。
- 25日,三池煤矿公司关闭整个矿山,三池工会举行无限期罢工。

2月

- 20日,东京证券交易所旧道氏平均股票价突破一千日元大关。

3月

- 17日,三池煤矿工会约三千人组成第二工会。

23日,三井矿山公司与三井新工会签订协议。

28日,三池煤矿第一、第二工会发生冲突,暴力团刺杀一名工会会员。

4月

19日,汉城的反政府示威进一步加剧。

20日,三池煤矿第二工会会员强行进入坑道,第一工会会员与警察发生冲突。

21日,李承晚内阁总辞职。

5月

10日,农林渔业基本问题调查会向首相提出农业的基本问题和基本对策。

16日,在巴黎举行的东西方首脑会议因美国U-2飞机对苏进行间谍飞行事件而流产。

30日,岸首相发表收入倍增的设想。

6月

2日,米价审议会就以生产费加补贴方式计算产地大米价格进行答辩。

15日,为阻止修改安保条约举行六·一五全国统一行动,包围国会的大示威游行队伍与警察发生冲突。

16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停止访日。

19日,新安保条约自然批准。

20日,政府发表“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大纲”。

7月(池田内阁)

4日,刚果暴动扩大,比利时军队介入。

15日,岸信介内阁总辞职。

19日,池田内阁成立。

22日,讨论设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问题的二十国委员会开会。

8月

24日,日本银行降低公定利率。

9月

7日,三池煤矿第一工会有条件地承认中央劳动委员会关于结

束劳资纠纷的斡旋方案。

10月

1日,与通产省有关的二百五十七项商品及与农林省有关的一百二十一项商品实行自由化。

11月

1日,三井矿山公司的三池煤矿的劳资纠纷历时二百八十二天获得解决。

9日,国际开发协会(第二世界银行)正式开始办理业务。

16日,美国总统为保卫美元,紧急下令削减对外经费。

25日,美国黄金储备跌进一百八十亿美元大关。

12月

1日,时隔三百一十一天,三池煤矿全面重新开始生产。

23日,农林省公布1960年度大米估计产量达历史最高纪录。

27日,政府正式决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961年1月

4日,美国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

20日,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

26日,日本银行决定降低公定利率。

27日,十四家大煤矿工会的六十个支部同时举行罢工,要求改变煤炭政策。

30日,东京证券交易所旧道氏平均股票价突破一千五百日元。

3月

6日,西德马克升值4.75%。

7日,荷兰盾升值4.76%。

4月

12日,苏联发射载人卫星成功。

5月

1日,大藏省公布1960年度海外投资余额为八亿九千五百万美元。

1日,古巴宣布为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

4日,大藏省公布4月末的外汇储备为二十亿三千五百万美元。

16日,南朝鲜发生政变,建立军事政权。

27日,政府发表大幅度放宽批准引进外国技术的方针。

6月

6日,农业基本法成立。

7日,煤炭部门和电力、钢铁、煤气、水泥部门协商,决定1963年以后从产煤指标五千五百万吨中提取70%。

7日,在美国卖出第一笔日本公司的股票(索尼公司)。

10日,日美政府签订关于占领地区复兴基金对美债务处理的备忘录(1962年起十五年内偿还本金四亿九千万美元,包括利息共五亿九千万美元)。

15日,经济审议会警告设备投资过头了。

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京召开对日年度协商会议,弗里德曼秘书长向政府建议撤消外汇限制。

7月

1日,对大豆等商品实行进口自由化。

5日,大藏省、日本银行、民间银行提出削减设备投资一成。

13日,通产省通商局长表明日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国过渡,延期一年实行,自由化提前半年实行。

18日,东京证券交易所旧道氏平均股票价达到历史最高值一千八百二十九日元,此后下降。

21日,日本银行提高公定利率(但对出口贸易商降低利率)。

8月

3日,对有关大米管理的“河野(农业大臣)设想”,全国农协中央会表示反对。

10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13日,民主德国政府断然封锁东西柏林的边界。

18日,日本印度签订贷款协定。

23日,内阁有关大臣决定重建硫酸工业的政策。

28日,日本银行指示民间银行加紧紧缩金融。

9月

12日,煤矿工会临时大会决定进行斗争,争取实行有限度的合理化政策。

2 016 7623 0

16日,政府决定提高进口担保率(目的是限制进口和设备投资)。

20日,经团联改变过去对经济的乐观态度,要求自民党实行抑制经济的政策。

20日,因武州铁道贪污事件,原运输大臣神桥夫妇被捕。

28日,日本银行为改善国际收支决定紧缩金融。

10月

2日,在东京、大阪、名古屋成立证券“第二市场”。

9日,东京股票交易所股票价格空前暴跌。

12日,日本银行贷款余额达一万零二百七十四亿日元,超过日本银行券发行额。

13日,政府为改善国际收支,决定压缩公共投资、财政投资贷款、建筑等措施。

25日,国会通过“关于克服煤炭产业危机的决议”。

27日,内阁会议决定建设新道路五年计划(五年共二万一千亿日元)。

11月

1日,由于外汇储备急剧减少,日本银行决定从美国民间银行取得约二亿美元的外汇贷款(11月24日,日本银行签署协议)。

2日,根据新安保条约,第一次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在箱根举行会议。

16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举行部长会议,推进贸易自由化。

12月

5日,日本银行就物价上涨倾向提出警告。

10日,印度军队进攻并收复了葡萄牙领有的果阿。

31日,到年底,外汇储备减少到十四亿八千万美元。]